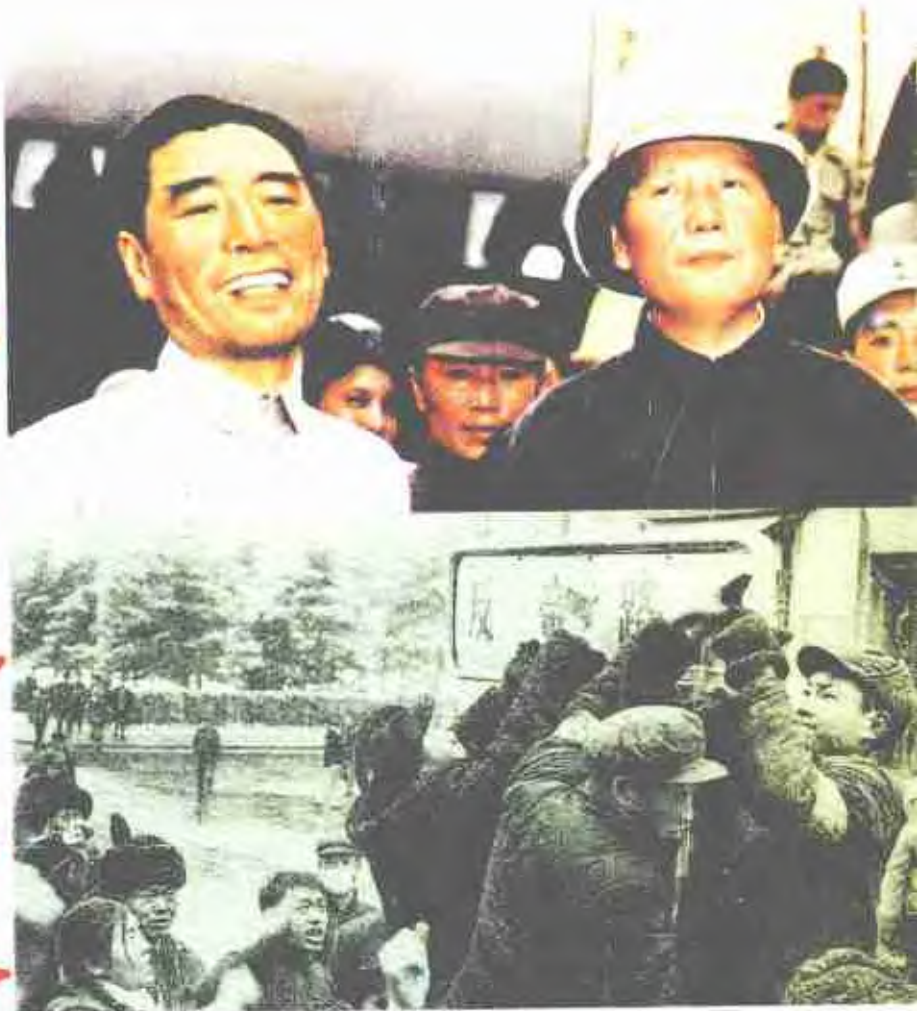


炎黄春秋



于光远在文革初期的滑稽人生

保卫毛泽东

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受降

——侵华日军投降内幕

乾隆年间的一次万里长征

我的父亲李文达怎样被推上被告席



2
94

北京旧影



海德·莫利森 摄影

中国城墙的一角。

煤山（景山）是人工小山丘，位于紫禁城北面。



集市上卖成药的随处可见。这位男汉正在出售健身药膏（跌打膏药）。在北方的冬季，他手挽强弓，显示出他的上、下颚和牙齿有良好的拉力。

扉页导读·扉页导读·扉页导读

于光远在“文革”初期的滑稽人生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作者于光远有不少可痛、可笑、荒唐滑稽的遭遇，他的叙述看似滑稽，实际上何等辛辣；看似调侃，实际上有多少眼泪……

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毛泽东亲临虎穴，斗争十分尖锐，随时可能发生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本文则是毛泽东当年的贴身卫士的叙述，他亲自经历、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蒋介石受降——侵华日军投降内幕

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之后，举世欢腾，然而妄图负隅顽抗的一小撮日本法西斯分子仍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蒋介石则派遣他的心腹何应钦等代表他接受侵华日军头目、战犯冈村宁茨的投降，幕前幕后，台上台下，种种交易……

我的父亲李文达怎样被推上被告席

《我的前半生》几乎家喻户晓。

当年，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受命帮助爱新觉罗溥仪写出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呕心沥血，几十年后的今天，反而因“版权”问题被推上了被告席，官司来了，他却凄然辞世……

最早为包产到户呼号的两个青年人

在六十年代初，两个默默无闻的小青年，怀着对党、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千辛万苦，根据大量实地调查，向党中央及有关领导人率先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万万没有想到，一片忠心换来却是不幸的遭遇，……还是历史终归为他们作了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热”中的文坛造假风

有些人为了使其出版物耸人听闻，取得所谓轰动效应，不惜对历史事件，甚至领袖的生平事迹，也搞假冒伪劣，本文作者揭露了不少事例，以期说明当前在“毛泽东热”中的造假现象也值得重视……

编者寄语

早春二月，这刊物送到了您的手上。

“今年2月冻初融，睡起苍溪绿向东。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其实，改革开放的春天早就随着15年前的那一声春雷来临了。举目神州，“雪消门外千山绿”。15年的风雨坎坷，我们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指引下，终于用心血与智慧写就了共和国编年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炎黄春秋》生逢其时，沐浴着改革开放之春风得以抽枝吐芽，不断生长；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读者厚爱，我们在感奋之余也常常不安，因为刊物还有那么多地方不尽人意……

这里，有一点情况需要向读者说明：

刚交邮局发行时，我们曾告诉大家，今年的《炎黄春秋》每期为80面，征订数字上来后颇使我们感奋，为了回报读者的厚爱，第1期临时增至96面。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在做过种种成本核算后，决定将页码确定为88面，这样即顾及了我们对各种情况的承受力，又力求给读者以更大的信息量。总之，尊敬的读者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会努力对您的关切与厚爱回报于万一。

“出关见青草，春色正东来。”2月，正是播种的季节。让我们和您一起播下真诚的种子，收获希望的太阳！

炎黄春秋

1994/2(总第 23 期)

MU LU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锬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副总编: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码:100802
印刷:
总发行处: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每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编辑部电话:6016633-227
定价:3.20元

英杰谱	春秋笔	人海浪	求实篇
④ 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①① 我在「文革」初期的滑稽人生	⑤② 侵华日军投降内情	④⑥ 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游南岳
		⑤⑤ 我的父亲:从写《我的前半生》到「被告」	⑦② 蓝盔部队:未曾披露的新闻
			⑤④ 最早为包产到户呼号的两个年轻人
			⑥① 陈独秀之死
刘 木 林	于 光 远	张 力	梁 贤 之
		海 河	黄 创 新
			马 晓 春
			韩 三 洲
			靳 树 鹏

目 录

古今谈	古镜台	广 告
<p>⑥⑧ 「毛泽东热」中的文坛造假风</p> <p>⑧② 祭炎帝陵 扬民族魂</p> <p>徐 焰</p>	<p>⑦⑦ 乾隆年间的一次万里长征</p> <p>⑧③ 乱世谋臣李泌</p> <p>④⑨ 郭沫若与「星临轩」牛肉馆</p> <p>吴 杰</p>	<p>⑧⑧ 505真神</p> <p>⑧⑧ 中华大学大专函授招生简章</p> <p>新凤霞</p>

关注高层动态
 揭露历史谜案
 报导社会热点
 追踪重大事件

《炎黄春秋》1994年第3期

要 目

甲申 350 年祭

今年距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的甲申年整整 350 周年了。距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的 1944 年也已经 50 年了。当年，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号召大家以李自成起义最终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今天我们重温这一历史，对于反腐倡廉仍有其现实意义。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

田家英自 26 岁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了 18 年。他聪明能干，才华纵横。本文对他精心收集毛泽东的手迹，对他同毛泽东的古诗词交流都有十分生动、具体的描写，而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

蒋介石八大金刚抗战功罪录

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张治中……这八个人大多出身保定军校而后在黄埔军校任要职，立过战功，皆由蒋介石一手提拔。他们官阶相似，性格各异。有的不近女色，不嗜烟酒；有的狂嫖滥赌，爱财如命；有的少年得志，轻狂一生；有的出身贫寒，仕途坎坷……本文对这八个人都有很精彩的描述。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红卫兵小报的兴亡记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本文围绕这些红卫兵小报的缘起、发展和兴亡，演出了许多令人驻足长思的悲喜剧……

税收，最长与最短的思考

如今，抗税、偷税、漏税、逃税层出不穷。这中间有著名歌星、“倒爷”、“破烂王”、“大款”……不同层次的人心态各各不同，本文是一面“哈哈镜”，是一支“万花筒”……

纯朴 憨实的青年人齐吉树，于 1945 年至 1946 年，在延安毛泽东身边担任勤务员。他作为主席唯一的贴身卫士，与毛泽东一行同机飞赴雾都重庆，出色地完成了保卫毛泽东的神圣使命。

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刘政木林



□叶子龙递上电报稿：“主席，日本投降了！”

□毛泽东接过电话：“哦，投降了，好啊，抗战八年，胜利了！”

延安枣园美，晨曦的枣园更美。

八九月是丰收的季节，一树沉甸甸的大红枣儿，在曙光照耀下，红翠招人喜爱，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粗壮高耸的槐树掩映下，黄澄澄的大鸭梨压弯了枝梢，红了嘴的桃子朝人微笑。一株株杏树，郁郁葱葱，树繁叶茂。毛泽东办公室的窗户几乎全被树荫遮盖着，整个枣园生机盎然。当成熟的水果一下来，毛泽东叫卫士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让警卫员、勤务员们拣好的吃，他自己却很少吃。

高个儿青年人齐吉树，端起一个大木盆，装了满满一盆该洗的衣服，有毛泽东的，江青的，也有他自己的，边洗边挂在院里的绳子上，晾晒起来。

这是1945年8月15日清晨。秘书叶子龙手里拿着一封电报，大步走过来：“齐吉树，主席起床了没有？”

“还没起床呢，快天亮才睡。我已沏上茶了，主席正睡着呢，先别去打搅。”

“你去把主席叫醒吧，有重要电报。”

“我才不去呢，刚睡多一会儿呀就叫。”齐吉树嘴里说着，手里不停地洗衣服。

“嗨，有重要事儿。”叶子龙挥舞着手中的电报说：“日本投降啦！”这声音如同一声春雷，激动人心！

“啊！日本投降了！”齐吉树站起身，跳起来。哗啦，院子里的几个年轻人都围拢过来。欣喜地又蹦又跳，又说又笑。

“真的，日本电台广播了，日本天皇下了投降书。你们看，这是电报稿。”叶子龙拿着电报，兴奋地说，“给毛主席送去。”

叶子龙、齐吉树一同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这时，毛泽东刚刚睡醒了，正躺着看报纸呢。

齐吉树走到主席身边，小声道：“主席，叶秘书来了。”

叶子龙连忙递上电报稿：“主席，日本投降了。”

毛泽东接过电报看：“哦，投降了，好啊，抗战八年，胜利了。”

“叶子龙，你叫朱老总、少奇、任弼时来。”毛泽东站起身，笑着说。

朱德总司令先来了，毛泽东给他看电报。

“日本投降，当前仗怎么打法？”朱德微笑着问毛泽东。

“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战争。”毛泽东与朱总谈形势，齐吉树侍立一旁，执行伺候毛泽东的任务。

毛泽东的办公室在窑洞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五屉桌，一把旧圈椅，两把没有弹簧的土沙发，一个茶几和两个书架。他们就坐在沙发上促膝交谈。

毛泽东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妄想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继续阴谋发动内战，用武力消灭我党的人民革命力量。我们就要强大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有鉴于此，战争不能停止，能夺下大城市就夺，夺不下大城市，打中小城市。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2日，毛泽东与朱德拟定了电报，继续扩大解放区人民的武装力量，朱总司令发出了要各地敌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的命令。几天之内，山西、河北节节胜利，相继解放了几十座城市。

这天晚上，延安一片灯火，锣鼓喧天。

毛泽东踱步梨树林，他的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里，灯火一直照耀到凌晨。

毛泽东忙着开了一天的会，不顾饥饿，夜里3点多钟，喝了一杯牛奶，又继续开会。

齐吉树忙活完了会议室的茶水，便站在窑洞的高处，遥望着延河两岸的灯火，心潮起伏遐想联翩，抗日8年的胜利，多么不容易啊！在毛泽东巨臂指挥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亲眼目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付出多少心血！

□蒋介石九天之内，三次来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齐吉树问江青：毛主席去重庆穿什么？戴什么？

延安的天是晴朗的天，延安人民正尽情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大快人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同志，昼夜在枣园小礼堂开会，商谈抗战胜利后的局势。齐吉树和警卫们就更忙了。齐吉树肩负招待任务，供茶、供烟和饮食，进出小礼堂。毛泽东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

相对，寸土必争。”

就在枣园小礼堂作出了决定，根据形势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为争取成立联合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45年8月15日这天，正在延安人民欢庆抗日胜利的时刻，突然从雾都重庆飞来了电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洞察秋毫的毛泽东，已识破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用意，第一封电报没有理他。紧接着在九天之内，三次来电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

延安人民聚会、写信，为了确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不同意赴重庆谈判。假若去了，被扣下或杀头怎么办？人们忧心忡忡。

在枣园小礼堂，中央书记处一连开了几天会，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

这些天，延安的枣园与往日大有不同了，茂密的梨树林中，增添了毛泽东踱步的脚印。他们经过周密思考和研究，做出了决策：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毛泽东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出乎意料的蒋介石派张治中随行。8月27日，一架美式飞机飞抵延安。

毛泽东赴重庆，身边需要一位勤务员，当时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有孙振、秦昌怀和齐吉树。齐吉树身体魁梧，性格憨实，做事干练，经过几次筛选，决定让齐吉树陪同毛主席同机赴重庆，护理日常生活。齐吉树在主席身边几年，情况最了解。李克农对齐吉树说：“重庆与延安不一样，那里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特务多。主席的吃、喝你要照顾好。”

“是，我一定做到！”齐吉树立正回答。

这时，齐吉树与毛泽东的家庭特护李若准备10月份结婚。还有秦昌怀他们，两对一块结，组织上已经批准了。8月28日飞重庆，10月能否回延安就很难说了。是提前结婚还是推迟婚礼，就由这两对青年人去考虑了。

一日，江青对齐吉树说：“你去重庆的任务已定，去，婚事怎么办？”

“我与李若商量好了，推迟婚期，去重庆，一定把主席的生活照顾好，你就放心吧。”

秦昌怀留在延安，也要推迟婚期，等主席谈判胜利归来，再与齐吉树他们一块办喜事儿，到时还请毛主席参加婚礼呢。

毛主席和齐吉树身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洗

得褪了色。如果到了重庆就显得太土气了。

齐吉树问江青：“主席穿什么？戴什么？”

江青说：“两套外衣，两套衬衣，已通知北平三人小组了，近日就能送来。”

给齐吉树发了一身粗布蓝衣。他高兴地笑着说：“等从重庆回来，我可有结婚礼服了。”

“重庆那地方不同延安，穿戴讲究。衣服洗了，得熨烫平整。齐吉树，你会熨衣服吗？”江青问。

“不会。我们都是衣服晾个半湿不干的时候叠起来，一摩挲就平了。”

“呵呵呵！”江青笑了，说：“那样不行，你带个熨斗走，学学熨衣服，到那里没这个不行。”

齐吉树找到苏联在延安的医务专家阿拉夫，借到了电熨斗。又同江青一起去那里给毛泽东借了顶礼帽。

齐吉树拿来电熨斗不知怎么使，脱下自己的上衣学熨，烫来熨去还是不平整。江青走过来说：“干烫不行，衣服多半干或干衣服喷水，垫上块拧干了的湿毛巾，不然衣服会烫坏的。”她说着又做个示范给齐吉树看，把着手教给他，一会儿工夫就学会了。不过，熨衣服在陕北是用不上的，只有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才有用场。

毛泽东在陕北一直过着与战士同样的生活，穿布鞋着粗棉布衣服，齐吉树最了解他的家底，找不出一套象样的衣服，连双皮鞋都没有。师哲托叶剑英买来一双黑色皮鞋，北平送来套蓝灰布中山服。江青准备了两套衬衣衬裤。齐吉树又问：“除了这些，还带什么不？”

“再带点书，挑他最爱看的。”

“主席的书那么多，带哪本呀？”

齐吉树和江青一起选了几本马列的书和古代散文，还特别告诉带上陈寿著《三国志》，和司马迁著《史记》，再加上一些文件，装了满满一箱子。毛泽东看了看满意地说：“书是很沉的，就先带这些吧，需要的在重庆也许能买到。”

一切生活用品准备停当，齐吉树陪伴毛泽东整装待发。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你这顶帽子戴着不合适。”

□毛泽东回答：“稍微小一点，我知道。”

1945年8月28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毛

泽东起得格外早。他步出窑洞，遥望空中，天空特别晴朗，在宽绰宁静的枣园里踱步，宝塔山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事先有约，这天8时许，在枣园小礼堂集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了，周副主席是头一天从重庆坐飞机来的，提前到了。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说：“人到齐了吧？”

“到齐了，出发吧。”周恩来微笑着说。

10时半，毛泽东巍然屹立在机场，人群中的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延河两岸的山谷。

临上飞机前，周恩来微笑着对毛泽东说：“你这顶帽子戴着不合适。”

“稍微小一点，我知道。”

“小，也太薄，不隔凉。重庆酷热，一晒就透，受不了的。”周恩来随即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说：“你戴上我这个帽子试试。”

毛泽东把他的帽子摘下，给周恩来，周不要，毛泽东顺手戴在齐吉树头上。又戴上周恩来的帽子，挺合适。毛、周二人呵呵地笑了。

毛泽东朝周恩来说：“我戴上，你怎么办？”

“重庆是我的一个家，去了还搞不到个帽子。”周恩来微笑着说：“主席，人到齐了，上飞机吧。”

毛泽东与送行的首长一一握手、告别。又客气地让赫尔利先上飞机，又让张治中。主席步上舷梯，齐吉树紧跟其后，后边依次上飞机的是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

毛泽东走近机舱口时，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他停住脚步，回过头去望着上万的送行人，慢慢地摘下那顶盔式帽，庄重而轻缓地举起来，高高举过头顶，有力地挥动着，满怀胜利的信心，向欢送的广大军民告别，专机由西向东，冲上延安晴朗的碧空。俯看延安大地，欢送的人群，招手示意，恋恋不舍离去。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飞机在延安上空稳稳地转过一圈后，便直向西南，重庆方向飞去。

这是一架赫尔利的专用飞机，不太豪华，但舱内设备还不错。分软座硬座，中舱有一隔音室，室内有软卧。

张治中与赫尔利齐声请毛泽东主席进卧室。毛泽东礼貌相让：赫先生，张先生请。他二人都不去，坐在软座上。

齐吉树陪伴毛泽东进入卧室，把携带的东西放

好。说：“主席，您躺一会吧！”

“坐吧，坐着得看书。”毛泽东看书，齐吉树看到机舱最后有个空座儿，他便走过去坐下了。

不一会儿工夫，毛泽东叫：“小齐，小齐。”

齐吉树连忙走过来，毛泽东在床上坐着，“主席，你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吧。”

毛泽东让齐吉树也坐在床上，说：“齐吉树，这回到重庆去，你害怕不害怕？”

“不害怕，有主席呢，怕什么！”

“对，不害怕就对了。”毛泽东亲切地与齐吉树交谈起来，“这次去重庆谈判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谈判达成协议，胜利返回延安；另一个，被蒋介石扣起来，坐牢，杀头。你怕不怕？”

“不怕！”齐吉树20来岁，正血气方刚。

“你不怕，我不怕，人民都不怕。”毛泽东笑了笑又说：“第一个可能大。你知道吗？我们有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1亿多人民支持我们，一定能回来的。”

□蒋介石先出一言：“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起锅灶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还立锅灶干什么？”

时针指向下午3时45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素以“东方雾都”著称的重庆，这天却是难得的晴天。正是重庆炎热季节。正午一过，欢迎毛泽东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欢迎队伍中有各界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方面有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谭平山，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

毛泽东稳步走下专机后，把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这个消息立即被中外记者报道给全国全世界。

下午4时许，毛泽东坐上汽车后问张治中：“我住什么地方？”

张治中急忙回答：“委员长专嘱，请您下榻在条件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那里房间大，住着舒适，设备齐全。”

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们不住这个招待所。”

心情愉快的张治中，立时尴尬起来。少顷，他试探着问：“山洞林园的政府招待所条件稍差些，不知

可不可以？”

“可以住。”毛泽东干脆地回答。

汽车疾驶林园，毛泽东下榻后，勤务员齐吉树连忙问：“主席，先洗个澡吧，一会儿好用饭。”

“先不忙洗。齐吉树，你把今天重庆的报纸找来看。”毛泽东先看新华日报《号外》，报道了重庆市广大工人、农民、学生纷纷向《新华日报》馆表达他们对毛主席到达重庆的无限喜悦。登了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这封信，毛泽东用铅笔做了标记。

毛泽东看完报纸以后，才去洗澡。

当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同前往蒋介石在山洞林园的官邸赴宴，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应邀作陪。

这是毛泽东、蒋介石相隔19年后的第一次晤面。晤面时，二人在门口合影留念。合影后，蒋介石先出一言：“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锅灶了。”

毛泽东当即幽默回答：“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还立锅灶干什么！”

蒋介石无言以对。众宾入宴就坐。

齐吉树是北方人，他初次到重庆，对那里的生活很不习惯，不过他年轻，有些困难也能抗过去。

初到重庆的毛泽东，对气候、环境还比较适应，唯一不适应的就是吃不惯西餐。头一天到渝，就在蒋介石的招待晚宴上，吃的全是最好的黄油、牛奶、面包、果酱、牛排等。毛泽东吃罢后没说什么，齐吉树对警卫员私下说，这种饭吃不饱，远不如小米干饭、棒碴粥实惠。

8月29日早餐，仍然是西点。毛泽东吃完后就把齐吉树叫到屋里去说：“国民党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一天到晚都是面包、面包，我不习惯。你去和他们说，换成中餐。”

齐吉树和陈龙、龙飞虎商量，让龙飞虎去交涉。龙飞虎对餐厅管理人员说：“毛先生不习惯吃西餐，请改成中餐。”

人家推说：不能随便改，改了要受批评。

“中国人吃中国饭谁批评？”齐吉树生气地说，“一定是没有会做中国饭的大师傅了，纯系推辞。”他们一连提出三次，才改成吃中餐。

毛泽东吃完饭又问齐吉树：“你看中餐怎么样？”

“好吃。”齐吉树笑了。

□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们三位先到外面呆一会儿，我毛泽东不会出事的。”

□“哦，蒋介石就这样？”齐吉树说。

在山洞林园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国民党的宪兵、卫兵林立，把守非常严密。

毛泽东身边只有龙飞虎和陈龙两名警卫，每人身挎两支手枪。齐吉树只有一支手枪，别在腰间。重庆方面知道这三人有枪，让他们登记。枪支号码，子弹多少，要他们把枪和子弹都交出来。三人一商量，说：“想让我们空手赤拳吗，坚决不交！”齐吉树拿起登记表撕了个粉碎，扔进字纸篓。

重庆的夜幕来临，华灯初上，林园死一般的寂静。

夜8时许，毛泽东像往日一样，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报，齐吉树他们三个，人坐在旁边。这时，突然闯进来三个人，齐吉树和两个警卫噌地站起身警觉起来。来人冷冰冰地说：“你们三个出去，让毛先生留在这里。”

反映敏捷的陈龙三人喇地握住枪把，瞋目以视，静以待变。虽一言未发，保卫战似乎开始了。正在僵持不下时，毛泽东说道：“你们三个就先到门外呆一会儿吧，我毛泽东不会出事的。”

齐吉树三人立于门外一侧。不一会儿，蒋介石身穿军衣，在七八名荷枪实弹的保镖簇拥下，威风凛凛地来了，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立刻把前庭及门道里的电灯喇喇都关了，周围顿时一片黑暗，只有毛泽东的房间里透出一点点光亮。

龙飞虎小声对齐吉树说：“蒋介石，刚进去的是蒋介石，这可能是礼节性的拜访。”

“哦，蒋介石就这样儿。”齐吉树惊奇地说。

约摸半个小时，保镖出来先开灯，随后蒋介石匆匆离去，卫兵前护后拥。

齐吉树三人神情紧张地回到屋里，毛泽东坐在沙发椅上看报，一见他们就禁不住地笑了，说：“这就是所谓的拜访，不必大惊小怪。”稍停片刻又说，“看怪不怪，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首都、大后方，他们那么多人，那么多军队，我带了你们三个人，他们就害怕了，心虚啊。可笑。”

“做贼的都心虚。”齐吉树随便说了一句，逗得人

们都笑了。

毛泽东对他仨亲切地说：“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谈判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都很费精力，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斗争。对方提出“没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批驳：抗战8年，内战是没有断的，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列举诸多事实。蒋介石和他的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也无言以辩。看来他们对谈判也无任何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没提出来，只是敷衍应付，其用意是使谈判不得结果，把毛泽东拖在重庆。

毛泽东早有准备，颇有诚意地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的方案：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有平等合法地位。蒋介石死活不愿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顽固地拒绝解放区民主政权，实施“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来取消人民军队和有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斗争十分激烈，拖到9月20日，致使谈判完全停顿下来。

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搏斗紧密相联的。蒋介石秘密大举向解放区进犯，9月中旬，我军击退逼近张家口的蒋军。为了有力地配合谈判斗争，毛泽东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粉碎蒋介石、阎锡山向我进犯的“上党战役”计划。在战争进行中，毛泽东发出许多指示，通过红岩上空电波，飞过重重云雾，传到延安，传到各解放区。上党战场上，歼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3万5千余人，紧接着又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蒋军7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重庆谈判的斗争。

蒋介石诬称我方谈判“没有诚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撕下调解人的假面具，指责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使谈判又停滞不前，他便放风要“返国述职”，谈判陷于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指示拟写国共会谈纪要草稿，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则问题公布出来，把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并交由即将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去讨论解决。最后，以会谈纪要草稿为基础作了些修改，双方于10月10日签字。这就是重庆谈判的成果——《双十协定》。

历时43天的谈判，告一段落。

□齐吉树说：“蒋介石杀人了，他们胆敢把我们入狱吗？”

□毛泽东说：“坐牢，我们有看书的机会了。”

浓雾笼罩山城，山城细雨绵绵。压抑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签订协议的前几天，柳亚子拜访毛泽东。柳是毛泽东在广州工作时期的老朋友，他一到老朋友就兴奋地流出了热泪，促膝畅谈后，即兴赋诗一首：“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民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毛泽东应柳亚子先生的索求，亦把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手书赠与。柳亚子获宝书，喜不自胜。

傍晚，由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驱车送柳亚子回寓所。那天有人请毛泽东在戏院看《三岔口》和《十三妹》，周恩来陪同看戏，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是陈龙。

送柳亚子的汽车是办事处的，司机是雇用的，在回曾家岩途中，车速很快。路旁横躺竖卧有一群背粮食的国民党士兵，他们走累了，在这里休息。不料汽车将一士兵的脚压伤，士兵急喊汽车不停，旋即开枪，击中后座上的李少石，急送医院，因流血过多，不幸遇难。车开进库房，司机逃遁。此事即刻告知周恩来。周恩来为避免惊动毛泽东，悄然离开剧场，离开时说：“主席，我有点事先走一步，你继续看戏吧。”周恩来又嘱咐陈龙：“没有我的命令，一定不能离开主席。”

周恩来、王若飞立召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要他立即查清此事，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要张震自己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周恩来神态异常严峻。

张震一个立正，说：“是！”

同时，办事处派车去城里把正在逛街的齐吉树找回来。齐吉树一上车，见座位上有血迹，不知出了什么事。回到红岩，见到毛主席，方知原委。他年轻气盛，狠狠地说：“蒋介石杀人了，他们胆敢把我们入狱吗？”

毛泽东坦然地说：“坐牢，我们有看书的机会了。”

为了澄清事实，周恩来亲赴肇事地点巡访，证实这是一次意外的事故，并将真实情况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共产党敢于公开事实，颇受各界人士钦佩。

□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毛主席是你接来的，回去你送不送？”

□张治中诚恳地回答：“我应该接，应该送！”

10月10日下午6时，在桂园举行了《双十协定》签字仪式，11日毛泽东就要返回延安。

在这个时候，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周恩来得知张治中打算于《双十协定》签订后去兰州的消息，立即抓住时机，对张治中说：“毛主席是你接来的，回去你送不送？”

张治中诚恳地说：“我应该接，应该送。不过，我去兰州乘的飞机一般，毛主席坐什么飞机呢？”他陷入沉思。经过协商，决定坐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周恩来满意地朝张治中说：“劳你的大驾了。”

那天晚上，毛泽东住在张公馆。齐吉树得到通知，次日清晨，由红岩去九龙坡机场。他整理好行装，一宿没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

10月11日上午9时半，毛泽东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重庆各界代表几百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毛泽东在机场很高兴地见到齐吉树：“我的东西没落下吧？”

“没落下，全带来了。”

“好，咱们坐飞机回延安了，你高兴吗？”

“高兴，一夜没睡着觉。”

毛泽东在机场对中外人士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周恩来说：“人来齐了没有？”王若飞说：“齐了。”

“上飞机吧。”周恩来招手示意。由张治中先生陪同，毛泽东登上专机。

上了飞机，齐吉树大喜。飞机很大，中舱两张床铺。听说是蒋介石一张，宋美龄一张。毛泽东坐下，齐吉树坐在对面床上。放好了东西，齐吉树想去外边坐。毛泽东挥手让他不要去了，并说：“40多天，你辛苦了，回到延安放你几天假休息。这次没白来，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这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有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晴空万里，飞机飞行4个小时，下午1时半，抵达延安上空。毛泽东站起来，透过机窗眺望着隐约可见的宝塔山……

(上接 82 页)较多的论文围绕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炎帝的发祥地与活动范围、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当前炎黄文化热兴起的原因和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一些问题上的不同学术见解，会上仍有反映。特别是关于炎帝发祥地，有各种看法：湖北随州烈山(历山)说，陕西宝鸡濠峪说，河南新郑、密县华阳说等。有的学者认为，神农的发迹在南方，由南而北，再由北折南。还有的学者认为，考古发掘表明，中华文化的本源，正是南炎北黄的二元合成，过去以北方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史必须重写。来自不同地区、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学者，各抒己见，互相切磋，气氛融洽，心情舒畅。怎样看待当前对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的生地、葬地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不少与会者认

为，本质上说，这是件好事。因为它表明，炎黄子孙不忘祖，都有一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9月28日，与会学者驱车前往鄠县谒炎帝陵。当天下午，在中共鄠县县委书记卢耿民的陪同下，冯征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炎帝圣殿前敬献花篮，并在胡耀邦题写的“炎帝神农氏之墓”墓碑前默立。次日，全体与会学者来到行礼亭向炎帝像三鞠躬，并由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萧浩辉朗读祭文。台湾省姜氏宗亲会常务理事姜竹先生，在参加了随州、宝鸡的炎帝神农节活动后，也赶来与会、祭陵。

研讨会期间恰逢中秋节。晚上，明月当空。与会学者来到市中心的神农公园，登上神农阁，边赏月，边谈心。来自台北市立师范学

院的傅仲德先生，13岁时曾谒炎帝陵。相隔40余载，1990年重返故乡。他说，当时“百感交集，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再谒炎陵。”这次，他又风尘仆仆而来。在神农阁上，他即兴挥毫题诗：“风雨千年路，江山万里心，乘机渡海峡，虔诚谒炎陵。”据说，台湾全省有神农庙100余座。两岸同胞共祖同根，“血浓于水”，可见一斑。

10月1日，研讨会闭幕。株洲市人民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4周年，满城张灯结彩，一片欢腾。东道主株洲市人民政府和市社科联等，盛情邀请与会学者与株洲人民共度国庆节，入夜，大家又登上神农阁焰火。那绚丽多姿的焰火，正表现了炎黄子孙的满怀激情，象征着神州大地的光辉前程。

我在文革初期的 滑稽人生

□于光远



小引

我答应用这样的题目写篇文章，这已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现在文稿的日期越来越近，可是手边要“优先处理”的工作总是那么多，腾不出时间，而本人的健康状况，自知不应该再象过去那样通宵达旦地伏案写作了，于是决定偷一次懒，请陈小雅来，我提供素材，告诉她我的想法，由她写成文章。

不过，这个“小引”我想自己还应该动笔。

如果把1935年作为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起点，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一共有41年。在这41年中，前后两次加在一起倒有12年自己是处在革命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处在专政对象的位置上，一次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事实，自己忠诚地献身革命，会处在那样的位置。后来越来越明白，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历程并不如自己原先所想那样的简单，中国人有我那样的遭遇的也并非我一人，这样也就想得开了。同时我有些“阿Q主义”（为了别于鲁迅笔下那个愚昧落后阿Q，我称之为“革命的阿Q主义”），什么事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求知而言，世界大也无限，小也无限，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在那些年份，我过的并不那么“凄凄惨惨戚戚”，有憾事，也有自得其乐的趣事，我也一直在观察世界，增进知识，有机会我还找些自己开心和让别人开心的事做做，现在把“文革”这几年中的一些事情写下来，可以使读者了解我在那样的日子里是怎么过的一个侧面。限于篇幅，它只能包含“文革”前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下干校前的这一阶段。

写这些东西，我把握这样一个精神：不讲大背景，不对中国这段历史讲自己的看法，而只写那些年中自己亲身经历的琐事，而且在写这些事时，也不考察逻辑关系，不求连贯，而是对一件一件的事实经过逐个叙述，也讲一点当时自己的情感，而不去发表多少议论。每篇文章总想表现自己的特点，同时也只有这样去写，才便于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做，丝毫不意味我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漠视，恰恰相反，我是多么希望看到在我国有人经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本着对历史对真理高度负责的态度，写出若干部史料充实、观点正确、逻辑缜密、见解深刻的学术巨著。

中国多么需要有这样的书问世。“文革”的教训在11届6中全会的决议中作了基本概括，这个决议应该长期得到重视，而且应该得到发挥。现在和今后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以从“文革”的教训中吸取答案，找到解决途径。中国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真正科学的研究，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科学的著作，中国决不能忘记“文革”的教训。因为我现在写的只是一些琐事，我不希望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我不主张去对“文革”做极为严肃的研究，因此在这个小引中我不得不作这样一番申明。

“文革”开始距今已经26年了，那时还不那么懂事，甚至还不知记事的小孩现在也已经30多岁了。就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事隔多年，许多遭遇也都淡薄了。这里写的那些琐事，之所以现在我还记得比较清楚，那是因为当时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的原故。即使如此，它们之中有的就已经有些模糊，有的是逐渐回忆起来的。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地淡化是一回事，而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使得那些不该过分淡化的东西淡化得慢一些是另外一回事，应该把这三者区别开来。我国十年“文革”这段历史总的说来是不应该使它淡化的，它对中国人民的教育意义实在是太深刻了。我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不能把握未来”，何况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还在起作用，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形式在起作用，也可以说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淡化，不过许多人看不出这点罢了。所以我认为，该淡化的东西就让它们淡化吧，不该淡化的还是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让人们记得牢固一些。我讲的这些故事本是属于随便讲讲随便听听的范围，本来就不“浓”，更说不上什么淡化不淡化的问题。

不过我讲的这些感想，同我现在写的这些趣事憾事没有多大关系。

一、失去了到西藏的机会

1966年，算起来应该是5月，中央血吸虫病小组在成都召开会议，我随魏文伯坐专机从上海飞到四川。我对游历中国大地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当时成昆线正在兴建，我就借机经西昌西行，看看这伟大的

工程建设。事情由我倡议发起,响应的有杨西光和许家屯。沿途山势陡峻,道路崎岖。我们一行的“坐骑”经常置身绝境,自然是有一番险情,但一行中唯有许一人怯形于色,时常“哎呀,哎呀”叫出声来,弄得司机心烦意乱,平添干扰。

人。回来后不久,便成了专政的对象,而且一整就是十来年。

二、第一次挨斗



“全聚德”烤鸭店、“荣宝斋”珠宝店、“盛锡福”帽店、“戴月轩”笔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都被改名,原有的招牌匾额被拆除。

正巧,当时主持三线建设工作的彭德怀同志也在这一带视察。肯定是上面有指示,安排参观的人有意将我们一行与彭老总错开。就是,我们参观这里时,让彭总参观那里;然后再调换。但三线的接待能力有限,一天参观完毕,大家终究要会到同一地点夜宿。住宿的地方就在大道边,几栋平房,又逢初夏,所有房门都大开着。在马路上散步的我一眼望进去,彭老总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来,挥舞着手臂,兴高采烈地在谈话。也许彭总对自己的“软隔离”状态并无觉察,所以仍然高谈阔论,声播四邻。我们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屋子里,虽然不得与他正式见面,也算是列席旁听了。

成都会议闭幕后,我请当地同志买机票想到西藏去,因为时值夏令,出行的气候正好,又已经到了成都,高原已遥遥在望,此时不去,更待何时?但是,我忽又想到离京日久,家中还有不少工作,于是决定以后再去。

谁料,在北京等待着我的,并不是那些我放心不下的工作,而是“砸烂阎王殿”的指示,我也是殿中

“阎王殿”的大阎王,是中宣部长陆定一,二阎王是周扬;老阎王还有张子意、张磐石、李卓然、许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刚刚提拔的副部长,也是阎王;童大林是小阎王,因为他是刚刚提拔的秘书长。其他的处长副处长是判官,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处员是小判官。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领导班子的阵容。

我与别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个处长,但我是“副部级”,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大判官”在内部开斗争会时,我终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阎王殿”名声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和经济研究所,我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认识自己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斗争会。那次批斗的题目是“阎王殿”在经济所搞“假四清”包庇孙冶方。这事跟我本来没有关系,那时我在通县农村搞社教,不在那里,所以一开始斗的时候,他们没找我,但我“英明”地预料到,他们是不会饶了我的,那时家中的电话还没有拆掉,我就坐在家里,等候“传斗”。果然,电话来了,我去了。

斗争会上，我成了与那件事完全无关的主要斗争对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斗的是三个人，按顺序排第一的是张闻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孙冶方，直接有关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学部的和经济所的反面站在后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挨斗没有多少经验，我抱着考验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丝不苟地参加了斗争会。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怎样找机会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弯着腰听长篇大论的罪行控诉。我居然坚持了下来，而站在后排的人，斗到半截，就有两个坚持不住的，只听见“嘭”一声，人倒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可斗争会还得继续。当时，我对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力颇为得意。斗争会上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而是用全部注意力在作一种体力上的磨练，而且成功了。当有人对我们喊“滚吧”的时候，我拔腿就走。当大家发现我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我已经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了。

大概是因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赶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坐进洗澡盆，浑身泡在一池满满的冷水里了。

当时，因为天气热得要命，加上斗了半天……

三、头发的故事

一个人的尊严，大概与一个人的头是很有关系的，而一个人的头上，除了五官以外，就是头发了。如果穿一身好的衣服，没有一头好的头发，总觉得有些遗憾；买一个假发套，如果与身份气质不符合，也会使人倒胃口，可见头发也是很重要的。

“文革”开始，我还有一头完整的头发。

有一次，学部的人到中宣部来造反，其中一个女的看见我的头发依然完好，于是对我大喝一声：“好！于光远，你还逍遥法外！”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她已经上来，“咔嚓！咔嚓！”对我的头“开刀”了。原来，这也算革命的一个项目，她的手里早已预备好一把很大很大的剪刀，逢“牛鬼蛇神”便要“剃度”一番，然后对着你喊一通口号，再扬长而去。

我看自己的头实在是不好看，就到中宣部的理发室请他们帮我重新理一理，没想到他们好象也有气，把我的头理得乱七八糟。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到家里。我夫人从外面买回一把理发推子，帮我剃成了平头。从此以后我的头发

都是夫人帮我理的，几十年下来，倒省了一笔洗理费。后来我跟她开玩笑说：“多少年了，我该付你多少款呀？”

四、免遭抢夺之苦

“文化革命”中的两派竞争是很激烈的。抢人，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

有一天，北京对立的两派同时各要开一个批斗大会。一个是全北京的“地派”批斗大“走资派”的一个联合行动，属于地派的学部的“联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之一；还有一个，是属于“天派”的学部的“总队”，以批判学部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为山头斗争走资派。为要使批斗会开得有声势，被揪到会的人物的级别和知名度，是体现“革命”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这些“革命对象”事先并不知道。

大会的前两天上午，我只听学部哲学所要斗我，就跟着一个前来押送的人，到学部去了。学部当时是有名的“斗人”的机关。这次主要是斗我，我以为总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可是，没想到批斗会开得很稀松，精神也涣散，发言缺少内容，说话也没有什么力量，陪斗的只有一个“小判官”龚育之。斗完了，我们就回家了。过了一天又通知我哲学所还要斗我，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押送我了，从沙滩到建国门，走过来花的时间太多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吧。也许是我这人守信用的信誉，他们也乐得轻松，也就同意不来押送了。我骑车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回连陪斗的龚育之也没有了，心中不免有几分寂寞。斗争会开得比头一天还稀松，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

开过斗争会后还不让我走，中午还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也不让走，说是要我写检讨，交代问题。

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刘、关、张、杨都在，加上我，一共五个，我们一人一张桌子，一个红卫兵跷着“二郎腿”命令我们：

“你们写！”

写什么呢？我们都不清楚，杨述便去问监视的造反派，那人一听，勃然大怒：

“你自己的罪行你还不知道？还来问我？”

原来，我们只要动笔就行，至于写什么，谁也不知道。

大概是杨述提了问题，那个红卫兵就走到他跟

前看他都写些什么,没想到,他写的竟是自己和号称“独立王国”的北京市进行斗争的光荣经历,那人一看,又火了:

“你还有斗争?这不行,检讨就是检讨,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到了晚上,还不让我回家,说是明天另一派要斗我,会狠狠地整我的。他们自称有责任“保护”我,我有点着急了,于是说,出来时没有给家里打电话,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回家?”可以,网开一面!

我被送到王府井北大街的历史所、考古所那个地点。被安置在一个人的宿舍里,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但不久我就发现,好看的东西不少,比如象首长的讲话之类的东西,那时我们这样的人都是看不到的,于是我一个大饱眼福。

后来,我又被紧急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好容易捱到了天色擦黑,这时,被捕获的其他“猎物”也一个一个地来了,来人中有张闻天、李维汉、杨献珍、孙冶方、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过夜,睡统铺,一张木板床。李维汉、杨献珍就睡在我旁边。天气冷极了,穿上了大衣,上面压了棉被,我们还冻得直发抖。

第二天早上也没人管,我们只不准出院子的大门,我也就看了看院子里的大字报。吃了早饭以后,我们又被押上小轿车,只知道是继续接受批斗,但不知道会送到哪里去。

马达一响,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莫名其妙地被

调动了起来。情绪中有的紧张,有的是兴奋。我感到,电影中的情景出现了:我们的汽车一开动,立即,后面就有汽车跟了上来,我们加快,它们也紧追不舍,绕来绕去,最后跑到了工人体育馆。我们的汽车刚刚停下,后面的汽车已“咬”住了我们的尾巴。车门开后,大家一跳下车都使劲地往体育馆里跑,我的腿脚比较灵便,三步两步就跑进了门去,可惜张友渔动作太慢,后面车里冲下来的人将他一把抓住,我回看时,我的这位“难友”虽说不上是被五马分尸,但已被两边的人各持一端,“抢”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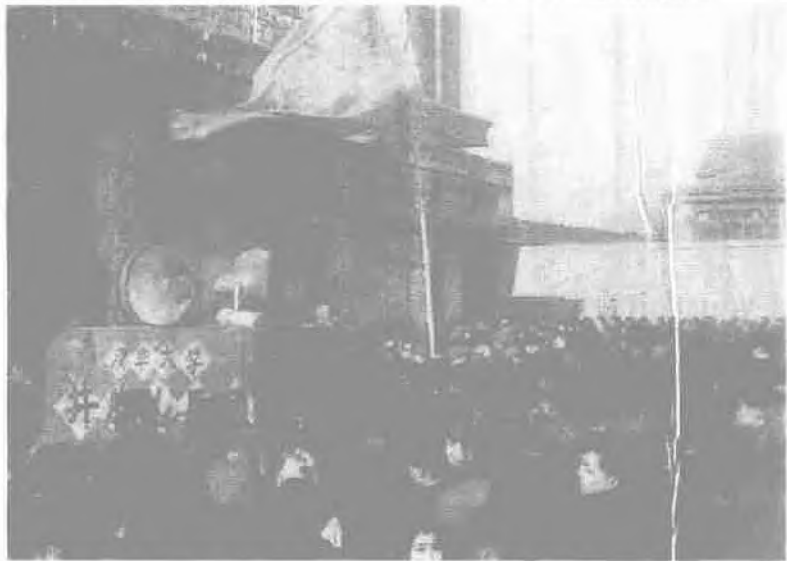
最后,大概是“抢方”的人力不足,张友渔终于被夺了回来。

我虽没有帮上“难友”的忙,但还是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免遭抢夺之苦。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头一天斗我们,写检查都是假的,目的是把我们都垄断起来,用以显示他们这一派斗争的实力。

进到体育馆中,果然感到斗争的气势不凡,这是全北京“地派”的一次联合行动,把当时最著名的“黑帮”都揪来了,打头的是彭、罗、陆、杨,后面还有李维汉、张闻天,以及一些大一点的人物。我排在差不多中间,排在我前头的是蒋南翔,后边的是杜润生。我们后面还有不少人,每一个黑帮配三个押送的红卫兵。服装一律草绿色,人都是棒小伙子。在他们把自己分工的那个黑帮押送到位之后,三个人中,左右各一人把黑帮的手往后尽量抬起,中间的那个人使劲地把黑帮的头往下按,这就是当时盛行的“坐喷气式

飞机”的姿势。我在“文革”中坐过许多次这样的飞机,比较起来,这是最正规的一次。这时,会感到腿上与颈上的筋受力最重。

斗争会开始后,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叫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上去,全场这时高呼口号,烘托气氛。等那人站定以后,便有人批判发言,发完言又是口号结尾。他完了以后,就是下一个。下一个进行时,前面的都不能走,直开到最后,50多个人把场子都站满了,斗争结束。后上来的人先退,也是口号不断。如此下来,官越大,到得越早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时间越长,“问题”越轻的人受的惩罚也越小,



清华大学红卫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宣传“破四旧”

从中也体现了一种“公平”。

当时室内温度很高，我被押着，眼镜、笔记本掉到了地上，前面汗水湿了一滩，但走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我，倒有一点一丝不苟的味道。

那一次挨斗真累。当斗完我，我回到海军大院去取自行车时，几乎骑不上去了，还是站在马路崖上，跨上车子，我才得以把车骑回家去。

后来我们了解到，被他们的对立面抢去斗争的人并没有象我们听说的那样被狠狠地整，还没有我们吃的苦头多，看来我们没有被抢走还是亏了一些；但我觉得，我还是不亏，因为说良心话，那差不多是我经历的“文革”的无数批斗会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

五、讨厌的“请示病”

我们这些“走资派”的上级“红卫兵”，是经常调换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来了个姓张的，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破烂，都归我了。”他自称是北师大的，我们猜想，我们已经被“移交”给北师大谭厚兰这一派了。

移交以后，他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他在上面经常批示的是三个字：“不深刻”。交日记本时要交到他手上，可他还给我们时，却是扔在地上，让我们各自去找。训话的时候，他常采取一种不可一世的派头：两腿叉开，双手叉着腰……

在他给我们规定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每天打扫厕所。

那时的中宣部大楼，早已成为革命群众的革命据点，全国各地来的人，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办公室的门锁着，人们就从上面的玻璃窗爬进爬出。晚上住在里面。厕所里大便堆得老高……那位张兄给我们布置工作时说，每天看看这厕所，就知道你们自己的思想有多脏，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

我们“黑帮”中有个小判官，算是“黑帮队长”，听完训话以后，他问了一句：

“星期天要不要打扫？”

“要，要打扫！”

这下把我们气坏了！你不问这句话，我们就不打扫了，星期天还可以偷点儿懒，同家人多聚一会儿，你这么一问，反惹出麻烦来，人家能说给黑帮放假

吗？

在这之后，我就在自己的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

六、摸一下“老虎屁股”

“文革”中北京有一个著名人物，此人名叫吴传启，他是王、关、戚在学部的一个著名打手，也是学部造反派“联队”的一个头头。建国后，吴在国务院“八办”工作，喜欢写些文章，文章写得还可以。他想到学部工作，我是同意的。我同他始终没有什么矛盾。

我处理过有关他的历史问题的事情。那是在1963年写“九评”时，我和一些同志住在钓鱼台。有一位同志找我，说吴传启在政治上不可靠，解放前他在武汉有许多可疑的事情。我向领导汇报后，传达领导意见，要这个同志写一个书面材料，结果那位同志又不肯写。我于是告诉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要他认真去查。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杨述没有把查的结果告诉我，而吴却因为毛主席的有个讲话没有让他听传达，很不满意地找到了我。我对杨说，你们抓紧查，免得工作被动。杨告诉我，已经查出了，吴是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党证。这话是1965年冬天对我说的，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文革”发动后，中央文革小组就看中了吴传启，他一下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学部召开的批判我的第一次斗争会上，我进场前就看见他站在场外指手划脚，显然是这次批斗的组织者。

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个人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吴传启有反对“大跃进”的右倾言论，说他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在1959年时还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大跃进？”这本是“革命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我们这些走资派无涉，但吴指使学部几个受蒙蔽的青年人贴出大字报，说那话不是吴说的，而是于光远说的，这一下，就把战火烧到了我的身上。

我本来对吴这个人的历史问题还只是怀疑，因为杨述只是对我说了那么一句话，以后又没有下文，而且“文革”中吴的对立派中有很多是学部政治部的人，他们对干部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他们给吴贴了许多大字报，但没有人说吴有历史问题。所以，我对吴的看法，那时也只是止于怀疑。但这事使我敢于断

定：他不是一个好人，人家揭发你，你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要转嫁到我的头上？你让几个年轻人贴大字报。可是他们在1959年时还没有到学部来，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根本没有资格说大字报上的那些话。吴让这些年轻人出来贴大字报，是一种很不正派的行为。我一气之下，也根本没有考虑“老虎屁股”摸得摸不得，没有去考虑得罪吴传启，就是得罪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准备贴出去。

但我的大字报还未贴出，经济所一个了解我和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战斗队就贴出了替我“解围”的大字报，说于光远的观点是“商品万岁”，他没有“价值万岁”的言论。原来贴吴大字报的《中国青年报》的人，又散发了他的传单，说明他的这个揭发，是1959年就向吴的单位揭发的。如果是于光远说的，为什么不向于的单位揭发，而要向吴的单位揭发呢？这样，这件本来会导致我和造反派正面顶撞的事情，就算解决了，我的大字报也就没有贴出。

这一次，吴传启这只老虎的屁股没有摸成。不久之后北京矿冶学院的红卫兵来找我外调吴传启的历史问题，我知道讲这方面的事危险极大，但是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知道的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向他们讲清。讲了之后，我一直耿耿于怀不知道什么时候吴传启这派的人会找上门来，我估计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而我，一个黑帮只有等着挨整的份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什么事也没有，平平安安地摸了一回老虎屁股。

七、当了一回“胜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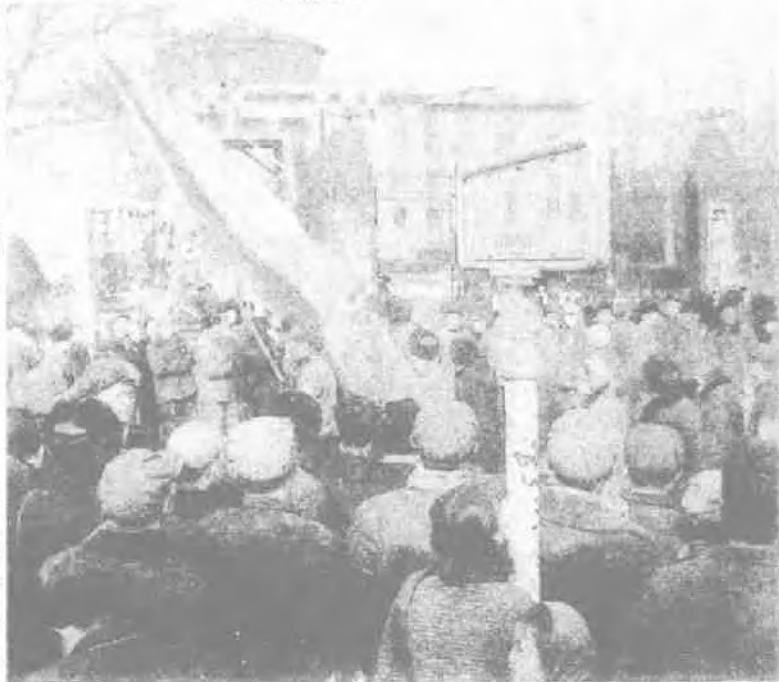
也许是因为我分管和涉及的领域比较宽，爱写文章，爱发表演说，讲话比较自由，因此我的罪行也就很全面，只有文艺工作方面，实在没有发表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没有人来批斗我，其它许多方面几乎都有我的份。有一个声讨我的材料上是这么写

的：“于光远除了插手文艺之外，他在下列领域都犯下了罪行……”这是因为在文艺工作方面实在找不出我的什么言论，但又不愿意把我完全放过，于是只好虚晃一枪，下面各项便都是“有事实”、“有根据”的了。由于我的罪行涉及许多方面，“文革”中，我也得到一个特别的待遇，北京组织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专门斗我。后来知道，为了布置批斗我，戚本禹还亲自参加过这个联络站的两次会议。

这个联络站下设许多分站：什么农经分站，心理学分站，科技分站……等等。各个分站每天轮流斗我，开始都是押送，但是这样他们也很累，我就说，你们也不用押送了，我就自己去，反正我也不会逃避。他们也就说，好吧！同意了。

有一次，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那一天，我去了，进门时要向我收门票，我说我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守门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票就不能进去！”我有心同他们开玩笑，先是说好话，求他们放我进去。他们向我解释说，现在有点乱，怕放进捣乱的人（我猜想他指的是对立派），所以进场的人都必须有票。

我对他说：“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还是要进去。”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

“不行，就是不行！”

他的阻挡，引来了许多围观的人，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让进去，而另一个人坚持要进去。看到人多了，我还是重复地提出我没有票但是应该让我进去的请求。

收票的人脾气上来了：“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

“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我十分有把握地说。

那人听我这么说，一时猜不透我的来头，有点儿慌了。

我于是问他：“今天你们开的是什么会？”

“批斗会。”他回答说。

“斗的是谁呀？”我又问。

“于光远。”

我说：“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在一旁围观的人一下就“炸”了，原来这个死乞百赖要进会场的人，就是斗争对象于光远。

那看门人还是不敢相信，叫来了组织斗争会的人。来人说：“是他。”这才算“验明正身”将我放行。

于是，我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八、“你对他笑干什么？”

有一天晚上，在西郊林学院开斗争会。开会以后，我才知道这次批斗的内容主要是在遗传学方面的“罪行”。

在遗传学这个领域中，门德尔、摩尔根、魏斯曼等人很早就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就，可是在苏联，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残酷的批判。他们捧出了一个名叫李森科的农学家，他是给摩尔根派打棍子的主要人物，1946年在莫斯科召开过一次遗传学科学讨论会，有一本发言记录，它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1956年，陆定一在怀仁堂作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讲演之后，要我在中国也组织一个遗传学讨论，体现与苏联不同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会不久就在青岛中国科学院招待所进行了。在会上，科学家介绍了遗传学的新成就，这些成就是支持摩尔根学派的，所以对李森科那派人是不利的。那个会开得很好，会后也出了一本发言记录。当时内部发

行，中国不少原来跟着李森科走的人，在会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也还有些人不服，于是趁我“文革”中成了斗争对象的机会，想重新恢复李森科学派在我国一度占据的统治地位。那次斗争会的对象是我，不过总要有一个“阎王”出场，才显得有份量。陆定一当然是最合适，但他们这些大头目，早就被“一级监护”了起来，一般人是揪不到的，于是，就揪来另一个“阎王”张子意来陪我，其实他连青岛遗传学会议的事情恐怕都不知道。

批斗会上有四五个长篇发言，我认出一个发言人是农科院的红薯专家。1965年我在通县搞社教时，曾请他来教农民搞红薯的温室育苗。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不错的技术人员。我原以为他没有什么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没想到他在这个斗争会上讲得居然头头是道，我当时有点出乎意料。散会后，在大门前厅我们迎面相遇，熟人嘛，不打招呼不好。于是，我便对他点点头，笑了笑。没想到，押送的人警惕性很高：

“你对他笑干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认识他，他是搞红薯育秧的，我没想到他作这类发言还能讲得那么有条理。”

我说这话时那位技术专家也在场，他的表情很尴尬，不知道我是表扬他还是讽刺他。其实我虽然不能接受他批判我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要他作这样的事也真难为了他，而且我发现他有一定的才能。我的真实思想就是我回答押送者的那些话，可是他并不相信，仍说：“你对他笑明显地有恶意，你在威胁他，你是不是想报复他？”

我说“不是。”

事后我想自己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当了批斗对象，还改不了这个评头品足的习惯，还在注意发现人的才能，这真有点儿滑稽，难怪别人不相信。

九、“要革命的干部”

在“文革”中，我有“两多”，一个是斗争会多。一个是外调多。在斗争会上，身体受点苦，但是很省脑筋，而且后来斗多了，自己也“油”了。人家喊“打倒于光远”我也跟着喊，趁机伸一下腰，活动活动身体，没有象开头时那么傻，吃那么多苦了。使我更伤脑筋的是外调，外调涉及了别人。如果来者是为了求得事实

真相，那倒没什么麻烦，但当时许多人“来者不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弄清事实，解放干部，而是为了打倒干部，罗织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回答得不好，就会使被外调者因为我讲的话处境更坏。但搞外调的人拿不到他们满意的材料，就要加倍地整我，迫使我就范。

对这种事情，我坚持一个原则，说实话，在事实面前不作任何让步。为此有时还挨过打。有一段时间，来找我“外调”的人特别多，我也就常常处在脑力高度的紧张和体罚的“车轮战”的状态下。

有一次，内蒙钢铁厂来人，就一位同志入党问题问我。这位同志是我介绍入党的，可是在两次交代我介绍他入党的情况时，细节有些出入，他们就抓住这点，说他是假党员，并说我的交代不真实，对我施加压力，几乎动手打我。最后，我坦率地对他讲，因为时间太久，回忆不清，细节问题上的出入可能是有的，但我介绍他入党，这是事实，你们要把他批成假党员，我跟你们没完！内蒙的来人还算客气，没有动手打我，只是威胁了一阵就算了。

还有一次，国家科委来人调查韩光的问题。在车公庄市委党校大院，专门接待外调的房间里，我同那人见了面。在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后，他要我写材料。我写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要我如何如何写，也就是按他们罗织的罪名的要求来写。他老那么罗罗唆唆，我听了很不耐烦，于是要他先回去，等我写好了，他们向管我们的人去取。他还是要我写，我也有点儿生气了，把笔往桌上一放，说：

“究竟是我写交代材料还是你写？”

他说：“你这个走资派，嘴还挺硬！”

我说：“我要对革命负责，对事业负责。”

他说：“难道你还是革命干部？”

我心想，我当然是革命干部，但我不敢那么说，我说：

“我是要革命的干部。”说话时，我特别强调了“要”字。

那人没“辄”，只好去找管我们的“组织”。过了两天，在市委党校的大院里便贴出了《于光远自称革命干部》的大字报。

十、20年前的一笔“帐”

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来审问我：“你要交代你是

怎么成了陈伯达同志的老对头、死对头的，首先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

一听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我心里就明白了，因为在延安，我和陈伯达只有一次接触，没有第二次。当然，以后我们也还见过面，但是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一次唯一的接触的经过是这样的：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分好几次连载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我读了以后，发现文中有错误，就写信批评他。他回答给我，约我到杨家岭他的窑洞见面。一见面他就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有学好，你对我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终生难忘。我这个人不喜欢讲谦虚的客套话，不过陈伯达长我十来岁，那时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学者，我还是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青年，他这么讲我还是很高兴，那天我们还随便谈了些别的，然后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年，延安把报上的文章汇集到一起，出版了他的这部著作。我得到后一看，竟一字未改，这使我惊讶之至。他对我讲得这么好，而行动上却一直也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对我的批评不同意，尽可同我争论，我也不会介意。如果他不愿同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说一句“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也比这样好。

与陈伯达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没有一个人象我一样，第一次见面，就对这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的一个特殊机遇。

要我交代延安时期就是陈伯达的对头，只可能是这件事。原来我认为他虚伪，没想到在这之中，还有一句不虚伪的话，那就是“终生难忘”四字。

那次审问，被我用装傻的办法应付过去了。我知道陈伯达不可能源源本地讲这件事，他说不出口，红卫兵也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事。我不觉得这次审查有多大压力，可是我夫人后来对我说，她当时知道这件事后，真有点儿为我担心，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大权在握，你得罪了他有你的好吗？的确，在当时，在他这种身份的人对我有这种评价，虽说不足以置我的政治生命于死地，也足够使我难以翻身了。不过，那次审问算是平安地过去了。

1972年，我从干校回北京，对我的“群众专政”解除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清华老同学王天眷，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你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吧？我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说，你不是在延安时起就是陈伯达的老对头吗？现在陈伯达倒了，你不就舒服了

啊？我问他何以知道此事，他说是从科学院的小报上读到的。原来，有一次陈伯达主张把列宁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气”字改成“子”字，要国家科委党组讨论，我在党组会上发表了基本上赞成对列宁的话进行修改，但只改动这一个字我认为不全面的意见。有人向他汇报我的发言后，他说了“于光远么，从延安的时候起就是我的老对头”这样一句话。

原来如此，文革中对我审问此事的原委总算搞清楚了。

十一、挨打纪实

在“文革”中，坐“喷气式”飞机的次数，已多得记不清了，但挨打的次数并不多，有过那么几回，但也记不清次数了。

第一次挨打倒还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沙滩红楼后面，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大楼前的五四广场上，靠近中宣部游泳池的地方，就在露天布置了几处审问“判官”的地方，每处放几把椅子，让审查者坐在那里，被审查者就低头站在他们前面答话。那一天，中国科学院院部研究室的几个“造反派”在那里审问我，一位女性的“造反派”担任主审。我顶了她几句，她就动手打我。一个知识分子女干部，居然动起手来，我是没有想到的。不知她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时，在旁的几位男性态度倒还比较平和，看得出他们也不赞成那女人的行为。我虽然嘴硬，但走资派毕竟不敢对“革命群众”回手，而且，我还有“好男不与女斗”的思想，所以就忍了；但越是忍，心里越是有气，所以态度就越是“不好”；所以，她最后得出结论：“于光远，你这个人就是顽固！”

事后，说老实话，我对这次挨打还真有点耿耿于怀。没想到“冤家”路窄，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遭遇了。

有一天下午，正下着大雨，我从新布置的设在中宣部传达室旁边的专供外调人员审问我们的席棚里出来，那个女人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中宣部大院来，正巧在传达室躲雨，她一见我，就在屋里对我嚷：“于光远，你进来。我有话要问你。”

我一看见她，就没有好气，说：“我现在正忙着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她气极败坏地大骂：“你这家伙坏极了，要把你

斗倒、斗臭、斗死！”

我一听乐了，嘲讽地说：“你还有新发明呀？我听说过斗倒、斗臭，还没听说过有‘斗死’一说呢！”

说着我就走了，我手里拿着雨伞，而且走得也不慢，她没有冒雨追我。

这个人的名字，别人告诉我多次，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到时候总是一下就忘了，现在当然更记不得。不过如果我想知道她的名字，我知道可以去问谁，但我不想问。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也就不能公布她的芳名了。虽然这件事我记得那么清楚，而且想起来还很生气，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宽厚的人。算来她现在也是六十开外的老妇人了，我想她自己应该还会记得这事，因为动手打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不应该是寻常的事情。

我还有几次挨打，有的是在外调人员的审讯过程中碰到的，但整个“文革”期间，中宣部的红卫兵没有动手打过我，也没有打过别人。中宣部的“黑帮”，都是挨外调人员的打比较多，有一个“判官”在挨打的时候用手挡了一下，结果被连打了好几下，批一句就打一下。中宣部的红卫兵站在一旁，没法给这位“判官”说好话。

我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在接受外调时。因为我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提供外调对象的所谓“叛徒”材料，结果他们说因为我是叛徒。所以我包庇他们单位的那个叛徒。他们用来打我的东西也有点特别，是一把木制的衣刷子。刷子打在我的额头上，眼部都打青了，去医院看了几次，还做了几天热敷，开了几天假。脑子倒没有损伤。

还有一类挨打是在斗争大会上，一般是动用拳头，也曾用脚狠狠地踢我。

有一次我挨打之后到北京医院问诊，病历里留下了这次挨打的记录，前几年偶然翻阅自己的病历还看到过它。

许多人经过“文革”的折磨，含恨至死或留下终身残疾，但我终于完好如故。为此，也有人赠我以“福将”的头衔。

十二、“牛棚”生活

1969年底，我们这些黑帮被集中起来，住进了“牛棚”。牛者，牛鬼蛇神也！“牛棚”者，牛鬼栖息之所也！牛鬼非人，亦即非人栖息之所也。

不过，我们住进去的牛棚，是货真价实的为人居住而建造的建筑物。那是北京车公庄大街上，市委党校内许多建筑物中间的一栋楼房。那儿本来是党校学员的宿舍，“文革”中学校不招生，大楼空着，就被许多单位用作集中看管“牛鬼蛇神”的地方。

让我们住进这样的楼房，已经是一种优渥。如果不采取别的办法，那么就无以把“好人”和“坏人”区别开来。于是，办法被想出来了：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内，安排6个人住，房间里没有床，也就是说，不准我们睡床，我们只能把褥子铺在地上，睡地铺。虽然中国远古时代的人不睡床，现在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如彝族、傣族等）和东方的日本人也保留了这种古风，但是，要已经睡在床上去了的人们重新睡到地上去，这就不失为是一种惩罚和污辱了。另外，我们的房间里配给每人一张小课桌，那是给我们写检查用的，但是没有凳子，凳子和床这两件器物，虽然不是历来就有，也说不定是否会永世长存下去，但它在大部分人类生活中出现，毕竟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在历来就享用祖先的这些文明成果的我们突然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时，我们才真正感到，自己当作非人看待的境遇。

除了没完没了的检讨外，就是每天例行的早请罪、晚汇报。地点在我们隔壁的一个洗脸间里，那儿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外调人员对我们的“提审”，有时也是在这儿进行的。中宣部的一个“判官”连续不断地挨外调人员的耳光，以及我挨“板刷”的经历，都是在这里留下的。

有一个对我来说很不习惯的事情是，其他5个人都抽烟，只有我一个人不抽，他们在房间里吞云吐雾，我不得不每天用鼻子吸进他们5个人吐出的烟。早上洗脸时，一盆净水，把毛巾放进去一搓，立即变成盆黄水。

一日三餐都是排队去食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放风”的好机会。趁此时刻，我们可开阔一下视界，瞥一眼院子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同时也知道在哪个地方有哪些单位的“牛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和真正的牛棚发生过关系。我当时给5岁半的女儿小东的信里，留下了这个

事情的记载。我告诉她，爸爸去一个奶牛场劳动已经好几天了，干的活是给奶牛们修它们跑着玩的地方，我们19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自己的铺盖就铺在地上铺着的芦苇上面，去的当天打了一种叫“敌敌畏”的东西，苍蝇蚊子都死了，接连三天都没有给蚊子咬。我还告诉她这里的白天很热，晚上却非常凉快，都盖被子，比北京城里好，就是睡得比较挤，一个人只有两尺宽，还有不少人睡着时出声，说梦话很热闹。在另一封信里我对女儿说，爸爸因为干的活多，吃得也多，一顿要吃好几个窝窝头……

是不是“牛棚”生活都那么难受，那也未必。大家日夜相处，比过去为工作发生联系的彬彬有礼的来往倒是随便了许多。所以我们有时也乱扯一气，有位老兄甚至发牢骚，说自己当年在上海，和江青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江青见了他象是不认识的人一样，面对自己如今沦落的这般的田地，想想那个女人权倾一时的情景，少不了有一番感叹。他的这段风流韵事，过去大家都不知道，现在他自己“坦白交代”，大家一下子都议论开来了。

“——要是她现在还记得你，知道你了解她的秘密，你今天还能平平安安地躺在这里瞎扯？”

“——你能有今天，该知足了，还发什么牢骚？”

“——你是不是想要她来‘解放’你？别做梦了吧？”

当时如果室内安了窃听器，那我们6个人准会给打成“现行反革命”。事后想起，真不知大家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

当然，这种“宽松”的气氛，也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出现。如果有外人在，我们便会很自觉地沉默不言，就象一个个标准的“专政对象”。

但我这个人生性爱笑，在“牛棚”也经常哈哈大笑。林涧清曾很认真地劝我：“我们过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

我接受他的意见，想想也真没有什么好笑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哈哈大笑一阵。

〔责任编辑：任远〕



蒋介石受降

侵华日军投降内情

☆张力

1945年8月20日,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明故宫机场。机场上,一架六个太阳徽的双引擎机,缓缓地滑向跑道,机体上油漆剥落,弹痕累累。这架双引擎机,是日本侵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的座机。但此刻,机上坐的不是冈村宁茨本人,而是他的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他着军装,剃光头,头上戴一顶硬壳帽,双手紧握着两腿间的战刀,眉头微皱,一言不发。与其同行的是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译员木村辰男中佐、松原喜八少佐、久保善助上士,航空员是技术熟练的小八重正男。

在沉默中,今井武夫挺直腰,捏了捏战刀,保持坐姿,尽力不让自己那种沉重的心情流露。然而,本次所执行的特殊使命,总与一种丑辱之感连在一起在他内心缠绕,这种感受自他踏上中国国土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的确使他难以忍受。但执行这次特殊使命是冈村宁茨大将的命令,作为军人,只有不折不扣的执行,不应有其它异想。

飞机渐渐降低高度,驾驶员松原喜八少佐与地面进行对话联系,前方的下面,就是汉口。

飞机开始向下滑航……

此时的汉口机场,已根据冈村宁茨的命令,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原因是,目前日军内部的思想还很混乱,军队中,还有少数军人,坚决反对停战,一些好战分子不肯放下手中武器。所以,今井武夫一行,所执行的特殊使命,一旦泄露,生命将会受到威胁,甚至有被炸毁飞机的可能。因此,加强保卫措施,是完成这次特殊使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独揽受降权蒋介石急电冈村宁茨

1945年8月10日凌晨,湖南西部山区,离芷江古城不到90公里的国民党四方面军王耀武司令部,除了偶尔传来哨兵的口令声,一切静悄悄的,只有远方的夜行车灯,不时和探照灯光交织在一起,划过司令部上空。

“叭、叭……”,司令部传出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为什么开枪!”一位中校参谋披衣走出房门,大声问。

“报告,太平洋联军司令部发来电报,日本天皇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夜色里,一个电讯员急促的回答。

中校参谋向电讯室望去,只见灯火通明,门口,电讯员一个个毫无倦意,脸上充满喜色,正举枪对空射击,以欢庆这一特大喜讯。

军人们纷纷起床,效法电讯员,拔枪向天空鸣放,整个司令部,欢呼声、枪声响成一片……

这一消息,是英、美两国通过中立国瑞士而得到的。在此之前的8月9日夜,四方面军司令部,已收听到太平洋盟军的电台广播,获知日本已经承认《波茨坦公告》作为终战后的基础,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想不到形势变化这么突然,一夜之间,日军便接受了《波茨坦宣言》。

天渐渐亮了,两小时后,四方面军司令部,分别接到重庆军委会和昆明陆军总司令部的电报,确切印证了日军已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喜讯。

但此时,苏联红军仍然在全

力进攻东北和库页岛的日军;美国的赫尔塞海军总司令也在继续同日军进行战斗。

直到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电台正式向全世界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各战场才逐步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四方面军司令部立刻将这一特大喜讯,通告所属各军,各有关政府和地方团体。

从军队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群情激昂,各种形式的游行庆祝活动,如火山喷发,四处展开。

此时的芷江城,也沉醉在胜利的欢欣气氛中。这座小县城,依山傍水,景色优美,城内以石板路,木板房为主,清澈的沅水河,穿城而过,奔流的水,给两岸的居民日夜送来粗狂而又欢乐的歌。

抗战初期,这座古老的小城仅有两万人左右,至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的许多军政机关、报社和学校陆续撤退到这里,加上这里又建有中美最秘密的战略航空基地,人口骤然增多,达到了10万余人,时称小南京。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外乡人,他们思乡心切,当听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犹如静水中投入一颗巨石,掀起了狂欢的巨浪,军人、公务员、学生、市民,先后举起巨幅标语,成群走向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大街小巷、机关学校,插上了彩旗,挂起了彩灯;从四乡进城来的龙灯、狮舞、高跷,故事彩车伴随着锣鼓声、喇叭声响成一片,彻夜不息;各种纸炮,用手抬,用肩挑,燃放不停,地上的鞭炮纸屑,扫了一层又一层……

与此同时,延安和全国各大城市,以及受日军蹂躏14年之苦

的东北人民和被日军侵占达 50 年之久的台湾人民,也处于一片胜利的欢呼之中。

在整个重庆市为欢庆抗日胜利而彻夜未眠的同时,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正背着手,皱着眉,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徘徊,办公桌上除了必备的办公用品和文件外,还放着两份由延安方面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一份是刚送到的,在这份报纸的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新华日报》社论,题目是《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万岁!》。

对延安一向存有戒心的蒋介石,微皱了下眉,眼光从社论上移开,他内心油然而增加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然后,当他把眼光移向第二张报纸时,内心骤然变得不安了——在这张报纸的显要位置上,写着醒目的标题:

延安总部发布命令
限令敌伪缴械投降
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

降,解放区抗日部队得坚决消灭它。

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我军有全权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并管理行政。(本报特讯)延安总部顷发表命令如下

……

延安总部的这道命令,虽是刊登在 8 月 12 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但事实上在 8 月 10 日就发布了,而当时日本还没有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蒋介石认为延安朱德总司令的宣布是冒失的行为,特别是命令部队占领他们能占领的大小城市,是唐突和非法行为。

就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延安总部的朱德总司令发去了一道命令,命令中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擅自行动”。

然而,蒋介石向朱德发出电报的当天,也给自己的嫡系部队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又给沦陷区伪军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维持治安”、“趁机赎罪”。

15 日,又任命当了多年汉奸的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警卫第一师师长刘启雄为第一路指挥,要他们负责京苏(南京和苏州)一带治安。命令中说:所有该司令官原统辖之军警保安团队,以及江苏全省,南京附近各种部队,统归该司令官节制指挥……

8 月 23 日,就在斯大林宣布满洲、库页岛战争胜利的这一天,何应钦命令冈村宁茨“收复”被八路军、新四军攻占的城市,交给国民党接收。

……

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在 8 月 13 日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即和毛泽东做了研究,由毛泽东亲笔起草二份电报,于 16 日前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了电,电报中说:“……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收到回电,气得狠骂了句“娘希匹”,便把电报向桌上一摔,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半晌不说一句话。

蒋介石的内心是着急的,他清楚,至今天为止,延安的反攻,已有 6 天,在这 6 天中,有大片的土地被延安方面接收了,而且,延安方面的大反攻还在继续……

虽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在盟军的协助下,从空中,从海上运送了大批军队,抢占了一批大中城市,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运输工具有限,很多地方仍然鞭长莫及。

蒋介石背着手,在办公室大步的徘徊……自从德国无条件



日本战犯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的情形

投降以后，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对日本的结局，早已有了认真的全盘的考虑……，此时，已拟出了日军六项投降原则……，他踱到办公桌边时，站住了脚，伸手按了下桌边一个绿色的电铃，立刻响起了悦耳的铃声，一位手握记录夹的军官，大步地踏进办公室，踩着深绿色的地毯，走到办公室桌前，“啪”的立正，打开记录夹……

蒋介石抬起头，语调深沉，一字一顿的念道：

“急。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将军鉴：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

蒋介石口述完最后一个字后，坐回了椅子上。军官将所记的内容复述一遍，然后，合上记录夹，向后转，大步走出办公室。

这六项投降原则，于15日上午由中央广播电台及政治部军中播音电台电讯总队等分别以中日两国语言向日军广播，政治

部还将上项电文，分别印成中日文传单，迅速送发日占区。

做完以上工作，下一步，便是在焦虑中等待着南京日军大本营冈村宁茨的复电。

在沦陷区——南京

冈村宁茨座机在汉口降落后，机门启开，今井武夫一行，一个接一个毫无表情地缓缓走下飞机。由于当地驻军事先已接到通知，机场已加派了岗哨，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此时，当地驻军已派车在机场迎候。

今井武夫一行，被引向各自的休息室。住室是按日本习俗铺设的，整洁、舒适，今井武夫一行，洗过澡，用过晚餐后，太阳已西沉，夜幕渐渐降临，但空气中的热气还没有完全消退，今井武夫由于心情沉重，坐了一会儿，便早早上了床，但近来在南京耳闻目睹所发生的一些事，又一幕幕在脑子里展现，他翻来翻去，难以入睡——

8月15日的南京，与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那种狂欢的气氛相比，又是另一番景象……

那是夏日的正午，天气异常炎热，市民中，一些对近来时局较为关心的人，迅速地扒完了碗里的饭，钻进房里摆弄起收音机，想听听东京电台在午间播出的新闻。这时，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日本最著名的广播员和田信的声音：“……这次广播极其重要。天皇陛下现在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播送玉音”。接着，响起了《君之代》国歌，稍停，传来了人们很少听

到的天皇裕仁的声音：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飭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

裕仁的声音，通过电波飞向全日本，飞向南京，飞向世界各地……

在南京，当人们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天皇裕仁宣读《停战诏书》的声音时，许多人震惊了，尽管很多人事先已有预感，然而，一旦成事实，心情就完全不同了……

而此时，日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在冈村宁茨的带领下，11时过后就集合在广场东西，按平时阅兵式队形，聆听天皇广播诏书，从总司令到警卫人员，都如一段木桩似的钉在空阔的广场上，静静的听着，每一个人的表面似乎很平静，但广播里的每一句话，都使他们震惊、绝望，直到广播结束，一个个目光滞如死鱼般的站在烈日下，连迈步的力气几乎也没有了。

整个南京，人们在震惊之余，便有了行动，汉奸、伪军、达官、贵人等，各自考虑起自己的后路，有的收拾金银细软准备潜逃；有的暗寻门路，打通关节，等待接收；有的自感罪孽深重，因恐惧而自杀。各种地下政治非政治的组织，也如雨后天春笋，不断冒出，各类不明真相的无线电讯号，彻夜不断，四处乱飞。南京的一切失去了原有的节奏，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混乱。

……

面对混乱的局面，南京日军总司令部的冈村宁茨，时常在他

的办公室或自己住室里发呆……，自从1944年11月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他就一直想显露身手，做点成绩，来报效帝国。但时运不佳，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连连失利，败讯不断。自己在中国战区发动的一次次进攻，也一挫再挫，收效甚微，致使士气下落，上下厌战。冈村宁茨深感前途渺茫，久战下去，必败无疑。但想不到时局的变化是那么快，自从他1944年11月任职，至1945年8月15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使他费尽心机的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落得个缴械投降的结局。

8月15日这一天，他收到蒋介石通过电台播出的六项投降原则。这六项投降原则，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还需要继续负起责任。首先，为了防止军心动摇，他与日本国内进行了联系，并很快取得结果，第二天国内派来了朝香大将，重新传达了停战的命令，使之在军官和士兵中，消除了许多节外生枝的流言。

这一天的下午5时30分，冈村宁茨向蒋介石发出了复电，电文如下：

“限即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8月15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屿参谋二人，偕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18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继飞至玉山。鄙处使用双引擎飞机一架，并无特殊标志；并请知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

玉山机场是否为蒋介石亲自指定的地点，就日本方面来说，还是不得不警惕，因为，也不能片面地轻易相信以蒋介石命

令为名的联系。但第二天，今井武夫仍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按计划乘专机向杭州方向飞去，飞机在杭州降落后，今井武夫立刻与以前负责和顾祝同进行秘密联系的浙江省省长丁默村会面，托他迅速查明真相。

晚饭后，丁默村同顾祝同电话进行了联系，并很快有了结果。丁默村当即转告今井武夫，因为玉山机场遭受破坏，还没有恢复，目前无法使用，上次的命令已经改变，将另行指定机场。

于是，今井武夫一行，中止了玉山之行。第二天一早，乘原机从杭州经上海返回了南京。

在今井武夫一行还没有到达南京之前的18日下午6时，蒋介石已复电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告诉他：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要他另候起飞，同时，规定了应当遵守的七点事项，电文如下：

“限即到。南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将军鉴：8月18日复电计达，今井参谋副长可于8月21日来湖南芷江，希遵照下列事项：

(一)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员(内须有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机场情形之飞行员一员)，于8月21日晨坐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起飞，经飞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5千英尺，时间为重庆夏季时间上午10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上午2时)，届时在6千英尺上空，当有盟军战斗机三架迎接之，如云层过低，该日机应在云层下1千英尺，盟机高度则在云层下5百英尺。

(二)日机标志在机翼上下各漆带有光芒日本国旗一面；并

于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尺长之红色布条一以资识别。

(三)盟军战斗机3架将护送该日本飞机至芷江机场着陆，着陆顺序：第一架为盟机、第二架为日机，第三架及第四架为盟机。

(四)今井参谋副长须随带驻中国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安南地区内所驻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

(五)如因气候恶劣，不能完成上述之飞行时，须于次日依照上项规定之时间与方式实施。

(六)日本飞行人员以波长5860KC收发，用英语呼号与芷江之空中地面指挥部取得联系，此种呼号在距芷江一百英里时开始以后，每隔10分钟一呼号，直至望到芷江机场为止，芷江无线电指挥降落塔用波长425KC，其英语呼号在望见芷江机场时，日本飞行人员即停止与空中地面指挥部联络，立以波长4495KC收发，与指挥塔联络之。

(七)接到此电后，须于8月19日重庆夏季时间午后6时至8时南京无线电台X,0,N以波长5400KC答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

冈村宁茨收到中正的电文后，于19日下午6时依限复电：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

今井总参谋副长一行率同参谋二人，翻译一人，乘中型双引擎飞机飞往指定地点，一切行动，依照尊电办理；但机身标志红色布带改为系在尾部。尊定周率5860KC，请改为5866KC，又495KC请改为4193KC。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未(18日)皓(19日)。”

双方的联络信号以及时间、地点确定以后。各自积极进入准备。蒋介石认真考虑并亲自拟定了前往湘西芷江举行受降仪式的特派代表……

蒋介石指定受降代表

蒋介石发出电文，指责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表的《限令敌伪缴械投降》的命令，是唐突和非法行为的同时，自己却用无线电台和冈村宁茨进行频繁的联系，积极布置拟订的接受日本投降的计划和部署，并亲自选定了受降地点，其效率之高，工作节奏之快，可为罕见。

接受日军投降，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军人都将以能参加本次受降，视为极大的荣誉，特别是这次受降的主持者，将为世人所注目。更主要的是：本次受降，将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物资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利益。所以，蒋介石不会把主持本次受降的大权交给他人，他经过慎重考虑，亲自选定了他的心腹，在高级将领中有童养媳之称的何应钦作为他的特派代表，来主持本次受降。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此时此刻，何应钦正在南宁，坐在他的小客厅里，很注意地听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读终战诏书。何由于留过日，精通日语，所以听起来并不费力。

何应钦听完了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停了一下，才关了收音机，心情激动兴奋地从小客厅站起来，在小客厅徘徊……

整个南宁市，沉浸在一片抗

战胜利的喜庆中，军队也爆发出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这些天，何应钦正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争取时间，把军队赶运前线。因此，他一直在忙碌中度过。

这天上午，他送走了几位满脸春风的黄埔生，刚坐回小客厅的沙发上，一名电讯员快步的走进来，行了个军礼，打开文件夹，将一份急电递给何应钦，何略扫了一眼，立刻留意起来，认真地看了一遍……

电讯员行了个礼，向后转，走了。

何应钦踱了几步，脸上浮现满意的微笑，原来，蒋介石在电文中指定他为受降特派代表，主持对日军的受降工作，所以，他必须立刻前往重庆，汇报和商议有关事项……

何应钦抬手按下了电铃……

一名传令兵大步地走进客厅，“啪”地立正。

何应钦慢慢回转身，开口说：“立刻做好起飞准备，飞往重庆！”

“是”，传令兵行了个礼，转身大步走出客厅。

8月的太阳，如一盆火，烈日下，三辆美制军用吉普向南宁近郊的机场疾驶而去……

绝望的航行

今井武夫一行，在汉口带着焦虑的心情，度过了闷热的一夜，第二天，天还未亮，也无任何起床信号，便先后起了床。

这时，专机已加好了油，做好随时起飞的准备，但飞机还不

能立刻上天。一是没有到重庆方面规定的起飞时间；二是投降日机标志，是要在机翼上下各漆上带有光芒的日本国旗一面。同时，还要在两翼的末端系上4尺长之红色布条。前一项在南京出发前就已办妥，但飞机两翼末端的红色布条没有准备。当时，冈村宁茨电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将红色布条改系在尾部。此事，现在是到立刻办理的时候了。

今井武夫命令参谋桥岛芳雄和当地驻军联系，桥岛芳雄立刻执行，他用电话和机场空军地勤进行联络，向他们详细交代红布条的尺寸要求，并要他们协助迅速将此事办妥。

吃过早餐，今井武夫一行，用随身携带的无线电报和南京联系了一次，汇报了自己的准备情况，得到的指示是：无新的变化，一切按计划进行。

今井武夫要随员们收拾一下，随后一起上车向机场驶去……，路上，除了偶尔看到操场上有几队无精打采的士兵，一路非常清静。临近机场时，远远看到专机的机尾上，已系上了红色布条。

车子在飞机不远处停下后，车门先后打开，今井武夫首先下车，向机尾走去，他当心中风大，红布条会被风吹掉或出现其它意外情况，今井武夫认真地看了看，又用手拉了布条，才放心地松了手，默默地走向车边。但此刻，飞机还未到起飞时间。今井武夫和前来送行的当地指挥官，向机场休息室走去……

参谋前川冈雄等人，利用这个机会，将电台和其它几件简单的行李送上专机。

不久,太阳已高高地挂在当空,各处已散发出夏日的炎热,细心的参谋桥岛芳雄,看了两次表,已到了日本时间的正午,也就是重庆时间的上午10时,是规定的飞机起飞时间了。今井武夫一行,在沉默压抑的气氛中,向送行的当地军事指挥官告别后,马上上飞机。

关上机门后,专机立刻起飞。升空后,很快调整了航向,按照蒋中正复电中的规定,向湖南常德方向飞去。

今井武夫端坐机内,默默无语,战败的耻辱感,重压在他的心头,他两手紧握着战刀,双眼透过薄薄的眼睛片,直视前方,他的外表,看上去似乎异常地平静,但他脑海深处,如沸腾的开水,翻流不息,带出了无数历史的旧事——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横行的历史,就如一本图文并茂的清晰画册,这些血淋淋的画面,在今井武夫的脑海里反复再现,勾出了中日战争的过去和现在,使他无法忘却,无法抹去。

“将军,已到了湖南境内。”桥岛芳雄看了看表,走到今井武夫身边提醒道。

今井武夫的思绪被打断,思想从过去的岁月中回到现实中,他慢慢地转头向窗外望去,只见下面是深蓝色的洞庭湖,茫茫的水面一望无际,湖水在热风中荡起细细皱纹,两只破旧的鱼船,如纸船大小,一前一后,在湖面上艰辛的耕耘……

今井武夫望了一会儿,眼睛已稍感疲劳,他扶了扶眼镜,将视线转向机舱内,向桥岛芳雄大佐,前川冈雄中佐等随行人员慢慢地看过去,只见一个个仍与昨

天航行一样,脸色阴沉,精神不振。今井武夫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责怪也没用,所以不想开口,他嘴抿紧了些,双眼从他们脸上移开,慢慢地向机尾扫去,突然,他吃了一惊——那里还搁着一挺歪把机枪,他睁着眼,看了好一会儿,脸色由红色变成紫色,瞪起眼问:“谁带上的机枪?”

随员们被突然的追问,吓得面面相觑,不理解今井武夫为何为这点小事,如此认真,一个个胆战心惊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向机尾望去……

今井武夫认为这不是小事。因为,自从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日军内部出现了许多剖腹自杀的现象,同时,也有叫嚷不惜性命做最后一搏的日本青年军官。况且,在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就出现了少壮派军人叛乱的事件。因此在同行的8人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那种充满武士道精神的军人。

今井武夫待了片刻,见没有一人回答,站起来,一只手紧握战刀,又厉声问:“快说,是谁带上来的!”

随员们丢魂落魄地僵直地挺着胸,大气也不敢出。

今井武夫锐利的目光,在一个个脸上扫过去,当目光落在桥岛芳雄大佐脸上时,他向今井武夫颤颤惊惊地说:

“阁下,我以为,机枪可能是原先留下的,由于一时疏忽,没有仔细检查……”

今井武夫抿着嘴,没有说话,桥岛向他看了一眼,又说:“要不然,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带上机枪呢?”

今井武夫的手松开战刀,放

到后背,态度似乎软了些,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完全消除怀疑。

桥岛还想开口,今井武夫挥了下手:“不要罗嗦,快地丢掉!”

桥岛芳雄不敢怠慢,在今井武夫严厉的目光下,将机枪抱至机舱门边。然后在参谋前川冈雄的协助下,把舱门推开一条缝,一股凉风从窄缝里涌进,桥岛芳雄向门外望了一眼烟波浩淼的洞庭湖,随即抱起机枪,丢出舱外,机枪脱离专机,向下坠去,越来越小,在湖面上泛起一个小白点,消失了。

今井武夫转过矮胖的身子,坐回自己的位子上。一会儿,他的心情平静了许多,细一起,刚才的态度似乎过火了,的确是这样,自己自从听了天皇的终战广播后,不仅对前程失去了信心,情绪也越来越反常了。不是吗?一个帝国将军,竟为一挺可能是无意中留在机舱的机枪,动起肝火,的确是有些神经过敏了。

蒋介石的召见

此时,在蒋介石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当日收到的电文和报告,这些电文、报告,有的来自正在前方调动中的国民党军将领;有的则来自日占区的谍报人员,通过特务头子戴笠之手,转到这里的,电文报告了日军的动向,以及延安方面八路军的反攻情况。其中,有的还是从日占区的伪军手中发出的电文,内容是,请求给予任命总司令或先遣军总司令之类的官职的,说是以便于配合重庆方面做好对日军的接受工作。

对这些电文或报告,蒋介石一一过目,有的气愤地将它往旁边一丢,置之不理,有的则当即举笔写上了批语。

对于伪军方面来的电文,蒋介石特别留意地一封封看完。因为,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已与伪军建立了秘密关系,蒋需要通过这些电文,掌握目前情况下,伪军和日军内部的动向。

为了进一步促使伪军为其效命,8月11日蒋介石还向伪军正式发出了通令,其内容是——“日本政府于10月晚8时已向中、美、英、苏盟国声明投降,我沦陷区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仰各凛遵为要……”

这道命令发出后,对已无路可走的伪军,的确产生了奇效,特别是许多上层军官,开始积极地为重庆国民党效命,有的主动

发来电文,向重庆方面汇报情况,有的甚至一天发出数道电文,大事小事报告不断,其中,陈公博、周佛海还联名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员飞南京接收政权,并表示愿以36万军队“保卫京、杭、沪三角地带”,阻止八路军、新四军的接收……

蒋介石翻着一叠叠从伪军方面发来的电文,心中较为满意。

为了使伪军发挥更大的作用,蒋介石在办公桌前踱了一阵步子,终于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他抬手按下了桌边的电铃。

一名速记员迅速地来到他身边。

蒋介石背着手,踱着慢步,向速记员口叙了数份对伪军将领的任职命令……

口叙毕,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声,蒋介石转身,稍停了停,坐回椅子上。

速记员夹起记录。蒋又补充道:“此令仅做口头传达。”

“是!”速记员行了个礼,退出。

一名侍卫官和速记员擦身而过,来到蒋介石办公桌前,双脚一并,行了个礼“报告委座,何总司令已从南宁乘飞机赶到。”

“要他客厅等候,我立刻会见。”

“是!”侍卫官刚向后转,远处又传来两声枪响。

“等一下。”

侍卫官又转身,“啪”地立正。

“放枪的是谁?”蒋介石沉下脸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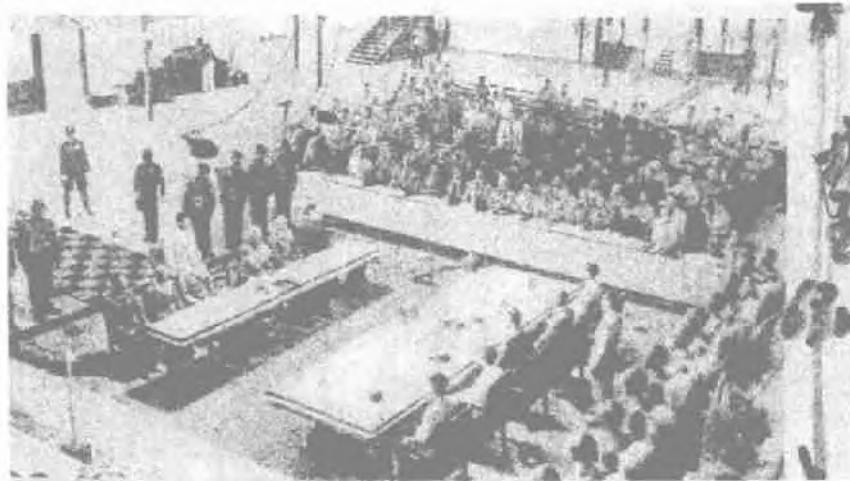
“是,是一位少尉排长,家是东北的,因为抗战胜利,可以回家了,心情太高兴,放枪祝贺。”

“胡闹,纪律松弛,扰乱军心,先交禁闭室!”

“是!”侍卫官匆匆行了个礼,退出办公室,心里咚咚直跳,想:要是以后委员长忘了,这该死的排长,恐怕要一辈子坐禁闭了。

蒋介石阴沉着脸,坐了片刻,看了一眼表,起身大步地向客厅走去……

何应钦下机,没有休息,立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于1945年9月7日在南京举行。
图为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在降书上签字。

刻来见蒋介石。他知道蒋既然向他发来急电，一定有要事需要马上商议。况且，自己也有许多事要立刻向蒋汇报，要不然，下一步就不好办了。何应钦清楚，在蒋介石手下做事，无论大事小事，先汇报为好，若是自作主张，办不成是小事，说不定还要栽跟斗。

何应钦在客厅的沙发上刚坐下，便有人送来水果和茶，何喝了几口，蒋介石那修长的身体，便在客厅门口出现。

何应钦放开茶杯，马上起身立正。

“敬之，你来的很快。”蒋介石脸上露出笑容，一只手向何坐的那张沙发伸了下，两人同时坐下来。

“敬之，这次，我要先听听你的情况，特别是军队行动情况。”

何应钦略沉思，然后侧过身说：“我于8月11日，接到委座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之电令，对部队作了新的调整，利用一切交通工具，从陆地、空中、水上齐头并进。首先，重点接收委员长指定的各大城市。目前，虽然已取得相当的进展，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运输工具缺乏，一些部队在一段时间里还难以到位，许多地区仍鞭长莫及。”

蒋还向何透露，美方对中国未来的局势非常关心，为此，抗战结束后，美方将继续提供新式武器装备，以提高国民党陆军战斗力，在已装备37个师的基础上，近一年内，计划再装备15个师。

“敬之，只要我党精诚团结，携手奋斗，前程大有可为。”蒋介石脸上现出微笑。

“委座所言极是，我何某一

定竭智尽忠，努力效命。”

“还有，你的重要使命——以我特派代表之身份，全权负责对日军受降……必须立即准备。”

何应钦起身，“啪”的立正：“决不辜负委座的厚望。”

……

“至于伪军的收编，仍按你和健生（白崇禧）的意见办。”

“是！”

……

飞往芷江

自从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电台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一直处于繁忙之中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东奔西走，事事过问。但又深感职高无权，不得不处处谨慎，事事向蒋介石汇报，心中有时也免不了埋怨蒋做事太独断。但又不敢立异执言，自作主张。

8月18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3天，为了确保芷江受降的顺利进行，经蒋介石同意，何应钦指定国民党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冷欣、蔡文智和处长钮先铭飞往芷江，为受降做准备。

这天上午，副总参谋长冷欣、蔡文智和处长钮先铭一行3人，踏上了飞往芷江的专机……

此时，离蒋介石指定的受降时间——8月21日，仅有3天。何应钦和其幕僚，积极研究详细会谈内容和拟订有关备忘录。

同时，何应钦还电告张发奎、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参加本次

受降的各战区长官，务必在21日前飞往芷江。

副总参谋长冷欣一行3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到达高山重叠，松林茂密的湘西山区。20分钟后，专机在芷江机场徐徐降落。

机门启开，身材瘦小的副总参谋长冷欣，首先走下飞机。他毫无倦意，东看看，西望望，对这座位于湘西雪峰山区的军事重镇，似乎有许多难忘的感受，特别是数个月前，围绕这个战略要地和日军展开的一场大战，这场大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所以，给冷欣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由于时间不长，战争中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这场战争，使这一军事重镇，变得更加名传遐迩。

由于时间紧迫，冷欣一行，刚安顿下来，立刻将这次来芷江的意图，向有关方面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认真研究，做了具体安排。

首先是受降地点，为了便于警卫和工作上的方便，决定选择在机场南面的磨溪口。这里离芷江城只有七华里，房子是空军俱乐部的木结构平房，它依山丘，傍沅水，寂静而隐蔽，是本次受降的理想地点。

其次，是迅速组织士兵、民众以及各界人士，在受降会场内外，在城市和乡村，在公路上的适当地点与场合，张灯结彩，隆重布置……

这项工作交给了第四方面军与新六军两位副官长赵汝汉、敬远平负责。

几天前，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狂欢不息的芷江军民，此时，又听说日军要到芷江来投降

的消息,仿佛平地里刮起一股强劲的旋风,立刻吹遍了芷江的各个角落,民众、学生、商人……,再次喜笑颜开地涌向街头,欢乐之声。传遍了芷江城乡,整个芷江又一次沸腾了……

人们主动在自己门前添上更多的彩灯彩旗,街道上,马路边,一队队一群群穿流不息的人,有的背着一捆捆松柏,自动前来协助扎凯旋门的;有的抬着一对对巨大的彩灯,是送往指定地点悬挂的;还有扛着楼梯,拿着刚写好的巨幅横幅,赶到显要路口去张贴的……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蒋介石办公处,肖毅肃总参谋长向蒋

介石汇报了对本次受降的准备情况后,挺胸端坐,静听蒋介石的答复。

肖毅肃中将是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心腹,时常往来于蒋、何之间,参与研究并传达各种重大机宜。

蒋介石听完肖毅肃的汇报,略思片刻,起身,踱着步子说:“转告敬之,在日军降使到达之前,可在芷江设立前进总部,以利干工作的主动。”

“是,立即转告!”

蒋介石放慢了步子,但没有停步。

肖毅肃双目注视着他,等他转过身来时,又说:“不过,委座,本次受降,有大批中外记者,申请参加采访,是否一律放行?”

“对外国记者,可以破例,但要慎重审查,从严放行,其具体事项,你与敬之研究。”

“是!”

此次受降,做好扩大宣传,意义非常之重大,特别是扩大国际影响,增强国际地位方面,是难得的良机,但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借助于外国记者。

况且,在

上月底(1945年7月25日)国民党当局召开的新闻会议上,美国记者就禁止外国记者来华访问之事,当面提出了质问。

鉴于以上情况,放宽外国记者的来华采访,势在必行。

8月19日,肖毅肃乘专机从重庆起飞,前往昆明陆军总部……

肖毅肃向总部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对有关事项进行了研究,并于当天乘原机返回重庆。

之后,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重庆军委会对有关事项做出详细安排,并决定,在受降代表到达芷江的当天,在芷江设立“陆军前进总指挥部”。

至于外国记者参加本次受降采访之事,何应钦认为,只要他们不再生是非,不违反有关临时采访规定,皆可放行,这既可回答上月底外国记者在新闻会议上提出的质问,又能扩大本次受降的影响,是一举数得之事。

至20日,分布在国民党各大战区的高级将领张发奎、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陆续到达芷江。

上午到达芷江的有:

- 第一方面军:卢汉
- 第二方面军:张发奎
- 第三方面军:汤恩伯
- 第四方面军:王耀武
- 第三战区:顾祝同
- 第六战区:孙蔚如
- 第七战区:余汉谋
- ……

下午,又有4架运输机,带着巨大的隆隆声,飞临芷江上空,先后降落在芷江机场。

走下飞机的有何应钦、肖毅



日军向八路军投降

肃、美国中国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鲁等，以及行政顾问团和新闻记者达50余人。

被称为笔夹风雷的名记者严怪愚，也搭乘新六军廖耀湘的小吉普，从安江赶赴芷江。

……

这一天，参加本次受降的各有关人员，都利用各种交通工具，从陆地、从空中赶到受降地……。

历史的嘲弄

8月20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参加本次受降的各军政要员，全部会集到了芷江。他们一个个满脸红光，相互道贺，高兴交谈。

夜幕降临，欢乐喜庆的气氛似乎更高涨了，电灯、汽灯和点亮蜡烛的灯笼，五颜六色，举目

皆是。俱乐部也响起了优美的舞曲声，歌声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离机场不远的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灯火更是明亮。

原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集各军政要员，在这里连夜召开会议。

此时，各要员陆续到齐，入坐后，正在高谈阔论，何应钦踏进会场，大家立刻起立，何应钦向到会的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以及河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要员扫视一遍，说：“诸位请坐。”

整个会场完全寂静，一个个挺胸端坐。

何应钦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陆军前进总部……”

许多不知情的人，表现出吃惊的形色。

何应钦继续说：“陆军总部奉命代表全国受降，总部工作应尽快全部转入办理全国有关受降事宜……”

……

接着，何应钦又提出以下几点内容：

一是目前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部队运往各沦陷区，并以备忘录通知日军司令部，在接收部队未到达之前，要确保城市和交通线上各要点，日军的所有武器、装备、物资，没有我陆军总部的命令，不得让任何人接收，如果有强迫接收的，可以以武力抗拒；

二是迅速做好空运准备，随时将部队从芷江空运至上海、南京两地；

三是在总部未迁到南京之前，立刻派出指挥所进驻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沟通正常联络。

四是第二处要特别注意第十八集团军及有关部队的行动。

最后，何应钦还决定，本次受降会谈结束以后，派二处上校陈昭凯和三处上校张汶杰，以及空军少校孙桐岗，与今井武夫一同乘飞机去南京，督促日军司令部，为我指挥所进驻南京作好一切准备……

整个会场，个个端坐静听，只有身材瘦小的冷欣，身体时有晃动。

何应钦讲完，大家松弛了一下神经，会议便转入新的议题，商讨接待日本投降使者的问题：

立刻有许多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会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一名上将提出：受降会谈应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一意见，立刻得到几位将领的附和。

一位较年青的少将认为：会谈时切不可讲过于刺激的话，以免引起日本投降使者的切腹自杀……

……

但这些议论，遭到了部分人的反驳，甚至个别人的痛骂。

……

会议决定，接待日本投降使者，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按规定的时间进行，而且要以号音为准，这样既严肃又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

但对于受降会谈的形式，会上决定：仍按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后一点，虽然受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但还是这样定下了。

最后，根据蒋介石18日下午6时，给冈村宁茨复电中的第三点：“盟军战斗机3架将护送该日本飞机至芷江机场着陆……”之内容，进行了讨论。

到会的美军代表金武德提议，希望派美军空军战斗机群去接今井武夫一行，并保证完成任务。

但经过讨论后认为：日本政府是向中国政府投降，应派中国空军的飞机去护航较为适宜。

何应钦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由中国空军去护航。

今井武夫一行乘座的冈村宁茨座机，接近常德上空时，突然，前面白色的云端里，传来战斗机的隆隆声，今井武夫的心，立刻悬了起来，如果真的被袭，他会毫不犹豫地地下令，破釜沉舟，与飞机同归于尽。

这时，只见3架战斗机飞出云端，直向今井武夫他们飞来，经辨认，原来是盟军的3架野马式战斗机，这3架战斗机，是根据蒋介石18日下午6时给冈村宁茨的复电，前来给他们护航的，大家的心才平静下来。

3架战斗机，围绕冈村宁茨座机飞了3圈，然后，前引后导，继续向前飞行。

飞机进入了湘西雪峰山区，机腹下是一峰连一峰的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阳光下，仿佛波浪翻滚的绿色海洋……

今井武夫向机仓外望去，只见下面一处悬崖上，好像有一只大山鹰，在慢悠悠的盘旋，大概在寻找腐臭的尸体吧？

今井武夫还记忆犹新，两个多月前，中日双方曾经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大激战，日本方面死伤达28100余人，116师团第109联队长陇寺宾郎、34师团第217联队长木佐清次，也战死在这雪峰山区……

冈村宁茨的座机，在茫茫的原始雨林上空飞行，今井武夫呆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默默无语，他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两个月前发动的芷江攻略战，曾拼死苦战，死伤了28000余名日本军人而没有占领芷江机场，而两个多月后的今天，自己倒是带着战败的耻辱，亲自来芷江机场了，这不是历史对自己的嘲弄，对日本军人的嘲弄吗？

飞机在隆隆飞行，前引后导的3架野马战斗机，使今井武夫有一种如罪犯被押上法庭的感觉。

难咽的苦酒

宽阔的芷江前进机场，四周那深绿色的草地上，渐渐聚集了不少人。10时左右，已是人山人海。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只见中美军人都穿着新的或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耐心地等待这盼望已久的时刻；几位河南、湖北、山东籍的伤兵也聚在一起，不时绽出笑脸或骂一两句粗话；从城乡赶到机场的男人和妇女，边抹着汗，边满脸喜气地寻找自己观看的最佳位置；柱着拐棍的老人，时时把干瘦的手举到额上，仰望天空……

人们的心情即喜又恨，又悲又乐，可谓百感交集，难以言语。喜的是八年艰苦抗战，付出的巨大代价，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恨的是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铁蹄横行，大肆烧、杀、抢、奸，残害了多少无辜；乐的是日军穷凶恶极终于到了尽头，今天就要亲眼看到他们前来垂首乞降的狼狈相。

投降的日机渐渐地临近机场上空，人群由于激动而有些骚动起来……

今井武夫从飞机上俯视芷江机场，只见分散隐蔽在周围各处的中国飞机，有不下百架之多，不由得暗自惊叹经过多次空战后的芷江空军基地，其实力还有如此雄厚。

这时，机场上，荷枪实弹的宪兵，密排在跑道两旁，紧握着枪，一脸正经，纹丝不动。

日机在跑道上冲了一段路后，停在跑道尽头的草地上，几乎和绿草一色，远远望去，如一只青蛙。

人群立刻向日机停的方向涌去……

由于持枪的宪兵警戒森严，

难以近前。

5分钟后,日机驶向了指定地点。在人们的注视中和宪兵的严密保护下,启开了机门……

两名挂少校军衔的中国军人:一名是被指定改挂少校军衔的陈应庄;还有一名叫陈祖贻;8年前今井武夫在北平时,陈应庄在那里当过新闻记者,两人曾会过面。陈应庄和陈祖贻都懂得日语。由他俩来做接待,是中国陆军总部的精心安排。此时,陈应庄和陈祖贻都换上了一身崭新笔挺的军装。他们大步走到宪兵警卫圈内的日机门前……

首先出现在机门口的是戴一顶硬壳帽的今井武夫,他着军装,佩军刀,戴一幅黑边的眼镜。

陈应庄、陈祖贻两位少校,用日语自报了官职姓名……

今井武夫双脚一并,立正问:“是否可以下机?”

“可以下机。”陈少校用日语回答。

此时,几十架摄影机和更多的照像机,都急于向前移动。

今井武夫缄默无语,面带威容,走下飞机。

陈应庄拿着名单,一一核对,其顺序是:

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前川冈雄少佐。

译员:木村辰男中佐。

驾驶员:松原喜八少佐。

航空员:少八童正男少佐。

雇员:中川正治和六保善助。

宪兵对日军所携带的行李,进行了象征性的检查。完毕后,小八童正男,走到今井武夫前面“啪”的立正,行了个礼,问:“行李是否全部带上?”

今井点头同意。

许多电台报社的记者,又一齐抢上前,急于进行拍照和提问。

负责安全警戒的一位军官,着急起来,连声说:“不要挤,不要挤,等一会儿把车开到大家面前,有3分钟让大家拍照。”

这时,开来了4辆吉普车,列成一行,停下。中间的两辆插有白旗。

陈少校引导今井一行,先后坐上了中间的两辆降车,自己坐到了最前面的一辆吉普,最后一车就坐的是担任警戒的宪兵。

车子开动了,坐有日本投降使者的第二、第三辆车,开到记者群面前停住。

记者们立刻各自选择角度,举起像机进行抢拍,只怕放过了这宝贵的3分钟。

车上的日军降使,没有一个动弹一下,全都挺直地坐着,目光下垂。

3分钟后,吉普车向空军总站宿舍开去……,这里距宿舍约两公里,已站满了中美两国军人和拥挤的市民百姓,有的举起相机对他们进行拍照,有的伸出两个手指,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一路上,无数眼睛,望着日军投降代表,显露出各样的表情:有的眼泪汪汪,握紧拳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犯”、“严惩战争罪犯!”也有的敲锣打鼓,唱歌跳舞,表示胜利者的欢乐。还有经久不息的鼓掌声、鞭炮声……,令今井武夫一行不由得汗流如注,面色惨白。

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两栋木板平房,板壁上涂着很大的白十字标志。

陈应庄少校引导今井武夫一行下车,走进了木板平房。

房内陈设虽然较为简单,但干净整洁,被褥、席子和日用器具完全是新的,还安装了临时浴缸。

陈应庄给今井武夫安排了两个房间,随员每人一间。

今井武夫在他的房里坐下来后,抬头望着陈少校,觉得很有些脸熟。

陈应庄脱下军帽,拍拍有些光秃的脑门说:“不认识了,我就是北平时的那位陈记者呀!”

“陈记者?”今井武夫想了想说:“对,对,在北平我们就认识,你也成了军人了。”

……

今井武夫立刻醒悟过来,意会中国方面安排他所认识的人来做接待的用心,心里不由得升起一丝宽慰。

午饭时,陈应庄领今井武夫一行来到餐桌边。桌上摆上了当地出产的上等菜肴,还备了薄酒。

今井武夫觉得,即是败军之将,还是受到了较人道的接待。

入席后,前川冈雄小声地告诉今井武夫,据悉:参加指挥湘西会战的何应钦、王耀武等高级将领也已前来芷江,参加这次投降会议仪式。

今井武夫端着红葡萄酒的手停住了。他不由得联想起几年前,在日本武力的压力下,何应钦和日军签下的何梅协定,当时的狼狈情景,令人难忘。如今,时过境迁,情况完全倒转过来,中国军队,在雪峰山区打败有8万多日军参与的芷江攻略战。而且,此时自己又屈辱地前来找他求和,作为一名帝国军人来说,真是无地自容。一种羞辱之感,不由得从内心升起,他将酒杯放

在桌上，微合上眼睛——这真是一杯难咽下的苦酒啊！

将错就错

……

“立刻把日本代表带来，只准四个，那个参谋长，两个参谋和那个翻译……”

……

“不准他们带枪！”

……

下午3时过后，负责对日本代表接待工作的陈应庄少校，接到陆军总部打来的电话。

3时20分，今井武夫及其随员，乘上吉普车，在陈应庄、陈祖贻的引导下，向受降会场驶去……

会场地点，设在机场附近的七里桥磨溪口，这里是栋西式木板平房，在这之前，是空军第五、六俱乐部，它的东西两头有出口处和休息室。今天，只见这栋木板平房的左右两边的马路上，各扎有木板牌楼一座。牌楼的中部有一个大型的“V”字，上首扎有“和平之神”四个大字；会场正前的旷地上，高竖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这都是新六军政治部话剧团主持人肖云端，忙碌了三天三夜布置出来的。

会场内，左边的中墙上，张贴着孙中山先生的半身画像，画像的前面，是按圆桌会议的形式摆设的，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桌子边摆着黑色的木椅子，在会议室的另一头，还为新闻记者准备了一张大餐桌，以便用于摆放打字机和摄影摄像器材，紧靠板墙，放了一圈椅子和凳子。布置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装饰。

会场周围已增派了警卫人员，门前设立了三道岗哨，并已告知哨兵，日军投降代表通过时，因不适用军队礼节，不要向之敬礼。

这时，中国方面参加受降的代表，已陆续步入会场，各文武官员、中外来宾、新闻记者、译员、通信人员，还有重庆外交部临时邀请的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等。他们都佩有入场证，入场后，按指定的位置就坐。

何应钦望着入场的行列，脸上挂着微笑，突然，他发现行列里的汤恩伯只挂少将军衔，甚为惊讶，立刻要汤停一下，叫来自己的侍从参谋，拿出一副三星上将的领章，要汤换上，汤推让了半晌，才肯接受。

原来，汤是在1944年日军进攻湘桂黔的战役中，由于指挥失误，事后被蒋介石下令降为少将的。

本次受降，由于日方是冈村宁茨的代表，最高军衔是少将，所以，何应钦指定由他的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他主持受降，同时参加受降的还有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美军作战司令参谋长巴特鲁，何应钦本人则回避不出席。

这时美军方面对已经布置好了的圆桌会议的形式，提出了异议，要求改成上下之间长方桌面对面的会议方式，尽管日本留学生出身的军人对此深为不满，认为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表示愤慨，但还是按美军的意见，立即改了过来。

摆好了桌椅，参加受降的各有关人员，仍然陆续到来，一个个精神焕发，满脸喜气，谈笑风生。

在日方投降代表到来之前，整个会议室，暂时有些紊乱，记者们有的在检查钢笔是否上满水；有的在左顾右盼地打听情况；有的在选择自己的摄影角度和位置；打字机的“哒哒”声，也已开始响起，与大家谈话声和在一起，显得有些嘈杂，还有的记者，正在着急地寻找自己的位子，因为许多记者席已为外国记者和他们带来的打字机挤占。

会议室的另一端，兴高采烈的中美军官正在相互道贺，最为明显的是主持这次会议的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和美国代表巴特鲁将军那开朗的笑声。谈笑间，巴特鲁忽然向他的副官做了个手势，要其递他的水壶来给肖中将喝，肖毅肃一不小心，把水泼到了衣服上，巴特鲁立刻掏出帕子来替他擦抹，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们……

会场渐渐地安静下来，肖毅肃看了看表，走到他的位置上，站着说：“先声明三点：第一、今天在场的中外记者不得发问；第二、日本代表进来的时候，大家应安坐不动；第三、所有中国方面的发言，都先翻成日文再翻成英文。而所有日本方面的发言，都先翻成中文再翻成英文。”

他的话，立刻引起一阵议论声和夹杂着打字声。

一位中国军官，从另一端的电话室走出，向肖毅肃报告：“日军代表马上就到”。

人们立刻向门外探望……

肖毅肃又站起来宣布：“还有一点要清楚，这里就是陆军总部”。

许多人不解地眨着眼睛向他看。

肖毅肃立刻补充说：“陆军

总部已从昆明迁来芷江,就在此地,这所房子里。”

人们完全明白过来,有的发出了讶异的声音。

“来了,他们来了,”不知谁在门口说了一句。

房内的人,由于肖毅肃有言在先,仍然安坐不动,只有摄影记者,在紧张地做摄影准备。

日军代表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冈雄及译员木村辰男四人,身着军常服,足蹬长统马靴,除翻译外,另三个都佩有参谋军官缓带,步伐整齐地出现在第一道门卫前,向门卫兵行了礼,卫兵只稍稍答礼,并用兰色小旗一挥,让其通过。

今井一脚踏进大门,一看布置,便知是受降会场,立即停步。

“请进来”,肖毅肃说。

四人鱼贯而入,走到桌前,脱帽、立正,恭敬地向肖毅肃、冷欣、巴特鲁3人行行了鞠躬礼。

三人未站起,只是点头以示答礼。

“你们可以坐下谈”。肖毅肃挥一下手说。

“谢谢!”今井答。

随后,四人在事先安排好的四张黑椅上坐下,今井在中,左边是前川冈雄,右边是桥岛芳雄和译员木村辰男。

此时,时针已指向四点,肖毅肃首先开口介绍说:“本人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左面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右边是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鲁准将”。

今井武夫四人抬头周视。

肖毅肃继续说:“今天,本人是直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命令,代表中国陆军总

司令何应钦上将来接见贵官,他们两位(指冷欣、巴特鲁)也是陪同我来接见贵官的。请贵官说明身份,并交出身份证明书。”

今井武夫态度沉静而细心,认真听完肖参谋长的话后说:“鄙人是奉日本国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来此会见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全权代表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左边这位是前川参谋,右边这位是桥岛参谋,那位翻译叫木村。”

“本人任务是在订立停战协定以前与贵部进行联络准备工作,没有携带刚才要求出示的身份证明。理由是,这次是来联系订立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不是来签订协定的。更详细地说明一下:日本政府和军事代表目前正在马尼拉与盟军最高指挥官进行停战协议,在协定签订前不能任意行动。然而,我们料想中国方面的停战工作,当然要由蒋委员长阁下负责处理,因此认为在礼节上应该迅速与贵方取得联系,所以不待奉召,主动前来。”

然而,中国方面一直是将这次会谈作为对日军的正式受降来准备的,经今井这样一说,举座哗然,有的甚至震惊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肖毅肃仍然沉着,但似乎有些不耐烦地问:“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都没有带来吗?”

日文译员刚把肖毅肃的话译完,今井就说了起来。

巴特鲁用手势制止他讲话,并用中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肖毅肃立刻说:“请你停止发言,等英文译完后再说。”

这个小钉子,的确让今井碰得有点难受。

英文一译完,肖毅肃才把脸转向今井,今井接下去说:“是的,没有携带身份证明,不过,奉命与贵国军方取得联系的日本作战命令副本却在身边,请过目。”

桥岛立刻打开公文袋,取出作战命令副本,交给今井,今井亲手呈交给肖毅肃。肖接过作战命令副本,一过目,觉得这与身份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没有办法,便灵机一动,说:“我认为作战命令副本,也可以代替身份证明。”

这样,会场的紧张气氛才算缓和过来。

事后,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回忆说:“预定今日接受投降大会,演成一幕投降接头会,会的性质变了,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也是难以估计到的……”

为了不使这种不和谐的气氛拖得太久,肖毅肃又立刻提出新的问题,说:“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8月18日6时致冈村宁次将军之电,要贵官随带来中国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系统表册,想贵官业已带来,请即交出。”

今井武夫听完翻译后说:“中国派遣军仅负责指挥中国战区日军,关于台湾、越南、因不属本军指挥,故不十分明了。至于表册没有,只有地图一份,并且,最近东三省军队向华北调动的详情还没有注明在地图上,越南和台湾的情形,图上也没有……”

木村翻译翻到这里,停止了。

中国方面的日文译员,等了片刻,突然站起来说:“今井少将

所讲的话有两句没有译出来，他说：东三省，越南和台湾的大概情形，他是知道的。”

许多人的脸上露出了对中国日文译员的赞许之色，假如可以鼓掌的话，一定博得不少掌声。

今井要桥岛拿出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图。

桥岛取出图后，递送到主席台上，并和木村站在桌前，加以详细说明。

肖毅肃听了后，特别强调日方保管各地的武器及财产，不得交与任何军队及团体，否则惟日军是问。

今井说：“日军的精锐武器，都在满洲国，在中国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的武器都是陈旧的。”

今井的话，即有几分挑拨，也有几分事实。

未等翻译开口，今井又说：“中国军队想接收我们武器及物资的很多，我们很难对付。”

肖毅肃说：“那些都是些土匪或地方杂牌部队，一点也不能交给他们，如他们强行接收，日军可采适当防止手段。”

这时，中外记者，拿着摄影机，录音机、蜂拥而上，你推我挤，从各个角度进行拍摄，会场形成了暂时的混乱。

冷欣副总参谋长立刻站起来，大声说：“根据国际公法，军用图属于机密，没有获得准许，请不要拍摄。”

冷欣这样一说，才解开了记者的包围。

会场恢复了正常秩序后，肖毅肃接着说：“本略图由我方保管，细节以后再继续联系。”他将脸转向今井：“还带有其它文件吗？”

“其它文件没有带来，为了说明南京、上海地区的机场情况，所以让航空参谋前川随同来了。”

“可留于以后说明。”肖毅肃回答。

接着，肖毅肃取出一份备忘录来（有中文、日文、英文各一份），大家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到他的手上，只见他打开那份洋洋千言的备忘录念了起来。

今井武夫和他的随员显得有些紧张，会场的气氛也顿时严肃了。

……

今井武夫听着，脸上的汗不由得越来越多，几次取手绢擦汗水。

在备忘录中没有提及的东北三省，因还驻有苏联军队，就没有列入接收地区。

肖毅肃念完备忘录，又等译完日文、英文，立刻接下去说：“现在将中华民国 34 年（1945 年）8 月 21 日发给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将军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当面交给你们。今井少将如接受本项备忘录，应在收据上签名盖章，并负责面交冈村宁茨将军。”

“我可以将本备忘录转达冈村总司令阁下，但是关于其内容能否遵照办理，难以答复，敬请谅解。”

肖毅肃取出两张预备好的收据，同备忘录一起交给了今井。

今井又将备忘录细阅了一遍，然后在收据上签上字，盖了章，交还肖毅肃。

今井交还第一号备忘录收据后，想了一会儿，抬头说：“本

文件中有显然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此陈述意见。”

“有困难，留待以后进行联系。”肖毅肃回答。

今井只好沉默。

接着，肖毅肃带有命令式的口气说：“在上项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内，说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要在南京设置一前进指挥所，由冷欣中将任主任。此种措施，可使日军投降事项顺利实施。所在本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之人员，附空军机场设站人员，将乘中国飞机与贵官同时飞往南京，请贵官转告冈村宁茨将军妥为保护，并妥为招待。”

“当代为转达。”今井武夫答。

“何总司令还决定，在投降手续未了前，在最短期间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与北平各地接收，请贵官转告冈村宁茨将军。”

今井武夫表示允予转告。

肖毅肃取出一纸表格说：“为以后接洽便利起见，何应钦上将愿与冈村宁茨将军直接通电，兹特规定对方电台呼号波长及通报时间表一份，交与贵官，请贵官回南京后立即转送冈村宁茨将军实行。”

今井武夫接受表格后，马上出示了日方通报时间表一份。

桥岛插话说：“通过芷江电台，现在马上可以与南京进行无线电联系，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通讯规定，希望予以利用。”说着，桥岛向肖毅肃递交了日本军方的通讯规定表。

肖毅肃扫了一眼手中的日本军方通讯规定表说：“何总司令上将还另有许多问题，另派中美专家向贵官商讨，为了贵官安全起见，中美专家将分别前往贵

官的住所，请贵官据实详细答复。”

今井武夫听了，回答说：“本人此来纯系任联络任务，日本天皇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现日本代表在马尼拉与盟军最高长官议定最高原则的答复，故未奉到最高命令以前，日军不能随便行动；惟日军深知蒋委员长，故愿先派人来，在道义方面说，亦应速来与中国联络。”

肖毅肃未予理会，继续说：“以上细节的联系结束后，希望贵代表们务必迅速返回南京。出发时间，由我方另行通知。”

此时，已是5时30分。肖毅肃宣告会谈暂告完毕。

日方代表起身，鞠了一躬，鱼贯走出会场，乘车回到住处。

整个会谈中，肖毅肃的说话态度即庄严又和蔼，观者甚为钦敬。而坐在肖毅肃身边的冷欣中将，举止则大不一样，如记者严怪愚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会谈中，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身体晃动不已，人又瘦小，简直有一点象一只猴子。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

这次会谈，何应钦由于级别所限，不能参加，但他内心似乎很激动，几次从门外侧视坐在会场内的今井武夫等人。

戒备森严的今井武夫住所

其实，8月21日下午3时至5时半，这次由中外记者参加的会谈，只不过是走走场而已，实质性问题，都将放在以后今井武夫逗留的时间内解决。

今井武夫一行，离开会场，乘车回到住所。晚饭后7时，他们的电讯员住室，响起了电台发报的嘀嘀声。原来，今井武夫正在将下午芷江接洽投降的经过，用电讯发出。

电讯穿越茫茫的太空，飞到南京日军总司令部，送到了冈村宁茨手中……

20点15分，中国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蔡文智、陆军独立步兵第十五团团团长、陆军总部第二处处长钮先铭、还有陆军总部科长林秀栾、刘廉一和军令部科长（译员）王武，乘坐吉普车，向今井武夫住所驶去，铺有沙子的马路上，扬起一阵尘土，在夜幕中渐渐飘散。

他们一行人中，王武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入学考试时今井武夫还担任过他的考官，王武的母亲又是日本人，所以，王武虽说具有中国国籍，又是中国军人，但仍称得上半个日本人；而钮先铭则是战前在北平工作时与今井武夫最要好的朋友，又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钮传善的长子。

今井武夫住所，已由宪兵在四周布置了三道严密岗哨，外界的人，谁也不能接近。来这里找今井武夫会谈的，仅限于受何应钦特别命令的人，都带有一定的任务和目的，谈完一批走一批，再来一批。

蔡文智一行，在今井武夫住所前下车，成一路向住所走去，哨兵见是陆军总部的人，立刻敬礼，他们回礼后，穿过岗哨，进入今井武夫住所。

今井武夫住所，安排有两个房间，放有桌椅和木制沙发，简单而整洁，用于来人接客，洽谈

工作等。

蔡文智一行和今井武夫等，在接待室坐下后，不像白天那样严肃正规受约束了，双方交谈了几句，立刻转入实质性会谈。

夏日的炎热还没有完全消散，人们的身上，不断冒出细汗。

今井武夫，首先就日军方面的现状，进行较详细的介绍，主要有以下四点内容：

其一，中国战区军总司令部，接到停战命令后，马上向全军作了传达，除一些自卫行动外，已全部停止了战斗。目前，在冈村宁茨的统一指挥下，其进退行动，纪律肃然。

其二，各种军需物资、武器装备等，都保持完整的状态，禁止破坏或烧毁，准备完好地移交给中国方面。

其三，在中国战区的各种军用、公用设施或资料，一律严禁破坏或烧毁，也准备完整地向中国方面移交。

其四，还存在一些枝节上的问题，就是在日本军占领区内的某些小部队，恐怕尚未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他们或要求解除日军武装，或要求接受日军占领区等，还多次发生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无统制行动。

接着，今井武夫举例说：“在徐州、蚌埠、芜湖附近，受到了延安军的攻击。另外，有一个师进入了浦口，其中一部分要求占领南京城。再如，贵方有的部队要求日本军解除武装，当予以拒绝时，立刻受到迫击炮的攻击……”

对于今井武夫的说明，其中二、三点且不去评论。至于第一点中说的日军“进退行动，纪律肃然。”恐怕未必如此，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

投降后，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四出骚扰，烧杀、抢劫、自杀以及违抗命令的行为不断发生，思想也极为混乱。为了防止军心动摇，日军大本营还专派了朝香宫大将到南京重新传达了停战命令。这之后，日军中各种违纪违令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如：在湖南省望城县的望城坡，日军停战命令下达后，这里的日军仍在抢劫过往行人的钱财，有的日军因行抢被当地军民打死。几百日军便聚到望城坡街上闹事，并抢了百姓家的新蚊帐裹尸埋自己的同伙；至8月底，住望城县靖港的日军，还到终南村一带行凶闹事，并杀害无辜百姓，中国当局曾向日军上层提出控告，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驻河南鲁山的日军，9月12日接到投降的命令后，陷入一片混乱，中午时分，几十名日军持枪冲进镇上几家酒店，抬起坛就走，胆大一点的老板，上前要他们付钱，得到的是枪托和拳脚；街上的肉铺也被日军把整片的肉拿走；卖鱼的不仅被抢走鱼，连筐都搭上了；这股日军临走前还烧毁了枪支辐重和营房……

几乎与此同时，驻河南临汝的日军数百人，持枪分头闯入周围的百姓家，将桌凳、木床、门板强行抬走，然后将其堆在营区的粮仓、盐库周围，又浇上汽油，将其点燃，大火烧了整整一夜……

河南商邱城北的日军，在10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出动百余人，闯到附近一个村庄，砸开各家房门，见了年轻妇女，就将男人用枪赶出，然后进行强奸轮奸，还将10余名长相稍好的姑娘和少妇押回营房，供其他日军官兵奸淫。到接收部队赶到后，有

的已精神失常，有的已被折磨致病，有的已自杀。

接管较迟的安徽铜陵的日军，也于11月19日夜，引爆了自己的弹药库，巨大的爆炸声，持续了半小时，火光映红了整个铜陵城。

此外，将大炮等武器弹药沉入江底，烧毁或把军用物品转移埋藏的更是举不胜举，就是在蒋介石眼皮下的南京，其街头巷尾也时常出现日军暗中出卖武器的现象。

这次会谈是今井武夫在芷江期间，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晚饭后8时30分开始，到午夜后1点30分才结束，共用了5个小时。

谈话中，中方代表似乎很注意日本军人的性格特点，特别是钮先铭少将，甚至在言行中流露出谨防富有武士精神的日军使节的负辱自杀。

第二天前来会谈的是冷欣、巴特鲁和译员王武3人。考虑到今井武夫一行，夜间休息时间较少，3人至11时左右，才到达今井武夫住所。11点20分才正式开始会谈。

由于已经决定将派冷欣在短期内飞往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所以，冷欣坐下来，首先向今井武夫提出：他本人和中国军人以及美国军人若干人，在近期间将到达南京，希望日本方面提出书面安全保证。

今井武夫听了，表示此等书面似无必要。经冷欣一再要求，今井只好告诉冷欣，等自己回南京后，以无线电答复代替书面保证。

冷欣又提出，他本人到达南京后，望日军方面交出中国俘虏

名册。同时，还要求日军方面，对财产如军需物资、仓库等进行严格保管，到时听从他本人的指示交出一切，冷欣告诉今井：何应钦已将此权限交与他本人，除他本人外，不允许任何人接收。

今井武夫告诉冷欣：“俘虏分散各地，尚需要相当时间调查，阁下抵宁之时是否立即交出中国俘虏名册尚成问题，但是本人到南京后立即开始准备……，至于财产问题，传闻上海、南京等地诸如行动总队之类自称奉蒋委员长之命，已动用实力进行接收或要封仓库，望能了解以上情况，今后定将按尊处指示办理。”

冷欣有些气愤地说：“中国一向处于乱世，此种情况屡见不鲜，今后绝对不能允许此等要求……”

8月23日。

钮先铭将三份备忘录送交今井武夫。

今井武夫看了后，对其中两份提出申辩，并表示难以接受。

一份内容是：“……在马尼拉与美军进行协议的日军代表扬言：中国方面因为国共两党争执，治安不稳，日本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国家的严重侮辱。”

另一份内容是：“日军之中尚有不肯向中国投降而采取挑战姿态的。应即速制止其行动，并作出调查报告。”

这两份备忘录，后来还是由中国方面先遣人员带到南京，直接交给了冈村宁茨，但起到了什么效果，似乎一直没有下文。

在今井武夫一行离开芷江之前，突然接到何应钦要接见他们的通知。

下午2时40分,今井武夫一行,乘上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仍由陈少校引导,向陆军总部驶去。

转眼,吉普车到达陆军总部会客室前,下车后,步行至何应钦办公室门外。

陈少校报告后,何应钦立即传见。

日方译员木村辰男,随从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留在门外,今井武夫立刻脱帽后步入。只见会客室有:何应钦、肖毅肃、冷欣、蔡文智、巴特鲁、钮先铭6人和中美记者各一人在场。

今井武夫行了鞠躬礼后,何应钦问今井:“8月21日,由肖参谋长面交的第一号备忘录,贵官是否已经知悉。”

“收到了。”今井武夫回答。

……

何应钦又说:“……希望返任后,将上述备忘录转交冈村宁茨将军,并为执行各项任务迅速做好一切准备。”

“一定转达到,关于备忘录之内容,一俟奉到东京大本营命令,即可决定。”

“中国方面决定在8月20日至8月30日以前,向南京空运一部分部队,望贵官转告冈村宁茨将军,作好必要准备,并适当加以保护。”

“是,知道了。”今井武夫鞠躬回答。

“阁下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返回南京。”何应钦最后说。

……

谈话至2时59分结束,仅用9分钟时间。

谈话结束后,何应钦等与今井武夫合了影。

今井武夫一行返回住所后,

收拾了行李,坐上吉普车,向机场驶去,一路上,中外记者纷纷摄影,尽管宪兵限制极严,人们仍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机会,纷纷涌向机场,争相观看……

特别是停在机场的冈村宁茨座机上作为标志的两条红布条,据说已换过几次,都被军人拿去各撕一块当纪念品了。

与今井武夫一行同时上飞机的中方先遣人员,有参谋陈绍凯少校和空军地勤司令孙道岗上校以及译员一人。

4时,日机开始滑向跑道,离开地面,隆隆上升……

这时,中美6架野马式战斗机,已在空中盘旋,候日机上升后,护送至常德上空。

日机中途在汉口加油后,一直飞往南京,在南京大校机场降落……

这天晚上,何应钦在芷江空军驻地举行了鸡尾酒会。除一些当天必须赶回部队的将领外,留下的将领、来宾及新闻记者都参加了。何应钦捧着酒杯满脸春风地四处找人交谈。

一位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共产党?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区?”

“你认为中国应设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何应钦反问。

记者又问:“日本投降后,我们政府对共产党如何处置呢?”

“只要他们不捣乱……,政府中可以给他一个位置……,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武器了。”

……

8月24日,冈村宁茨从南京来电: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阁下钧鉴:

(一)今井总参谋副长一行以及贵军将领3人于8月23日午后8时抵宁。

(二)交付今井总参谋副长之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中字第一号至第四号各件,确实领到。

(三)贵总司令部南京前进指挥所希在可能范围内迅速前进,其它飞行规定线路高度时间希即通知。本官以负责对冷欣中将阁下一行之保护其无遗憾。并将予以有力援助。

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敬

(二十四日)

十八集团军乘胜大反攻

自从蒋介石电令延安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停止对日寇的大反攻,遭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复电反驳后,蒋介石又于8月21日的受降会谈中不安排延安军政人员或记者参加;在接收日军投降的安排上,也没有给十八集团军确定一个受降区。而且,在交由今井武夫转达冈村宁茨的第一号备忘录中,明确要求日军:“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何应钦——作者注)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质。”

蒋介石对延安十八集团军的种种限制,就如朱德总司令8月13日给蒋介石回电中说的那样是“不公道”的,因为在8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自始自

终参加了对日作战,特别是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后方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上来,并展开了以华北为重点的大规模“扫荡”。在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敌人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群众也作出了巨大牺牲,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伤亡群众达600余万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蒋介石这种不公道的限制,并没有阻止延安的继续反攻。

毛泽东在此之前的8月9日就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宣布:敌后根据地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大规模反攻的日子已经到来……

8月15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又给冈村宁茨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

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收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收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立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企图垄断接收日本受降的权利,并由于以后受降会谈时的第一号备忘录中的规定,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指定之部队投降,不得向其他武装缴械投降或交出地区与物资。所以,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和接收,日军方面必将会采取抗拒的态度,这样,许多地区必然还会发生较激烈的战斗。

为了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部队也从陆地、水上、空中同时出动,开向沦陷区。并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将部队迅速空运向各重要城市和据点……

8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率领下,首先以冀察军区主力在冀中和冀热军区各一部兵力的配合下,展开了反击;冀晋军区部队主力也配合晋绥军区部队直逼太原;冀晋、冀中、冀热辽军区部队各一部,为策应对平津的围攻,也分别对保定、石家庄、唐山之日军展开攻击。

山东军区所属的5个二级军区的部队,分成五路同时对敌人展开反攻。

晋冀鲁豫部队也向被围困在铁路和公路沿线的日伪军进行猛烈出击。

晋绥军区部队在贺龙、李井泉的统一指挥下,分为南、北两线进行反攻。

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借口受降调运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步步进逼,形势越来越紧张。

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地八路军部队下达了“……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八路军各军区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和尽可能夺取和控制交通要道,主要转为夺取中小城镇……

由于被八路军包围的日伪军拒绝投降,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1日下了继续集中与扩大力量,夺取中小城市和大量歼敌的指示,坚决消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冈村宁茨在投降书

上签字

然而，就在今井武夫乘原机返回南京之际，中美各方就为派哪支部队去南京接收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这之前，第三战区顾祝同，就曾要求第三战区就近派部队接收南京，何应钦也表示支持，认为这样比较公允合理，但事到临头，被重庆美军总部否定了，美国人认为，从芷江空运新六军去接收南京比较适合，因为南京日本军队与第三战区第一线部队之间的地区，已由新四军所控制，从陆地上派第三战区的部队到南京去，说不定中途会引起什么麻烦。还有，就是把新六军这样装备训练优良而又在战场上真正打败过日军的中国军队开到南京去，才能对日本军队起威慑作用。

何应钦总部的美军总联络官巴特鲁准将和新六军美军联络官费利益，对后一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而事实上，美国人要把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空降到南京去，显然是想对冈村宁茨显示美国人在中国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增加他们对冈村宁茨说话的份量。因为新六军不仅是全副美式装备，而且是美军帮助训练的。

经过一番争论后，最后还是美国人说了算。

……

8月27日上午，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冷欣一行，终于分乘7架运输机，从芷江起飞，到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进行受降和接收准备工作。

飞机经较长时间的飞行，在

南京大校机场徐徐降落。

随冷欣同行的有炮兵、工兵、通讯各指挥部和后勤司令部各调上校、少将级人员分别组成3个业务组，分别担任计划接收、对日军方面的联络与后勤补给事宜，同时，还从新六军调了一个排，一同随往。

前进指挥所设在原铁道部孙科的官邸，现为日军招待所，开始由伪军警卫第一师担任警卫和郊区的警戒。冷欣一想，觉得伪军不如日军可靠，于是，又将全部警卫改换日军担任，伪军完全集中，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活动。

9月5日，新六军终于坐上美国运输机，从芷江机场起飞，前往南京。其任务是：占领南京，控制日军冈村宁茨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上海交通之畅通……

然而，日军方面和冷欣联系的只有今井武夫，冈村宁茨则托病不见。

等冷欣安排妥当，又去看了中山陵后，今井武夫才代冈村宁茨要求冷欣做一次秘密谈话，要求不能让美国人知道。

于是，冷欣以探病为名，带上医官、翻译官各一人前往冈村住所。

冷欣和冈村见面后，冈村告诉冷欣，他害的病并不重，主要是借此避开美国人谈谈他对中国政府的一重要建议。

根据庞镜塘先生在《日寇投降后冈村宁茨的一个反共建议》一文中披露，冈村宁茨对冷欣大意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

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连同军队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散回国，不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大成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能力就不能保险，要大大削弱了。”

冷欣听了冈村宁茨的这个建议，当即予以慰勉，并答应马上往上转报……

蒋介石得到转报后，很快又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宁茨的具体计划到重庆当面报告。冷欣便以受降签字书等送到重庆为名，亲向蒋介石面陈了冈村之意。

但由于冷欣守口不严，向外界有所披露，各方议论纷纷，蒋以此事做得不密，斥责了冷欣。

冷欣回南京后，表面上被冷落起来。但与冈村宁茨、今井武夫等的关系仍很密切。特别是在研究以什么名义将冈村、今井等留用的问题上，一直在活动。

据白崇禧事后透露，冈村的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但由于遭美军的阻挠，才不得不放弃。

然而，从日军签字投降到1949年1月止，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受理战犯

案件 2200 余件，判处死刑 145 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400 余人，就连当年在南京大屠杀中，进行杀人比赛的日军士兵野田毅之、向井敏明也受到了严励惩处，但许多日军上层中的大战犯，国民党当局却让其逃脱了惩罚，而对冈村宁茨，这名罪行累累的一级战犯，出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象征性地进行了审判，但审判结果，军事法庭宣判为无罪，而给与赦放，安排他搭乘美国轮船回国……

对此，中国共产党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谴责了对冈村宁茨的判决，并要求引渡冈村，将此事作为维持国内和平条件之一。

但此时蒋介石已下野。

为了争取和平，代总统李宗仁重新下令逮捕冈村宁茨。

然而，蒋介石的心腹，驻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压下不发。此事不了了之。

1950 年，蒋介石正式聘请冈村宁茨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前进指挥所，在南京一进入工作，各种各样名义的国民党原地下机构或个人，也纷纷开始找关系，要接收了，据张文杰《我所知道的美国“盟军”与陆军总部》一文写道：“……除了替自己接收之外，各人还得为上级或者有关系的同学、同事接收一份，如工兵副指挥官傅克军要替指挥官马崇六接收；曹士微要为他老丈人贺耀祖接收；陈照凯接收的东西要分给处长钮先铭，钮先铭又要贡献于郑介民。黄杰唯恐军训部还都太晚，飞函宫其光、王武等，也代为接收洋房一座、汽车一部……”

“……一个姓金的，自称为主任的秘书，与冷欣同乡，看样子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伙同之下，一日之间，从伪政府各部门接走漂亮的小汽车二十四辆，藏匿起来，随后陆续运往上海卖了。”

9 月 8 日晨，何应钦乘坐“美龄”专机，在十多架战机的护卫下，带着隆隆的巨响向南京飞去，数小时后，在明故宫机场降落。

受降签字仪式，确定在原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

时间选择在何应钦到达南京的第二天，即 9 月 9 日上午 9 时，这个日本人认为吉利的“三九良辰”。

这一天，南京城呈现一派欢腾景象。通往原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的黄埔路上，更是不同往常，一路除五颜六色的牌楼，路两旁，每隔一段，还竖一杆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国旗，每杆旗下，都布有两名新式装备的警戒兵，他们着绿色秋季制服，钢盔白手套，挺胸收腹，双目平视。

礼堂前，是方圆百余公尺的草坪，穿越草坪的马路两旁，也高竖着联合国 52 个成员国国旗，两旗之间，立有一名全副武装的新六军士兵。

上午 8 时 30 分，中外来宾、记者、陆续入场……

8 时 52 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茨一行 7 人，在中国王武上校的引导下，分乘 3 辆汽车，按日军占领南京时同样的队形，由武装的两个分队乘警备车担任保卫，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文字的牌楼……，车队沿黄埔路徐徐开进……，临

近会场时，冈村宁茨一行在车内，将指挥刀等武器卸掉，留在车上，然后在会场前的广场下车……

中外记者纷纷上前摄影。随后，上校王武将冈村宁茨一行引入休息室。

这时，原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内，各中外来宾，均已依席次坐定。

受降席设在礼堂中央。受降席前，设有较小的长案，是给日军投降代表准备的，在其座位后，立在 12 名整齐严肃的中国士兵。

会场的正面墙上，挂有孙中山先生画像，对面墙上是中、英、美、苏四国元首照片。整个会场，208 面联合国和各成员国国旗以及写有“和平”与“V”字的彩色旗，横空高悬。四壁红、蓝、白三色巨幅彩带环绕。

8 时 56 分，何应钦等 4 名中国受降代表步入会场。

中外军官及来宾立刻起立迎接……

在这众多的受降代表、中外军官及来宾中，也许有人已发现，唯独没有邀请延安代表或来宾，甚至连记者也没有安排一人。

何应钦在受降席的居中坐下，他的左侧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猛；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肖毅肃。

受降席的正中，放有一时钟，还置漆盘，盘内放一套中国文具。

8 时 58 分，中国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步入会场，至指定地点立正，向何应钦、陈绍宽、顾祝同、肖毅肃、张廷猛五人作

45度鞠躬。

何应钦欠了欠身子答：“坐下！”

日军投降代表，按原定坐位依次在投降席坐下：中间是冈村宁茨，右侧是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第三古八军参谋长陆大佑三泽吕雄；左侧是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他们一律戎装，只有上次赴芷江洽降的日方译员木村辰男，仍然穿着在芷江时的那套灰色西服，他以立正姿势立于冈村宁茨身后。

冈村宁茨把军帽置于案头，其余的人，则握在手中……

何应钦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5分钟。”

中外记者骤然忙碌起来，中方代表的雍容仪表和黯然肃坐的日方投降代表以及与会人士的多表情，被一一摄入镜头。

9时零4分，日方代表小林总参谋长向何应钦呈递了由冈村宁茨授权投降的证明书。

何应钦接过来看了后，将证明书留下。

接着，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肖毅肃转交冈村宁茨，冈村起立双手接受后，匆匆翻阅，降书全文如下：

日军降书

1、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2、联合国最高统帅和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3、吾等在上述区域之全部

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4、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投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5、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陆海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带交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长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6、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7、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收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命令。

8、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传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

9、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

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长官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

九月九日午前九时 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 分 在中华民国南京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 何应钦

冈村宁茨翻阅过后，小林在一旁为他研好了墨。冈村宁茨用



日本对盟国的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举行

微微颤抖的手，握笔含毫，分别在两份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又从衣袋里取出一枚圆形图章，盖在签名之下。摄影记者抓住这个短暂的机会，纷纷进行抢拍。

这位曾在1928年侵占济南的战争，1932年侵占上海和华北的战争，1933年参加“塘沽协定”的签订，1937年至日军战败投降，在日军中历任军长、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终于在这里俯首投降了。

冈村宁茨在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小林总参谋长将降书两份持至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

何应钦看过后，也在日军降书上签上字盖了章，并取其中一份交与肖毅肃转冈村宁茨，冈村起立双手接受。

接着，何应钦又将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连同命令受领证，令肖毅肃交付冈村，冈村立刻过目，只见其中有以下几点内容：

……

贵官应于本(9)日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名义取消，并自明(10)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

——贵官之总司令部，应自是(10)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之任务，为传达及执行总司令(何应钦——作者注)之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项，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

……

冈村宁茨将第一号命令过目后，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然后，命小林将受领证呈何应钦……

这时，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

冈村宁茨等投降代表，起身向何应钦等人鞠了一躬。

何应钦起身作为回答。

之后，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退出礼堂，上车后，成原队形返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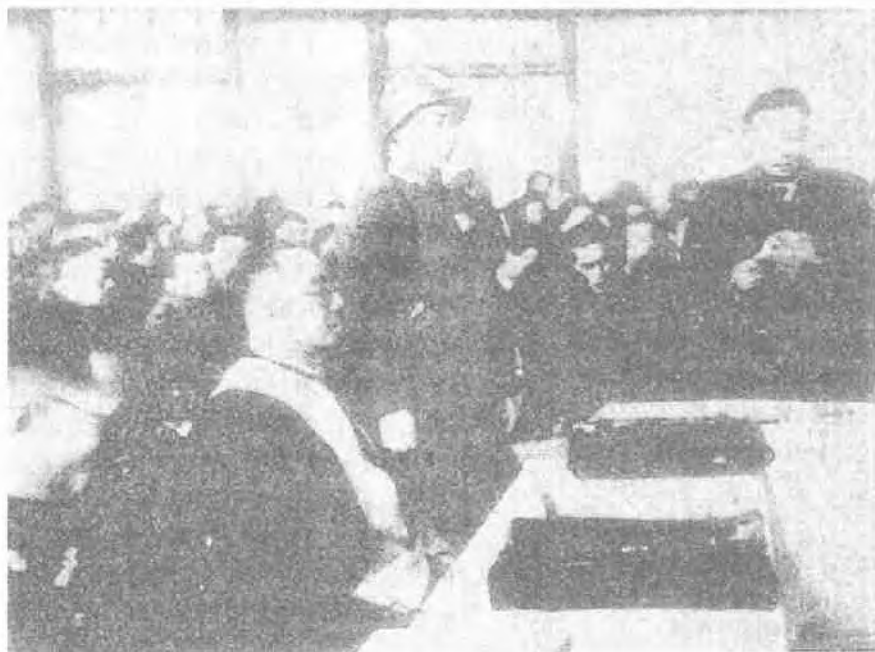
至此，整个受降签字仪式结束，先后仅用了20分钟时间。

……

事后，冈村宁茨在他的日记里写道：“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之所接触的中国方面的要人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耽心……”

10月26日，远在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传来了命令，停止冈村宁茨的一切活动。

1946年3月29日，蒋介石当局将冈村宁茨转送到上海的一个僻静寓所，由汤恩伯负责监护，他的寓所周围还布置了便衣警卫，并请了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其治疗肺结核。此后，冈村宁茨一直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保护对象。



1946年2月，中国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侵华日军乙、丙级战犯。

同游祝融峰

1938年11月，巍巍衡山，菊花吐艳，枫叶摇红，尽管大半个中国遭到日寇铁蹄的野蛮蹂躏，但五岳独秀的南岳依然秋色无限，风光如画。

一个全国性的抗战会议即将在这座名山举行。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陈诚、白崇禧、汤恩伯、周恩来、叶剑英、边章武等风尘仆仆分别从重庆和武汉赶来南岳，下榻在风景秀丽的磨镜台宾馆。正式开会的前两天，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蒋介石心情舒畅，雅兴忽发，叫来两乘竹轿，邀请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同游祝融峰。

随行侍卫副官奉命来到周恩来的住地，见他正与一位力主抗日的地方名流侃侃而谈，兴味正浓，不忍打断。等了10来分钟，副官深恐蒋介石不耐烦，便故意干咳了两声。

周恩来听到声音，侧过身子一看，见是蒋介石的随行侍卫副官立在门边，站起身来客气地说：“副官先生，你有什么贵干？”

这个副官跟随蒋介石的左右已有7年了，他早就听说共产党里的大人物周恩来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待人谦和，几天的接触，名不虚传，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连忙脚跟一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周恩来先生，委员长有请！”

周恩来还了一个礼道：“请转告委员长先生，我即刻就到。”随即将副官送出门外。

蒋介石忙于政务，平日难得有闲，五岳独秀，到此天下名山，岂能不作一游？他脱下戎装，换上绅士礼服，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一根文明棍，早在屋里等候，见侍卫副官一人前来，忙问：“噢，周恩来先生呢？”

“正在与一个地方名流谈话，即刻就到。”副官报告道。

蒋介石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在屋内踱了几步，正待出门，却见周恩来大步跨了进来，说：“委员长先生，晚来了一步，恕罪恕罪。”

蒋介石迎了上来，微笑道：“周先生，难得今日有暇，天气又好，特邀你去祝融峰观景，不会拒绝吧。”

周恩来望着蒋介石，深沉地说道：“多谢委员长，如今遍地烽火，金瓯半缺，生灵涂炭，游兴早已殆尽。不过委员长既有这个雅兴，岂有不陪之礼？”正说着，副官已叫轿夫把油布竹轿抬了进来。周恩来见是坐轿，便委婉地说：“委员长先生，坐着轿子观赏风景，不太自由，再说山路陡峭，人苦我乐，心中也不自在，我看还是不坐为好。古人说‘安步当车，捷足先登’，我们就来个‘安步当轿’吧。”

蒋介石平素喜欢坐轿，被周恩来一番话顶了回来，心中顿时颇感不快。但想到在共产党人面前，思想要开明进步一点，大度地苦笑了一下：“周先生说得对，我等遵循总理教诲，为民众效劳，如今坐轿游览，必为天下人笑矣。”说完向轿夫摆摆手，叫他们回去。

周恩来却叫住一个轿夫，拿出4块银元放在他的手里，说：“老乡，对不起，耽误了你们的时间，我给你们每人一块工钱。”

“不，先生，您又没有坐轿，哪能要你的工钱？”轿夫慌了，连连后退。

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游南岳

梁贤之

“老乡，拿去吧，过日子不容易呵！”

轿夫捧着银元，怔怔地望着周恩来，双目湿润润的。

蒋介石面孔微微发红，他装着没看见，在侍卫副官的陪同下，与周恩来一道向祝融峰攀登。

投龙潭寻古

在抗战会议上，国共双方的气氛比较融洽，而且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共产党派出教官，帮助国民党中层军政人员训练游击战术，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具体培训对象是全国各部队的营长以上，师长以下和各地方县长以上，专员兼保安司令以下的干部。

在此之前，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曾代表共产党向蒋介石提出，日寇的战略战术是速战速决，我们则要打持久战，战术上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为主，正规战为辅一套战胜敌人的方法，因而建议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面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广泛开展游击战克敌制胜的事实，以及国民党军队都不懂游击战术的弱点，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天下午，山风不吹，气候暖和，是南岳山区初冬难得的好天气。蒋介石同周恩来离开磨镜台住所，边走边谈，不觉来到水帘洞。这水帘洞又叫“紫盖仙洞”，是南岳“四绝”之一，向有“名山洞府”之称，经过历代道家羽流玄虚地张扬，更是神乎其神。

“南岳真美！祖国的河山真美！”周恩来仰望着瀑布飞流，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是呀，周先生，到下面的投龙潭去看看，那里真有趣呢！”蒋介石撇开副官，拉着周恩来的手往下走，边走边说：“这个投龙潭，原叫漈水坑，传说唐代天宝年间，李隆基派钦差大臣千里迢迢，赶来南岳祭奠，投下金龙玉简，祈求长生不老……”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历代的皇帝都想长生不老，寿如松鹤，但适得其反，他们都是短命的，唐朝从德宗到文宗，6个皇帝平均寿命不到39岁。”

衡山历来石刻很多，蒋介石边走边看，从这一块石头跃到那一块石头上，寻寻觅觅，指指点点，兴致极高。这时，他似乎成了一个与世无争、超凡脱俗的闲客。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一块高平如台的大石上，上面刻着两尺见方的4个大字：“醉眠观瀑”，下面自

题一行小字：“次青仿陶”，蒋介石瞧了好一阵子，嘴里喃喃念着“醉眠观瀑”，神情似有不解。

周恩来说：“委员长先生，这字的功力不错，遒劲如虬，坚质浩然。”

“对，对，见字度人，看到它，我的脑海里便立刻出现了一个烂醉的狂人，躺在这石头上观看水帘洞的瀑布，但不知这个自题‘次青仿陶’的狂人究竟是谁？你看，那边石头上边刻有‘冲退醉石’的题解呢。”

周恩来笑了笑说：“委员长，‘次青’就是清末湖南平江的李元度嘛，元度字次青，晚年自号醉壶老人。他曾辅佐曾国藩、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官居高位。我们在水帘洞石蹬上看到的‘夏雪晴雷’4个字，也是他题的。你读过他的《水帘洞新建雪浪亭记》吧？他在那文章中自称仿效陶渊明，当冲退居士。这冲退居士就是宋代成都人章惇，他不愿做官，整日酗酒，高傲疏狂，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去，宋神宗还算开明，没有要他的脑袋，还赐了他‘冲退居士’、‘冲退醉石’的雅号呢。”

蒋介石一听，连连顿首，对周恩来的博闻强记内心深深叹服。其实，来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就这些知识向颜友民问个清清楚楚。颜友民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是个老学究，也是一个“南岳通”。他之所以故作不知，为的是摸摸周恩来的“底”。

哀悼宋哲元

1939年春深时节，蒋介石与周恩来再度来到南岳。这一次，蒋介石是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周恩来是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国际问题讲师的身份，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当晚，游击干部训练班副班主任陈诚和白崇禧设宴为蒋、周二位洗尘，出席宴会的还有教育长汤恩伯、副教育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陈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梁寒操以及八路军派来的总教官边章武、李涛等。

这天，刚吃过早饭，蒋介石派副官把周恩来请到会客室。周恩来见蒋介石面容悲戚，呆若木雕，便问：“委员长先生，有什么事？”

蒋介石从沉思中醒来，忙叫周恩来坐下，告诉他刚刚收到来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将军在四川绵阳病逝。宋哲元是一位抗日名将，久经

沙场，屡败敌寇。因此，他的死，使蒋介石的心情颇觉沉重。另外1938年8月至10月，宋哲元得到他的获准，曾因病在南岳磨镜台宾馆休养两个月，住113号楼。而今在南岳得知宋哲元逝世的噩耗，蒋介石尤其有些触景生情。

对于这位国民党抗战将领的不幸逝世，周恩来也深表哀悼，他向蒋介石提议道：“宋将军曾一度息影南兵，虽身患沉痾，仍念念不忘抗日救国，是中华民国的楷模。他在麻姑桥留有遗迹，我们去那儿瞻仰，以寄托哀思吧。”

蒋介石点了点头，向侍卫副官招招手，与周恩来一道离开磨镜台。麻姑桥距磨镜台不过两华里，一条石板曲径，盘旋而上。此处风景异常幽雅秀丽，林木苍苍，流泉深深。据传麻姑是古代一位侍女，随其主魏夫人到南岳黄庭观修道，经常出外采药，曾在天柱峰下的小溪洗手，后人便在溪上架设石板桥，并以“麻姑”命名。宋哲元在磨镜台养病时，常来这里登临送目，怀古忧今。

不一会儿，蒋介石与周恩来步行到了麻姑桥，映入他们眼帘的是石壁上一行径大3尺的大字：“不教胡马度衡山。”旁边书刻“卧虎”，字体刚健，气势酣畅，深情高韵。这是宋哲元将军对日寇疯狂侵略，野蛮的兽行无比愤慨，挥毫留下的遗笔。他自比“卧虎”，寓意卧虎藏林，养精蓄锐，盼望重上战场，逞威有日。

蒋介石默默地看了一阵，继续前行，过了麻姑桥，寺旁有一块巨大的青石，上刻宋哲元手书的“诚、真、正、平”4个大字。这是宋哲元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时教育官兵的“四要”：“诚以修身，真以究理，正以处事，平以待人。”

蒋介石双目闪光，伫立良久，而后边走边对周恩来说道：“明轩（宋哲元字）治军有方，这4个字就是军队的灵魂。”

周恩来说：“正因为如此，二十九军将士同仇敌忾，面对武器质量、数量十倍于自己的日寇，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寸土必争，以至在南苑战役中，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双双为民族壮烈殉难。”

两人轻脚缓步来到斗拱飞檐、碧瓦琉璃的“双忠亭”。宋哲元养病期间，除了游览名山古刹，看书练字外，还常缅怀以身殉国的战友，他为佟麟阁、赵登禹在麻姑仙境修建了双忠亭。亭内正中的汉白玉碑文上，镌刻着宋哲元亲自撰写的碑文：“哲元患难夙共，国事萦怀，闻鼓鞞而思将帅，赋袍泽以念国殇，出师

未捷，干城遽殒，人亡国瘁之感，岂能已乎！……”

周恩来朗诵完碑文，与蒋介石毕恭毕敬地向石碑鞠了三鞠躬。他接着道：“宋将军悼念战友，忧心国瘁，心情极其沉痛，哀思常聚胸间，当然这种心情对他的病体是很不利的。”

蒋介石叹道：“大千世界，生生死死，本为常事，只是明轩谢世过早，我失去了一只‘卧虎’，令人痛切心肺。”说毕，吩咐副官摆上笔墨宣纸，为哀悼宋哲元题写挽联。他懂得佛学，便以佛教的角度撰了一联：

佛日方中，忽痛阴云遮护法；

倭奴未灭，为怜民族失干城。

接着，周恩来也写了一联：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卢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青。

彼此生分歧

1939年春，江西南昌失守，日寇向中国南方的军事要塞长沙逼进，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连南岳山上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们也静坐不住了，再也无心奉佛、学道。在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救亡指示的影响下，从前线奔来的宣传队，在南岳街头演唱、宣传，抗日的歌声响彻山峦，救亡的活动遍及各处。僧道们也不愿意当亡国奴，以上封寺的知客演文、福严寺华严研究社讲师巨赞、薯箬为首，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因此他们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颜友民为佛教救国协会向上级申请备案。颜友民信奉佛教，与巨赞等人交往颇深，常有诗词唱和，他本人又有几分爱国思想，于是满口答应。通过他的介绍，巨赞、演文会见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和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烈。二位将军对巨赞、演文的抗日爱国行动，给予肯定和鼓励，他们表示呈报蒋介石批准。

不料此事久久没有答复，弄得汤恩伯和陈烈十分尴尬。原来，蒋介石对南岳的僧侣并无好感。他第一次来南岳时，读了韩愈老夫子的《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的诗句“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很想去观赏一番南岳庙的雄姿，同时蒋介石还很信迷信，他早就听说南岳灵光百里，香客络绎不绝，便于第二天上午，脱下戎装，换了一件丝质长

袍,扮作富商模样,侍卫副官也化了装,一同步入南岳庙,兴趣盎然地欣赏着墙上释迦牟尼、阿难迦什的优美壁画。蒋介石看到许多人在岳神面前三跪九叩,虔心供奉,也买了线香纸钱,走上前去,纳头便拜。旁边一位老僧缺乏眼力,错把蒋介石当作求财的商人,迎上前来,先是诉说岳神如何灵验,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接着递上一副竹卦,请蒋介石卜卦,蒋介石正中心怀,将那副卦往地上一掷,卦音未落,老僧就眉开眼笑地对他说:“恭贺老爷,您得了个最难求的‘上上卦’,大福大吉,财通三江,不求自来。”蒋介石一听,顿觉不快,心想:连我求的什么都不知道,就信口雌黄。遂吩咐侍卫副官丢给老僧几个香火钱,飘然离去。此后便对此地的僧侣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颜友民知道蒋介石不同意僧侣抗日的原委后,只好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当即答应去找蒋介石商量。当蒋介石听到周恩来说起南岳的僧尼道人要求成立佛教救国协会,为抗日救国出力时,他一脸不高兴,瓮声瓮气地说:“佛门弟子,抗什么日罗。”

周恩来毫不相让,理直气壮地说:“国将灭亡,如何保身?身将不保,如何学佛?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佛门弟子只有走出禅房道观,投身到抗日救国烽火中去。再说搞民族救亡,团结的人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嘛。”

在颜友民的引荐下,周恩来及叶剑英接见了巨赞和演文。周恩来不顾诸事繁忙,认真地看完了佛教救国协会的宣言和简章,并鼓励道:“各位大师,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但要讲究策略,去坚定僧众们保卫祖国的决心,另一方面要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教义去感化一些信佛教的日本侵略军,使他们懂得教义上所指出的侵略、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犯了戒律,犯了天规,促使他们厌战、反战,动摇日军的军心,攻心为上,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它并不亚于冲锋陷阵,手刃顽敌。”

巨赞和演文听了,连连颌首。接着他们谈了佛教救国协会的打算,准备向全国佛、道教界发出倡议,动员佛道教徒立即行动起来,投身战斗,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贡献。周恩来听了,称赞他们这个举动好极了。谈话快要结束时,巨赞拿出一本纪念册,双手递给周恩来,请他题词,以志纪念。周恩来高兴地答应了,他接过纪念册默想片刻,欣然命笔,在纪念册上写了8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周恩来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南岳山上数百名僧侣。不久,巨赞、演文和薯箬在大庙里召开了动员大会,众僧道无一缺席,连尼姑也参加了。会上,陈烈带领大家到孙中山遗像前敬一尊佛像,烧一炉檀香。接着,巨赞传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号召,作了题为《僧道走出寺观,投身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讲话,僧、道、尼听了,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叶剑英应邀出席了会议,并根据佛、道教“救苦救难”的传统观念和宗教的特殊原因以及不宜上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国民党中央执委梁寒操受蒋介石的委托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工作,首先将青壮年僧道集中训练,称作“战时知识训练班”,讲解佛学道教、政治常识、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和抗日歌曲6门科目。周恩来还把八路军高级参谋薛子正调来南岳任战时知识训练班军事教官,自己也常抽空去训练班讲话。1939年6月,战时知识训练班结业,佛道教救难协会将这些学员组成“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由巨赞、演文分别率领,他们牢记周恩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分赴湘潭、长沙、江西、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郭沫若与“星临轩”牛肉馆

刘宏伟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天官府11号,是一家回民夫妻开的牛肉馆,简陋的吊脚楼式小店却时常顾客盈门。因为这里有地道的清真牛肉菜肴。那清炖、红烧、粉蒸、凉拌……无不色香味俱全。不仅价钱公道,甚而可以赊欠。这,自然成

了一般生活清贫的人乐于光顾的地方。

郭沫若那时就住在这家牛肉馆对面的天官府4号。由于战时生活清苦,每当需要招待各界朋友时,郭沫若就常在这里设便宴。某日,郭沫若在入店之际忽然发现,这家小店竟然没有店名,便向老板娘寻问原委。老板娘答:“家居小店,也没想着打招牌。郭先生既然问起,就请郭先生给起个名吧。”

郭沫若稍作思忖后说:“你家掌柜的叫马星临,星临星临,福星临门。你这

店名,就叫星临轩,怎样?”老板娘满口赞成。郭沫若第二天就将亲笔题写的“星临轩”店名送到马老板手中,并当场题词道:

如享太平,如登春台,
此店虽小,其味隽永。

马老板如获至宝,将郭沫若写的店名和题辞用镜框镶起,高悬店堂之上。从此,“星临轩”名气大增,顾客盈门。

我的父亲：

☆海河

曾助溥仪写成《我的前半生》的作家李文达逝世后，港台十余家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誉李文达为“皇帝枪手”“清史专家”，称赞李60年代初奉命，根据溥仪提供的原始素材，参照史实并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三易其稿，才于1964年与溥仪合作写成了《我的前半生》。此书在大陆多番重印，总数近百万册，并先后有美、日、德语译本行销世界。80年代中，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根据此书改编拍摄的影片《末代皇帝——溥仪》，一举夺得8项奥斯卡金像奖。李文达同溥仪之弟溥杰曾被特聘为该片顾问。

消息在赞誉李文达成就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提到李与溥仪遗孀关于此书版权的一场诉讼，并云：“如今官司未判，李却以老病辞世，可说是含恨以终了。”

李文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为《我的前半生》付出了多少代价？他的家人对这场未了的官司怎么看？这里特发表其子海河一文，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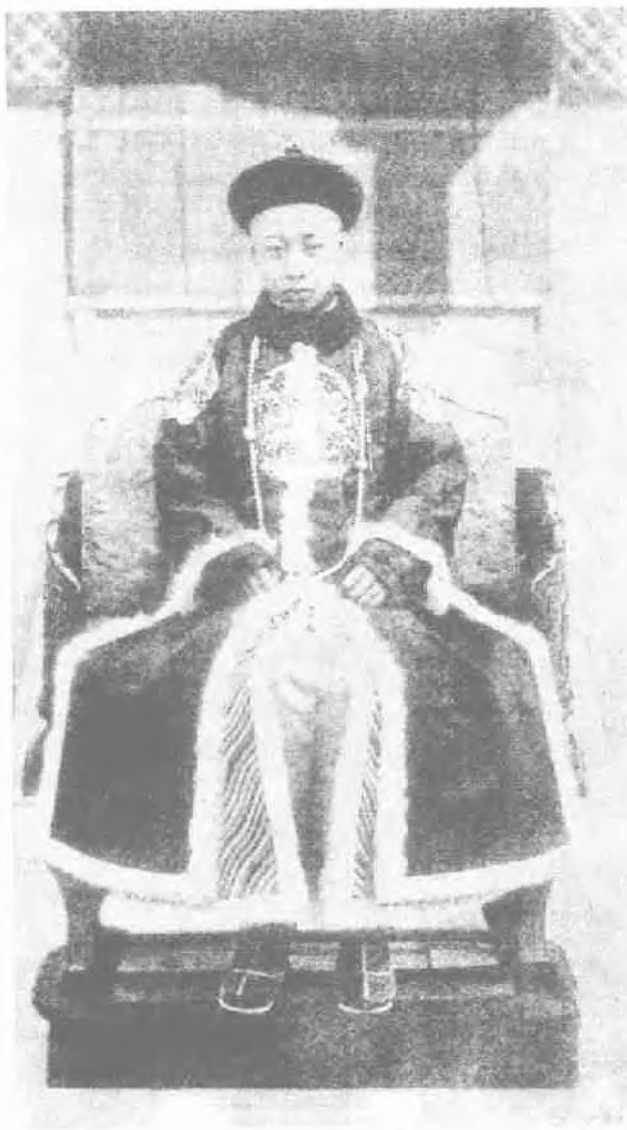
从写《我的前半生》到「被告」

我用这样一个题目怀念父亲，心情更加沉重。

父亲与病魔搏斗近一年后，终于在1993年11月离我们而去。他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法制文学研究会会长。他自幼钟情于文学，15岁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便以鲁迅为典范，与班中三五个同道组成小小文学团体，刊行名为《野烟》的小刊物。那不过是几个少年自撰自编自印的小册子，其稚拙简陋可想而知，却得到了著名作家章靳以和吴祖缙的关怀，有的文章经过他们的斧正，他们也亲自在《野烟》上著文，这二位方家，前者是父亲的姐夫，后者曾教父亲语文，父亲是沾了些光吧。日寇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急，这几位同道好友都参加爱国学运去了，《野烟》也随之“烟”消云散。

1938年，父亲参加革命后，曾被党的上海特科派入国民党军统机

关，担任行动组长；后又奉命打入汪伪特务机关从事秘密工作；曾率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崇明岛抗击日寇，作战中身负重伤；曾受命进入阳澄湖畔某支“忠义救国军”任参谋长，将队伍拉到新四军……他的经历富有传奇性，不乏惊险刺激的场面，多是后人闻所未闻，难以想象的。如果父亲写一部自己的《前半生》，会有很好的文学价值和教育意义，其可读性当在诸多武侠言情小小说之上。可惜，父亲总忙于给别人写东西，最后又被官司找上门来，成为永久的遗憾。



丁巳年的溥仪

御侮的内容。新《海底》石刻油印，在徒子徒孙中广为散发，并声明唯此是“正宗”，很快将旧《海底》排挤掉。于是父亲在青帮中就有了更高的地位，开展伪军工作更加方便。凭此，父亲曾独闯敌巢说降，使我军不费一枪一弹拿下一座县城。有心研究我国帮会史的同志，对这段史料会有兴趣吧。

建国后，父亲仍然战斗在对敌斗争第一线，曾担任公安部一局处长、侦察队队长等职，但环境毕竟安定多了，于是父亲重拾少年梦想，又拿起了文学之笔。他从工作和生活的体验中汲取养料，以身边的战友为榜样，文思泉涌，下笔如流，与朋友合作或独自

那时父亲弄枪多，弄笔少。写出的东西唯一可称为“创作”而且“出版发行”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旧社会一种独特的书——《海底》。父亲根据上级要求当上苏北淮海地区的青帮“小老大”以后，要广招门徒，但作为青帮秘传手册的《海底》，不仅印制粗糙，文理不通，错漏百出，而且处处糟粕。于是父亲按其原来的结构、风格重新撰写，使其中的暗语更加上口押韵，各种规矩更加明确易做，各种姿式（青帮有一套用身体姿式秘密传递信息的办法）和暗号重新绘制，更加清楚美观（父亲曾是上海美专油画系学生，有绘画功底）。尤其是删除了文句中的封建糟粕，加进大量爱国

秉笔,写出了《双铃马蹄表》、《红色笔记本》、《奇怪的数数字》、《爱甩辫子的姑娘》等中短篇小说,歌颂人民群众和公安人员,揭露敌人,唤起群众警惕。可以说父亲是我国公安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时期侦探推理小说的始作俑者。

父亲于1959年调到群众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算是正式弃武从文了,恰于此时,溥仪先生获特赦回到北京。父亲受公安部党组委派,开始与溥仪合作,共同创作并执笔撰写《我的前半生》,从此与此书结下不解之缘。

此书创作原委和过程,已由公安部原副部长、后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同志在《〈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一文(《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发表,《新华文摘》9月号转载,此次新版《我的前半生》作为代序)作了全面的介绍。溥杰先生也在新版序言中作了说明。父亲创作《我的前半生》时,我那时尚小,所知不多。记得他经常通宵写作和阅读,因为是困难时期,吃不饱,写作又是高消耗的劳动,有时半夜他饿得不行,就到处翻找填肚子的东西。还记得他的写作间堆满了书籍和史料,墙上挂满了图表、大纲、人物要点之类的东西。他研读历史档案,研读各国有关“人道主义”的理论,研读二三十年代的主要报刊台订本,还研读《鲁迅全集》,以准确把握时代,提高自己的文笔。他使用了成吨的资料,写作了超过百万字的准备性文稿(如有关各个人物传略等),经过了四年多的构思、调查研究、搜集资料,三易其稿,终于在1964年完成了这部传世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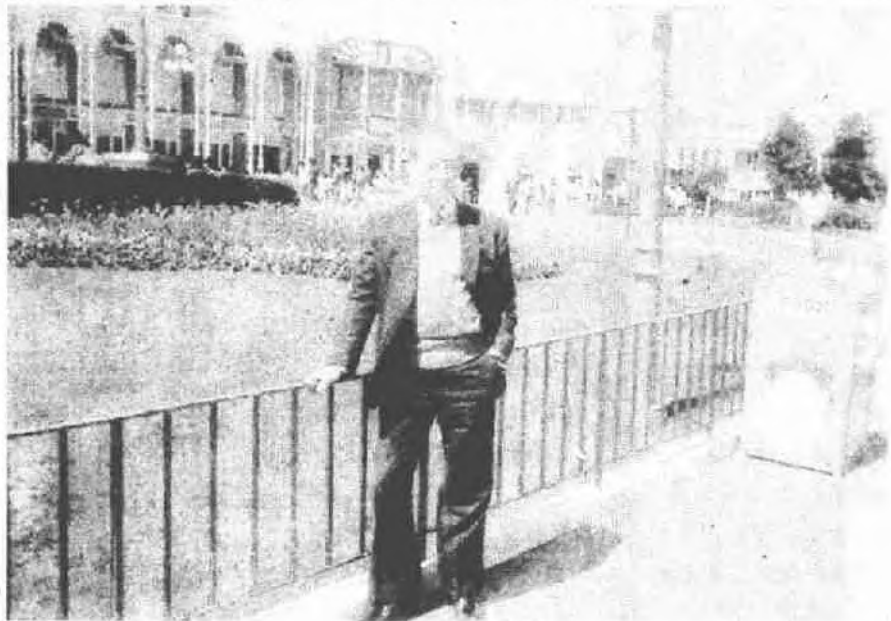
父亲写作中曾遇到一个难题:溥仪能改造好,内因是什么?他心中有没有善良的“种子”?这“种子”是如何播下的?父亲与溥仪探讨,不得要领,又与别人分析,仍无线索,再返

回头向溥仪“挖”,启发他回忆,帮他分析思想意识中根源性的东西。终于,父亲发现了溥仪的乳母这个人物,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

父亲为写此书殚精竭虑,付出了艰巨的创造性劳动。对此书,溥仪先生非常满意,毛主席、周总理也给予充分肯定。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短短时间翻译成十几种国家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历久不衰。但是,“文革”中此书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说是“为末代皇帝树碑立传”,“受到刘少奇的表扬”,父亲被抓入秦城监狱,一蹲就是7年,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更没有想到,进入80年代,父亲却因为这本书竟被人告上了法庭。

这场诉讼的焦点是:此书的版权究竟是溥仪一人所有,还是溥仪、李文达二人共同所有。

这是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父亲与溥仪先生合作,并执笔撰写了《我的前半生》,早已是人所共知,公安部党组和群众出版社可为此作证。对于这部书的版权问题,当时就有人(例如全国政协秘书长申伯纯同志等)提出,为实事求是起见,也应署上李文达的名字。父亲和公安部党组那时都认为,作者可署名也可不署名,目前父亲暂不署名为好。公安部党组又明确提出,父亲是此书的实际作者,只是不署名而已。溥仪先生对此也完全同意。“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即使因写此书而挨批斗、坐监狱,也没有否认自己是此书作者这个事实,也没有任何他人否



我的父亲李文达

认这个事实，更不用提溥仪的妻子李淑贤了。

到了1981年，外国人要在此书基础上拍摄电影《末代皇帝》。有人才意识到，拥有此书的版权，过去要受迫害，而今后却可能赚大钱。这时，溥仪已经去世，李淑贤到处声明、告状，称溥仪是此书是唯一作者，她有独立的处置权云云，并将拍摄权私自卖给了香港那个导演。香港那个导演凭着与李淑贤签的合同，也在境外大造同样的舆论。一时间国内外一片哗然，电影拍摄面临流产，主拍此片的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急忙通过意大利政府对我国提出质询。所以1985年国家版权局根据中宣部授权和当时的版权条例，以正式文件确认《我的前半生》是溥仪、李文达合作写的，两人共享此书版权（该文件与1991年实施的《著作权法》也是完全一致的），围绕拍电影而引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下来。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不久以后，包括李淑贤在内的若干人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父亲造谣污蔑。例如，明明是父亲广搜博引，构思创作，执笔撰写了此书，至今手稿和构思大纲还保有完好，文章却偏说是李淑贤亲眼见溥仪灯下著书，手稿“在文革中烧了”，“卷在信封里丢了”。殊不知此书写作时溥仪与李淑贤还不认识，二人结婚时书的大样已印出了。再例如，明明是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同外文出版社与意大利方面签协议，允许意方根据此书拍电影，文章却偏说是父亲“为了取得报酬”“私自签约出卖拍摄权”。殊不知，父亲至死也未在任何协议上签过一个字，倒是李淑贤，背着版权共同拥有人，不经审批，就私自把此书的境外改编拍摄权一次性断卖给香港那个导演（因违反了国家规定，不获承认），与国内的舆论攻势相呼应，香港《争鸣》杂志也发表对那位导演的长篇访谈录，

不仅对父亲点名诽谤，而且大肆攻击我们的制度和改造政策，歪曲溥仪的人格，矛头所指就不仅是父亲一个人或版权一个问题了。

为了最终获取《我的前半生》的个人版权，李淑贤终于在1989年以“侵权”为由向北京市中级法院起诉我父亲。法院于1990春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事实本来极为清楚，证据确凿而丰富，又有《著作权法》作为准绳，显然是很容易判断的。但是法院却迟迟不能宣判，这本身就预示着不祥的奥妙。

终于，《博览群书》杂志1993年8月号公开登出了最高人民法院给北京市法院的内部“批复”全文，内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文达与溥仪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该书的合作关系，因此，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以认定溥仪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并享有该书的著作权为宜。”这一“批复”使北京市法院置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据此宣判吧，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不符合《著作权法》；不宣判李淑贤胜诉吧，又直接违背顶头上司的意旨。

此案早已为国内外人士所密切关注，港澳台和海外地区已有十多家报刊发表李文达逝世和《我的前半生》版权纠纷的消息，世人正拭目以待。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至关重要的法制环境，国人正在逐渐增长信心，而“批复”所体现的是什么呢？对人们的信心会起什么作用呢？特别是对知识产权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父亲用笔所展示的，是溥仪“从皇帝到公民”，他用自己的最后生命所展示的，却是“从《我的前半生》到被告”。看来还可能是被法院判输的“被告”！

这不令人深思吗？

欢迎
订阅

《炎
黄
春
秋》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萧克将军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月刊。创刊两年以来，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刊发的文章有1/3以上被全国各种报刊竞相转载。本刊内容翔实，格调高雅，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与收藏价值。

1994年，本刊已交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向全国公开发行，每月20日出版。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本刊将推出一系列重大选题，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现在各地邮局正在办理本刊订阅手续，邮发代号：82 507。欢迎您在当地邮电局（所）订阅。如在当地邮局漏订，亦可向本社办理邮购。

地址：北京西城文津街7号（100802）联系人：郭小姐。

最早为包产到户 呼号的两个年轻人

☆——韩三洲——☆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60年代初是最令人难忘和不堪回首的。当时,六亿多中国人民是在啼饥号寒的困境中,咀嚼着难以下咽的政治苦果,与年轻的共和国一道走过艰难岁月的。

“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满天“卫星”招致了遍地灾难,颂扬三面红旗的歌声正在高奏时,中国人民一下子跌到“低标准、瓜菜代”的残酷现实里。人民饥肠辘辘,普遍营养不良,浮肿病到处皆是。而饱受饥荒最重的,恰恰是在黄土地上生产粮食的农民兄弟,全国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仅在全国第一个树起“人民公社”大旗的河南省遂平县嵒岈山公社就饿死上千人。

这正是历史的无情嘲讽,政治热昏病的惨痛代价!

在这灾荒与人祸同时降临的困苦年代,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田园荒芜,满目凄凉,多少人外出逃荒,更不知今后的出路在何方?这时候,在江苏省睢宁县有两个年轻的共青团员挺身而出,向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发出了具有理性的惊世警言:

——拯救农业和农民的唯一出路在于包产到户!

一

钮惟新,是其中的一个共青团员,他1939年出生于南京市郊区的江浦县城。1957年从南京一中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江苏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但他没有去报到,准备来年再考大学新闻系,以实现自己将来成为新闻记者的理想。

然而,时代改变了他人的人生抉择。

1958年大跃进是一个头脑发热的时代。

亿万中国人民热血奔涌,怀着对美好前景的憧憬,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全部才能。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江苏省委和省团委召开办农业中学,把知识送到农村去。火红的年代感染了钮惟新,身为共青团员决不能置身时代大潮之外,有一天他回到家里,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宣布说:“我要到乡下安家落户,办好农业中学,提高农民文化,改变农村面貌。”

钮惟新说到做到。1958年6月,他背着行李,提着网兜,怀着满腔热忱,来到了地处穷乡僻壤的江苏省睢宁县凌城公社,与别的知识青年一道,白手起家,创办起农业中学。在这里,他遇上来自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蔡抚民。两位年轻的共青团员志同道合,一见

如故,成为好友。钮惟新教语文,蔡抚民教数学,俩人都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决心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久,钮惟新被任命为凌城农业中学教导处副主任,蔡抚民被评为省级模范教师,学校也被评为全县一级先进单位,成为江苏省教育厅对外参观交流取经的典型。

二

凌城农业中学创办之初,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排山倒海之势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奔涌呼啸之时。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向全国人民欣喜地预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中国人的心沸腾了。到处是热情的口号,冲天的干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浮夸风四处泛滥,小麦“卫星”纷纷升空,放到亩产几十万斤,近1亿人以砸锅卖铁的野蛮方式去大炼钢铁……

愿望失去了理智,干劲偏离了科学。

作为热血青年,钮惟新也同样陷入狂热与冲动之中。他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充满激情的



1961年刘少奇在树林里拣毛栗子、橡子和苦桔子,寻求代食品。

散文诗“公社照相馆”，在课堂、在村头田间，他向农民兄弟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无可讳言，整个民族都陷入虚幻的疯狂之中了。

60年代来到了，历史的报复已露端倪。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同时，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也正在酿成与发展之中，粮食形势更为严峻，城市不少人患上浮肿病，农村已开始饿死人。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新生的共和国进入了最严重的困难时期。

然而，“大跃进”的战车仍在突进，1960年元旦社论依旧在不顾事实地煽动：“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1月26日，中央在给粮食部批复的报告上还说：“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

此时，年仅20岁的钮惟新却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显得清醒了。

这年春上，饥荒已悄悄地袭击到他所在的凌城公社，公社的大锅饭已不能果腹充饥了，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的口粮，几乎人人吃不饱，许多农民全靠采摘野菜充饥。一天，钮惟新到学生家里走访，在村上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社员，这个能诗会画的老贫农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前两年也曾作过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画，这时却饿倒在床上爬不起来，只能伸出枯瘦的手拉住钮惟新低声说：“俺多想喝上一碗苞米汤啊！”

在一间破旧的草屋棚里，一对孤苦无援的老人揭开熬着榆树叶的破锅对钮惟新叹道：“我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学生失学的越来越多。初三班有个学生成绩很好，作文也写得不错，却几天不来上课，钮惟新放心不下到他家里走访，一进门就看到这学生脸浮肿得吓人，没等他开口，这学生就向他深深地鞠躬，泪流满面地说：“钮老师，我不能上学了，明天我要挨着俺娘到别处去要饭了。”

连学校的老师也饿得支撑不住，领着孩子爬到树上采树叶吃……

无情的事实，令钮惟新心灵震撼，又使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出现这样凄凉的人间惨景？他以为这只是个别的基层干部报喜不报忧而造成的局部现象。这年1月，这位年轻的中学教员怀着共青团员的强烈责任感，将他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以及所了解的农民的意见与要求

写成一封长信，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四份，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分别寄给了他无限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以及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三

信寄走了，犹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而天灾人祸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劫难却愈演愈烈，死神在黄土地上四处肆虐，饥馑正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全家灭绝……。1960年寒冬，凌城中学附近的李庄生产队，仅3天就饿死了20多人。

钮惟新、蔡抚民对此惨状，禁不住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青团员，现在党和国家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他们能无动于衷吗！

可是他们不理解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昨天亿万人民还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天堂神话之中，今天为什么又在饥饿中悲号挣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哪里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路究竟在何处？

冷静代替了狂热，思考取代了盲从，这两位年轻人开始寻求我国农村兴旺发达的道路，他们除搞好教学工作外，业余时间就进行研究探讨农业问题。他们节衣缩食，购买了一些有关农业政策的书刊；为了借鉴国外的经验，他们曾给四个驻华使馆写信索取有关对方国家的农业资料；他们以毛泽东年轻时“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事迹来激励自己，决定深入农村广泛调查，取得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1960年暑假期间，两位年轻人在放假回家的途中，弃车乘船，了解苏北、苏南一带的农村情况，才知道饥荒不仅限于睢宁一地，而是普遍威胁着江苏全境，句容县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才3两7钱。农民怨声载道，普遍不满，反映不少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共产风”泛滥，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这年八月底，他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带着调查记录，径直来到江苏省委，要求会见第一书记江渭清，向他当面反映农村的现实状况。

次年寒假，他们特地绕道合肥、芜湖回南京，以便沿途了解安徽农村的情况，那里的饥荒情景更令人触目惊心 and 惨不忍睹，不少地方村里的人大部分都死于饥饿或远逃他乡，存活留下的仅是少数如孺。

巢县沐集公社陈岗大队松宝园小队已有47天不发口粮了。他们疾步赶到安徽省委，向省农工部反映了这些真实情况。

1961年暑假，他们继续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农村社会调查，行踪涉及苏北的邳县、新沂县、山东的郯城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到黄土地上广大农民兄弟的悲惨处境以及他们对“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失望与抵触，且看他们收集的苏北民谣中的几段：

入社好，入社好，
家无粮，外无草。
十二条，六十条，
不如包到户一条。
……

民心如秤。许多社员公开为彭老总鸣冤叫屈，说他关心农民，是大忠臣。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两位年轻的教师实地调查了江苏、安徽、山东三省，走访了上千名农民社员，记录下厚厚的5本《农村调查纪实》和《农民谈话录》。

最了解农业改革出路的还是农民自己。所以当问及农村的出路何在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认为人民公社这一条道路不可取，都与彭德怀口径如同一辙，说“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都希望把田包给社员种，谁多收归谁，不要再吃那谁也吃不饱的大锅饭了。

四

农民们在连年的灾荒和人祸中深受其苦，他们从饥饿中得出了自己的经验，决定寻找自身的出路。大灾难后，安徽省少部分地区农民自作主张，搞了“责任田”，包产到户，收效很快，激发了农民的干劲，给陷入绝境的农业生产注入了一线生机。

这微弱的希冀与活力，正与钮惟新、蔡抚民在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后得出的结论相同：公社化运动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公社化运动的速度过快过猛，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水平和农村的干部水平，振兴农业生产的根本出路只能实行“包产到户”的方式。他们决定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建议，拯救挣扎在饥馑之中的亿万农民兄弟。

1961年9月，在凌城农业中学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草屋里，一灯如豆，黑烟袅袅，整整照燃了几个夜晚，两颗年轻的赤诚之心在一封《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中跳跃着，流露着：

“我们两人都是年轻的共青团员，各方面都还很幼稚，所提的意见也主要是根据苏皖两省一些地区的情况提出的，不一定正确、全面，但基于渴望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基于对党的无限热爱与信任和共青团员的责任感，我们迟疑了近二年后，现在还是决定把意见向党倾诉出来。如果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党一定会接受；如果我们的意见是错的，那就是说明党近几年的路线是对的，而这正是我们的希望。”

笔端下流淌着对党的无比信赖，也充满了对国家命运和对民族前途的极度忧虑：“当前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已衰退到如此之严重，很多农民认为以现在的地力，再过5年可能不长庄稼了。因此，迅速解决我国的农业危机，已经是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亡，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

为了解决几亿农民的吃饭问题，他们在《意见书》中坦率地提出“包产到户”的办法：有什么办法能迅速改变目前的农业面貌呢？我们认为包产到户是最好的办法。原因是：1. 包产到户的生产关系适应于当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2. 包产到户适应于当前农民的觉悟水平，据我们所知，绝大部分农民都认为这是搞好农业的唯一道路，既然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我们革命的目的，那我们就应该满足之；3. 包产到户能迅速把农民的生产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利于迅速恢复生产；4. 包产到户能促进和恢复发展生产力，增加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5.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其他事业的发展……。”

以上5条，言之凿凿，几乎涵盖了包产到户的全部真髓，并在18年后发生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得到了验证，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意见书》中还根据“生产力标准”，对包产到户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包产到户，看起来比合作社似乎是后退了，我们认为，实际上不是后退了，而是进步了。因为历史上衡量进步与退步的根本标准，是看其对社会生产力是推进还是阻碍。既然包产到户比合作社更能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更能增加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生活，应该说它是进步的。……我们认为，包产到户与昔日的单干也完全不同，它只不

过是在现阶段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多劳多得、按劳计酬的原则而已。”

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论证，在当年拿出来却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两位年轻人却以非凡的勇气，向中央提出了他们的两项建议：“一、通过试点，迅速把包产到户推行到全国各地。二、全党重新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农业合作化问题，寻求最完善、最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以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最后，他们写上了“共青团员，钮惟新、蔡抚民以及通讯地址。就这样，新中国第一篇系统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问世了。谁也不会想到，这洋洋 5000 字的既有说服力又有理论性《意见书》，竟是出自于两位刚刚 20 岁出头的青年教师之手。

五

一年半前，钮惟新曾就在农村的灾荒情况给党中央毛主席去过信，但如泥牛入海，毫无下落。这次两人决定是千里赴京，为民请命，亲自上书毛主席。

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前，两人庄重地呈上给毛主席的《意见书》。

在国务院接待室，他们呈上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待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传达室、农业部接待室，他们分别呈上了给朱德委员长、邓子恢部长和廖鲁言部长的《意见书》。

5 份厚厚的信都送到了该送的地方，并一一拿到了收条。他们两人如释重负，觉得自己行使了公民应尽的权利和作为共青团员应尽的义务。9 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风景宜人，他们的“秋收假”时间很短，又缺少钱财，便无心留恋，匆匆返回苏北乡下，继续教书育人。

秋去冬来，雁阵南归，可送去的 5 份《意见书》却去如黄鹤，不见回音。农村的饥荒不见缓解，反有扩大蔓延之势，构成了一幅新的万里“流民图”。看着农民兄弟一张张枯瘦失血的脸庞，两个热血青年坐卧不安，犹如重负在肩，他们觉得应让更多的中央委员和在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知道，中国农民正濒临绝境，已危及到共和国的存亡。这年 12 月 9 日，在这个传统的红色纪念日子里，两位年轻人又将《意见书》自

费刻印出数百份，分别寄给每个中央委员以及各省、地、市的第一书记，以期引起全党对严峻局势的警觉以及对包产到户的重视。

沉默，依旧是沉默。面对这历史性惨绝人寰的大劫难，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听任饥饿的魔掌卡紧中国人民的咽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钮惟新与蔡抚民这两个人微言轻的中学教员一次又一次地奋笔疾书，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呼吁，仅给毛泽东的上书，前后共达 9 封。1962 年 5 月，他们又向毛主席、党中央、各中央委员及省委书记发出了血泪交进的《给我国领导人的一封紧急信》、《农村包产到户试行办法》、《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以及他们收集到的农民兄弟的悲惨呻吟《苏北农村现代民谣》。

《紧急信》以震聋发聩，欲哭无泪的语调写道：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接受农民的委托，再一次给你们紧急写信，请您严重地关注目前全国普遍存在的危险形势，全民的体质因饥饿和营养缺乏正一天天衰退，生育率剧减，死亡率激增，土地肥力大大枯竭，原来肥地变成了碱地，肥料极缺，社员们说以这样的地力，再过三四年土地就不长粮食了，那时人将饿死光了。

……

亲爱的同志，您为了祖国的民族从三大敌人手中解放出来，在黑暗险恶的旧社会出生入死奋斗了大半生，农民无限信任您，无限信任我们亲爱的党，他们深信党一定会把他们从今日饥饿贫困中又一次解救出来……。

全国人民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挽救民族的希望全寄托在您身上，请采取有效措施吧！亲爱的同志，您们早一天努力，就可以早一天解除民族的危亡，就可以早一天使我们亲爱的祖国走向光明！

农民意见代笔者

钮惟新 蔡抚民上

62.5.4

字字血，声声泪。从渴求到哀求。为了共和国的明天，为给亿万农民兄弟仗义执言，两颗年轻的心都碎了！

六

焦急与忧愤之中，终于盼到了回音。1962 年 1

月，他们收到了邓子恢副总理的亲笔覆信：“你们的信和材料，我收阅了。你们来时，我不在京，未能见到你们。关于农村问题，最近中央已决定把人民公社核算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会较好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请把中央这一决定转告当地农民。”

失望中盼来了希望，努力终于有了一点结果。这年7月，这俩人又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中央委员及省委书记寄出了他们实地调查总结出的《我国农村当前存在的十个严重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说明》，信中尖锐地指出，倘能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的。

10月，他们又寄发了《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八个严重问题》，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批评。

可是作为一介草民的钮惟新、蔡抚民却无法知道，在他们收到邓子恢副总理的覆信半年之后，邓本人也受到了无情地指摘和批判。8月上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支持农民搞单干，说这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大问题。

在9月下旬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会议再次批判邓子恢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漆黑，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全会结束后，以邓子恢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宣布为“十年没办一件好事”而予以撤销。

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农村问题的，可是他关注的焦点却往往停留在农村阶级斗争上面。所以，他不能容忍农村在1961年前后出现的以包产到户形式的分田单干风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严厉地指出：“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作怪。”

一旦将“包产到户”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来上纲上线，那么不遗余力地四处为“包产到户”奔走呼号的两位青年团员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一张巨大的网，张开了。

七

由于连年的殚思极虑、过度劳累，两位年轻人的身体垮了下来。他们微薄工资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买信纸、信封、邮费和油印，长期的营养不良，更使他

们显得身心疲惫，难以支撑。1962年11月的一天夜晚，钮惟新在批改作业时，昏倒在课桌下面。为此，学校给了他3个月的假期，让他到广州亲戚家疗养一段时间。

1963年2月，钮惟新在广州休养完毕，启程回南京老家，在武汉搭乘“民主号”江轮，溯流东去。轮船在芜湖停泊时，规定30分钟后启程，钮惟新将随身携带的手提包放在自己的舱位上，上岸去浏览市容，不料返回码头时，船已提前启航。不得已，他又改乘火车，与江轮并行赶到南京港。

开船后，乘警发现了这个无主的手提包，打开查验时，结果发现里面装有好几份油印的《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和厚厚的几本手写的“农村调查记录”。在这些书面材料上，有不少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政策相违背的内容，还有一些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毒”语言。于是这手提包引起公安人员的警觉，他们决定守株待兔，等候失主。

果真，钮惟新自投罗网，被公安民警押往南京市下关公安分局拘留所。经一夜审讯后，下关公安分局感到案情重大，立即将这戴深度近视眼镜的文弱书生押解到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

市看守所设在南京有名的娃娃桥，与钮惟新的住家仅一墙之隔，他自小在这一带长大，他记得戴红领巾的时候，有时把皮球踢过墙头落到看守所院内，值勤的解放军叔叔还曾帮他捡过皮球呢！他也忘不了当地群众常说的那句顺口溜：“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他没想到在23岁时，自己也会被关押在这里。命运真能捉弄人，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审讯开始了。钮惟新侃侃而谈，对答如流，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农村大饥荒的真实情况，给党中央去信的动机以及自己思想形成的轨迹一一道来，毫无隐瞒。他觉得这样做是份内的事情，不过是行使了一个共青团员的职责。为了减轻同伴的压力，他大包大揽地承认：那份《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签的是两个人的名字，但起草人是我，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但白纸黑字的事实不容辩解。不久，蔡抚民也锒铛入狱了。

随即，便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每次审讯，他们都是坦率地毫不隐瞒地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摆事实、讲道理，坚持自己的论断与原则。他们也知道如果放弃自己的信念，撒谎认错，或许可以得到从轻发落，然而，追求真理的信念是不能动摇的。看守所3年的

铁窗生涯中，在漫漫长夜里，钮惟新曾一遍又一遍地默吟着自己写的一首小诗：

“娃娃桥，娃娃桥，
我的摇篮，我的剑桥，
饥寒中砥砺青春意志，
霜雪里牢记先烈的教导。”

1966年3月，从不断升级的政治大批判中，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这时，对他们的判决也宣布了。

钮惟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蔡抚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接着，他们被戴上冰冷的手铐，塞进囚车，被押送到劳改队服刑。

时间也是刽子手，它可以摧残肉体，蹂躏灵魂。在那梦魇般的岁月里，他们对党的忠诚不曾有过改变。他们知道正是党多年关怀培养的结果，才促使他们矢志不渝地去探寻振兴农业之路。

但他们也同时感到痛苦、困惑。因为当他们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时候，当他们举起右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党都是在教导他们要爱祖国，爱人民，为什么他们按党的教导去忧国忧民时，得到的却是残酷的打击与迫害？为什么他们按照党章、团章的要求向党中央反映群众的疾苦时，却又成为罪状而遭囚禁？为什么当他们听党的话做老实人，讲老实话的时候，铁窗与刑具又无情地封上了他们的声音？

多少年后，当他们拖着倍受摧残的身躯走入阳光时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在那不正常的年代里所造成的不正常的现象。

最使他们揪心的是无辜人也被株连牵累。

钮惟新于案发前在广州与母亲一别，谁知竟成永诀！老人多方询问，都不知原委，直到1970年离开人世之前，还是不清楚自己的儿子到底犯了什么案子。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也违心地屈从社会的压力，另嫁他人，今生今世再也无缘相见。钮惟新的胞兄也受到牵连，背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调离部队，转到地方。

八

历史在经历了坎坷悲凉、荒诞狂热的岁月之后，

终于走过了昨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议，亿万农民加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第一次解决了10亿人的温饱问题。两位年轻的共青团员当年的夙愿终成现实。

1980年5月31日，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谈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历史转了一个大弯子，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又退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正当邓小平讲这番话的时候，年已41岁，蓬头垢面、形同槁木的钮惟新仍在江苏省句容县劳改农场被强迫劳动。10年徒刑期满后，他又被强制留场就业8年，直到1981年才被恢复公职，彻底平反。

历史终于洗刷了他们蒙受的冤屈。当这两个老共青团员再次聚首时，钮惟新把自己新写的两首诗念给蔡抚民听，一首是《瀑布——献彭总》：

“不恋高高的地位，
将生命一倾而下，
冲向顽岩，冲垮朽坝，
把清清的甘泉，
送给田野焦渴的麦苗、稻花……
在秋天丰硕的果实里，
闪烁着你生命的光华。”

另一首是《巨桥——给小平同志》：

“你站在激流浊浪间，
宽广的铁肩，
把断裂的民族道路衔接。
让中华列车，越过历史的沟渊，
紧紧追赶世界飞驰的明天。
啊，巨桥，
风雨里，
你承受住了多少艰难！”

蔡抚民听着，禁不住象20多年前那样的叫道：“惟新，也让我在上面签个名吧，这两首诗完全跟我想得一个样！”

陈独秀之死

靳树鹏

编者按：陈独秀晚年，虽政治失意，贫居四川乡下，仍受到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关注：蒋介石派胡宗南、戴笠登门问政，有意请他出山；毛泽东要他写个检查，即可去延安颐养天年。托派指责他背叛；康生败坏他是特嫌。胡适赞赏他大彻大悟；至爱亲朋惋惜他斗志消泯。他不为所动，执著他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宣言。如今已盖棺52年，本文作者沿着他的生活足迹，拂去历史的偏见与尘垢，真实地将这位暮年的历史人物，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

引子

1992年4月下旬，我们来到四川省江津县县城，由县政协文史办的侯铁生先生陪同去五举乡石墙村。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就死在这里，我们正好赶在他50周年忌日之际。

陈独秀当年寄居的石墙院，是清末二甲进士杨鲁丞的宅第。

杨老进士的这个住宅虽然是青瓦泥墙、泥土地，但当年还是很气魄的，院子有1000多平方米，四周是条石砌成的三米多高的院墙，从大门进来到正房门口共30来米有遮雨遮阳棚，正房、院门左右之前房和东西厢房，共20多间房舍。现在院墙、大门、棚、石屏风和牌坊等都已倾塌不存，后院还保存着一段原墙，尚可略见原来的风貌。房舍大体上还保持着原样，只是墙皮脱落，一切都陈旧不堪，斑斑驳驳，象一个满脸皱纹又掉了牙的老人。陈独秀当年就住在东边的一间正房和两间厢房里。

这里尚有三人见过陈独秀。一位是现在80岁的吴国兴老太太，她当年在杨家帮佣，土改时她家分到这里的房子，现在与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一位是68岁的杨明新，他是杨鲁丞的远房侄子，现就住在陈独秀当年住过的三间房子里。另一位是68岁的李远初，当年她是麻柳小学的女学生，曾为陈独秀送葬。交谈中，我想记点什么，我的外衣扔在汽车里，却找不到一支笔，问谁谁都摇头。我走进陈独秀当年的卧室，杨明新的小孙女在那一堆破烂的满是灰尘的小学课本和作业本中翻了半天，才找出一只破旧的园珠笔，这令我感慨万端。且不说这里曾出过五个举

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在这里住了近3年，并在这里撰写了关于中国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小学识字教本》，50年之后，这里竟然很难找到一只能够写字的笔。这里的房子是破旧的，家具是破旧的，人们的衣着也是破旧的。我的同伴感伤地对我说：“陈独秀就死在这里呀？真不可想象！”

4月29日上午我们一行离开江津。我在急驰的汽车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因为我亲自考察了陈独秀晚年的行踪，也因为近三年来我一直思索着陈独秀凄凉的晚景和他的死。

集大毁大誉于一身

陈独秀死时，国民党中央社只发了三句话的消息，对其一生事业只有一语，即“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连他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没有提及。《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对陈独秀逝世未予报道，批评者也作暂时的缄默。其他报刊倒是发表了一些悼念和评论文章。《大公报》上的悼念短文说：“这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无论在国家或其个人，均不胜寂寞之感。”静尘发表在《古今》月刊上的文章说：“假使陈独秀死在10年前或20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

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引起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象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海里……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这大体上是实在之论。

对陈独秀的逝世,《时事新报》、《新民报》等都发了消息,并评论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晚年“是一个较有操守者”。胡秋原著文说:“他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慧星。”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陈钟凡写了一篇《陈仲甫(独秀)先生印象记》(当时未发表),说陈独秀在“近现代文化史上,不能不算是开山人物”。托派人物也著文悼念他。郑超麟著文称他到死仍然是一员“世界革命的老战士”,“视他为领袖”。

陈独秀病势沉重,他的老友高语罕预挽一联: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陈独秀逝世时,曾代理过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拟的挽联是: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此联大意是:你的言论和文章对传统重估价,都是决断性的,你绝不随波逐流,绝对反传统而行之。遍看全中国,你最出色!社会上对你的诽谤堆积如山,可你的志气博大欲吞江海。你为后世后代作了很多开拓,世人却太对不住你!

两幅挽联都对他备极推崇,也都指出了他终生集毁誉于一身,这一点倒是确实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赞他是“思想界的明星”,“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对他高呼“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936年,陈独秀还被囚禁在国民党狱中,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还曾说,陈独秀那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李大钊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革命的先锋”。被誉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1933年3月初,陈独秀被捕4个多月,还没有判刑,即将公开审判时,鲁迅并没有因为他是托派而斥责之,他写道:“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叶挺颂他为“明灯黑室”,“空谷

足音”。

对他谤之者也大有人在。“五四”时期,林纾作小说《荆生》,影射陈独秀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是“背天反常禽兽”,“以俟鬼诛”。还有人送他个恶谥“陈毒兽”,攻击他“废德仇孝”,诬他主张什么“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至于军阀和国民党等说他是“共党首恶”,“鼓吹共产邪说”之类更是司空见惯。他的托派同伙也一直在谴责他、批判他,以至要开除他,直到他死,曾追随他的彭述之还著文责他“有始无终”。有些原来经陈独秀培养,后为第三国际成员者,在他颠沛流离之际时加诽谤。王明、康生之辈竟著文诬他每月领取日本人三百块津贴,是“汉奸匪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投机革命”、“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说他是“蒋介石的帮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更是不一而足。

陈独秀逝世第三年,毛泽东曾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还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近年来有不少人撰文著书,认为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还比较公正,但不同意陈独秀“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这句话。他们认为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始终没有超出理论与路线的范畴,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正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下,结束了中国8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辟了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应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史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后来毛泽东本人对陈独秀的评价也时有变化。他1953年视察安徽,2月21日上午对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58年大跃进时,他又说陈独秀是“伯恩斯坦主义……不懂得不断革命”。评价因时而异。但也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完全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走进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胡同”。评价的纷纭,至今仍莫衷一是。

“托匪汉奸”事件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谈话,撰

写文章,主张“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已同托派小团体的政治主张不同,拟了解他的真实政治态度。

他还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同叶剑英和博古谈了一次话,以后又单独同叶剑英谈了一次话。到武汉后同董必武谈过一次话,均表示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等亦觉得他的主张与党中央的路线没有大的不同。毛泽东曾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并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这“三条”由毛泽东和张闻天共同签署发出。陈独秀没有接受,但他与党的矛盾也没有进一步激化。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和康生,坚决反对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敌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其中一段奇文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的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第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耸人听闻的谣诬,当即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当然他根本拿不出来。从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了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段锡朋(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长)、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等九人联名的公开信,信中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的《群众》、

《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当时王明任长江局书记,领导此报)1938年3月17日发表了题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短评,该文不但没有提供陈独秀为汉奸的证据,反而说“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这种强词夺理的作法更加引起公愤,陈独秀也大为恼怒,当即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

第二天,即3月18日,不少报纸登出了陈独秀的公开信。这封信言辞激烈,董必武到陈独秀寓所去探望并解释此事,陈独秀竟赶他出去,并大喊道:“你们来干什么?不怕汉奸吗?”后来,周恩来对各方面人士做了很多工作,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当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特意赶到武汉劝慰陈独秀。这场由康生诬蔑文章引起的风波才平息下来。这个事件是对陈独秀人格的侮辱,后果非常严重。它使团结陈独秀抗日的愿望化为泡影,陈独秀与党彻底决裂,也使他最后几年十分孤寂苦闷。

与高语罕、潘赞化之交往

江津县德感坝的国立第九中学,是抗战期间逃亡来的安徽籍人士办的一所学校。高语罕筹备此校有功,潘赞化为该校总务主任。高语罕、潘赞化都是陈独秀多年故交。

潘赞化之名近年来能广为众人所知,与张玉良传记文学作品的发表有关。潘赞化就是这位世界知名的中国艺术家张玉良的丈夫。其实,潘赞化本人的经历也是不凡的。他是安徽桐城人,青年时代曾同陈独秀一块留学日本,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又参加二次革命,后任芜湖港务监督时,初识雏妓张玉良。张玉良年方16,天生丽质,聪敏颖悟,惹人爱怜。潘赞化乃一谦谦君子,遂决定娶她为妾,

婚后并没叫她随侍身边,而是马上送她去上海学习,教师正是刚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

张玉良后来去法国学习绘画。战乱之中,潘张已几年不通音讯,潘赞化对他至爱的夫人既思念又惦记,整日眉头紧锁。潘赞化也常于星期天带三五个学生,过江来探望陈独秀。他告诉学生:“你们向陈仲甫要字,他的字写得好。你们只要买二斤白糖,二斤猪油,再带些鸡蛋送给他就可以了。”学生们就凑钱备了薄礼送上。陈独秀见学生诚意送来,也慨然接受,并要学生留下姓名,容日后作了书落款。

此时,陈独秀已不同潘赞化谈什么政治,开口就是柴米油盐、房子、孩子之类。一次潘赞化对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说:“你老子再无英雄气概了,只有儿女情长,岂非英雄末路?照此情景,恐怕过不了两三年……”

1952年潘赞化才与思念了16年的爱妻张玉良通了音讯。张玉良也急切地渴望回到新中国与夫君聚首。一场反右斗争,使她仰慕的校长刘海粟,还有潘赞化发妻所生、她也爱如己出的儿子都成了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令她百思不得其解。兼以潘赞化也信告她“目前气温转冷”,劝她不要回来,她终于没有回到祖国。这一对相爱至深的人分飞20多年,竟没能再见面。

高语罕,安徽寿县人。陈独秀与高语罕是辛亥革命时结识的。孙毓筠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高语罕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颇多接触。

高还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高语罕留学回来成为中共党员,曾在党办的学校里任课。他与陈独秀同住上海,常有往来。高语罕伉俪入川,谋事未果,只得移家江津县以著述谋生。高语罕与陈独秀是30多年的朋友,可他在江津街上碰到陈独秀时,陈却不理睬他,仿佛谁也不认识谁。高语罕深知他敬慕的这位朋友性格耿直,喜怒形于色,现在如此对待老友,一定有什么原因。后来他终于知道了。原来,陈独秀出狱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文章中写道:“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说大话,而是要有具体的事实表现,这种具体的事实表现,就是除了汉奸以外的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陈独秀的话是不错的。高语罕到重庆后,在《前线的安徽》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民众总动员问

题》。文中写道:“有人说,‘抗战时期,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就不能顾虑到什么民众的生活了。’那是瞎话。”高语罕的话也不错,只是他与陈独秀立论点不同罢了。一个好事者对陈独秀说:“高语罕写文章反对你,说什么‘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是瞎话。”陈独秀听了大为恼怒。他们此次失和很快就冰释,又来往如初了。这大致是因为高语罕夫人王丽立女士是位能干的医护人士,同潘兰珍相处甚洽。王丽立的侄女王立人同金龙云结婚时,陈独秀是证婚人。王丽立在财济委员会的支持下筹办妇孺医院时,陈独秀也在道义上给予了不少帮助和鼓励。有一次高语罕对他夫人说:“你还记得10多年前我们的两个孩子被国民党抓进漕河泾监狱时的情景吗?”王丽立说:“怎么不记得,我常去监狱探视他们俩,送去点吃的和零用钱,仲甫就骂你家庭观念太重。”高语罕又说:“是呀,现在他可大变了,常把松年夫妇和几个孙男孙女找去团聚,亲热得不得了。独秀怕是快了,性情竟变得这个样子!”

潘赞化和高语罕的话都不幸而言中。

陈独秀死前两个月又同高语罕绝交了,高语罕去看望他,他也不睬。办完陈独秀葬事后,高语罕把潘兰珍请到自己家里责问她:“我和仲甫30多年患难之交,敢说此地居留的一切熟人中没有第二个,为什么他病重不通知我,死也不通知我?”

潘兰珍说:“这不怪我,是他们捣的鬼。”

“3月29日江津县国民党党部召开大会,有安徽党人演说,借着老先生在《大公报》上只发表了一半的那篇文章大骂老先生是反革命:他们说,这种辱骂的幕后策动者是你,所以‘矮子’恨你恨得要死!连我,他都不要我理你!”

其实陈独秀并不矮,只因高语罕个儿高,人称高大个子,所以他私下里常称陈独秀矮子,潘兰珍也顺口这么叫的。

事情是这样的:陈独秀写了两篇连续性文章:《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和《再论世界大势》。《大公报》3月21日发表了前一篇文章并准备接着发表第二篇文章。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处主任潘某,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结果《大公报》未能发表后一篇文章而开了天窗。当时江津县长罗宗文在县城东门外体育场主持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6周年群众大会,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安徽人林铁庵,被推上台讲话,他厉声批评陈独秀的

文章。但此事并不是高语罕策划的。

诗学和书法

陈独秀从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社会政治，一生漂泊无定，但对文字学、诗学和书法的兴趣，却从未曾磨灭。

他晚年拟写两部著作，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学。他与友人谈话中多次表露此意，在致合静农的信中写道：“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学方面始成一书，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遣同好，免完全散失也。”可惜他志向高远，生命无多。他的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以未完成面貌在台湾出版，书名被改为《文字新论》，总算流传下来。中国史竟未能再写一字。

陈独秀青年时曾练过书法，无论行草隶篆，均粲然可观，凡为人题写，大体浑然天成。无论是他青年时还是老年，也无论在狱中或蛰居山野，都有人求他题写。他对书法也确实有独到的见解。他年轻气盛之时，曾找上门去对素昧生平的沈尹默大声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对沈尹默刺激颇大，使他发愤钻研书法，他最终不但成为一位名学者，也成了闻名的书法家。

我国最著名的佛家机构支那内学院，在抗日战争时也迁来江津，其主持人欧阳竟无先生的经史，天文历算，书法和佛学均堪道。支哪内学院位于江津大东门外长江边上，与江津公园毗邻。陈独秀与高语罕夫妇曾多次去支那内学院，同欧阳大师诗墨盘桓，有时也搓几圈麻将，如欧阳竟无藏有武荣碑帖。旧历年关，陈独秀给欧阳竟无先生写去一首诗，其实是诗代柬，求借武荣碑帖。

碑拓也好，帖也好，都解决不了肚皮问题。潘兰珍对他说：“老先生，我们也栽种点土豆吧？”

“好吧，你先去买些土豆栽子，我同你一块去种。”

他们还真种上了一小片田土豆。

陈独秀并不是以诗人名世的，然而他确实是造诣很高的诗人。他是个政治人物，他的好多诗都是针对现时政治的忧国忧时之作，如早年的《哭汪希颜》、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和晚年的《金粉泪》56首等。马一浮曾对人说：“君知当年寄居杭州萧寺时，有一人能背诵《杜诗全集》而不遗一字者乎？此人即今之陈独秀是也。”陈独秀对中国古典诗歌确实下过苦功夫，他对中国旧体诗的各个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如他的古体诗《述哀》、《挽大姊》、《告少年》等，雄浑、沉稳，气势很大，口语入诗不留痕迹，雅俗共赏，难能可贵。他的近体诗以五律七律最为突出，无论遣词造句、韵律、意境，都是上乘之作，可称得上艺术高超，技法娴熟。如他居杭州时的一组诗，《感怀》20首和《华严瀑布》，皆为众人难以企及的佳构。

邓燮康其人

陈独秀的丧葬事宜主要是邓燮康大力承办的，陈独秀就葬在邓燮康的别墅康庄。

邓燮康曾是一位热血青年，2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市政系，是学校的军事体育部长。因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经邵履刚（邵力子之子）介绍加入了C·y（共青团）。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因邵履刚去了苏联，邓燮康失去组织联系而消沉下来。他同复旦大学预科班女学生胡道芬恋爱。胡道芬非常漂亮，又善于演戏，著名导演洪深曾为她排过戏，称她是“胡蝶第二”。邓燮康拒绝了家庭的包办婚姻，并与胡道芬于1929年回四川结婚。邓燮康返回四川江津后，任白沙镇黑石山聚奎中学校长（当时该校以其祖父邓石泉名字命名为石泉中学），后任江津农工银行经理、董事长等，一直从事金融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家接纳过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曹靖华、合静农等，邓氏不仅在生活上，还在文化出版事业上帮助他们。

陈独秀死后，也有人邓燮康如此热心于陈独秀的丧事颇有烦言，他知道后来火了火气，用满口四川话怒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外乡人贫病交加死于此地，总要有个安身之地嘛！”

邓燮康在县城内四处奔走，不遑寝食，特别在三两天内想买到一副上好的棺木谈何容易！几经变化，几经周折，慷慨陈词以至舌敝唇焦声泪俱下，才将衣衾棺木置办得十分圆满。

在陈独秀的葬礼上没有人致悼辞，也没有宣读蒋梦麟等人唁电唁函的仪程，陈铭枢等人拟的挽联也没有书写悬于灵堂之上。

6月1日出殡这天的情景，高语罕写过一简短的记事文登在《大公报》上。文中说：“是早，灵柩由鹤山坪异至双石桥附近登舟下驶，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鸣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舟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随之而来者，则有其通家子邓仲纯（初），学生何之瑜；迎于江干者，则有友人光明甫（升）、光宣甫、方孝远（时简）、合肥李运启（应生）、安庆程筱苏、胡子、芜湖程光炽、无为何海若、江津邓翰秋、邓燮康、周萼陵、孙茂池；寿县高语罕等。又有南京士绅刘竞生先生与陈独秀素昧生平，亦因钦慕其为人，前来送葬。此外则有先生之戚党同乡数十人而已；其自重庆赶来者则先生之北大高足张国焘、段锡朋、俞飞也。”

陈独秀穿着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躺在檀木花板里。这副棺木不算大，但质地很好，八人抬着还觉得沉。棺上扎了很大的一朵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着开路。

送葬的队伍肃穆悲楚缓缓而行。

这时，来了两个陌生人，从人群中找出邓燮康加以盘问。

“我们知道你是此地名流，在这国难之秋，你却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他是个无党无派的学者，是敬仰他的道德文章……”

来人没等他说完，又喝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炮放炮，好大的张致，叫人疑心，是否要来个小小的‘五四’运动？”

“您先生言重了。我出生在这里，此地乡风淳厚，谁死了都是如此，哪里会有什么运动。”

“你为什么对于他的事这样热心，替他买棺材办丧事？”

“不过因为陈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化界有很大的贡献。现在江津穷窘以死，身后萧条；而陈先生的朋友又都是寒素书生，无法张罗。我们身为本地士绅，平时又钦慕其为人，现在他死在这里，我们不忍看他陈尸于室不能收殓，故而出面为他张罗。”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陈独秀辞世，已经20年过去，但不知在送葬行列中有没有共产党员。他弥留之际赶来的包惠僧，从重庆赶来送葬的张国焘，都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个中国代表中的人，但此时他们已都不再是共产党：一个脱党，一个叛党。何之瑜和高语罕也都曾是共产党员，后来都参加了托派。

陈独秀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一生奔走呼号，现在终于入土为安。这块墓地不错，背后是茂林修竹的青山，前面是滔滔不息的长江。

各派政治力量都没有忘记他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就已经落魄，他1937年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后，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但他终究是个政治人物，所以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没有忘记他。

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的张国焘，一直密切注意陈独秀的言论和文章，并向蒋介石献计说：“仲甫先生出狱后，发表了许多抗日的言论和文章，有些对我们是有利的，可否请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他，将他有利于我们的抗日言论编辑成册。这将对延安宣传的有力武器，比叶青等人写的反共理论文章，分量要重得多。”

蒋介石还真接受了这个意见，指示胡宗南和戴笠以私人身份去访问陈独秀。

正是初夏时节，胡宗南和戴笠穿着白绸裤褂，披着蒲扇，从重庆的朝天门码头登船，逆江而上。他俩便装简从，只带了些茅台、水果等礼品。二人都没见过陈独秀，此事又是张国焘的主意，就想拉上张国焘一道来。但张坚辞，理由是怕引起陈独秀怀疑，见了面反而不好说话。况陈独秀身边常有高语罕夫妇在，泄露出去，也容易被延安抓住把柄。

他们虽然拜访一位栖居山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煞费苦心，商量的各种细节。原来不想用真名求见，又怕不被重视而拒之门外，或即使见了面也许只是敷衍了事，最后决定还是用真名求见。还商定见面之后，一切由胡宗南出面，戴笠连边鼓也要少敲。

他们在江津下船后，乘滑杆，几个部下拎着礼品步行跟随，真奔鹤山坪。这两个人都够得上国民党知名人士：一个是兵权在握的“西北王”，一个是军统特务的大当家。但他们经过双石场时，既没有洒水扫街，也没有设岗清道。因为地方上没有得到通报，也根本不知他们是何许人。

一行人来到杨鲁丞旧居的大门前，胡宗南和戴笠下了滑杆后，认真看了看陈独秀这个住处。只见石砌的高高围墙，石砌的八字大门，内设石屏风，门外有石刻的节孝牌坊，还有几棵大黄楠树，远看是青山

幽谷。

胡宗南说：“陈老头的住处还真有些古韵。”

戴笠说：“听说他不是住在正房，而是住在厢房里。”

“哦，终是寄人篱下呀！”

他们叫随从等在门外，亲拎礼品走进大门，转过石屏风，正巧看见身材高大的高语罕从厢房走出来。高语罕曾是黄埔军校的著名政治教官，他们尊之为师。高语罕高度近视，根本没看出他们是谁。他俩趋步向前道：“高先生别来无恙？学生有礼了！”

高语罕认出他们后颇惊奇，接着就很热情地说：“不知二位驾到，有失远迎。”

“老师，我们是专程来拜访仲甫老先生的。”

“请稍候，我去通知。”

高语罕进屋不一会儿，房门就打开，高语罕夫妇双双走出来说：“有请！”

进屋后，高语罕夫妇亲自为客人泡茶，热情招待。

陈独秀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二位来的！”

胡宗南答道：“是的。”

沉默良久，陈独秀慢吞吞地说：“鄙人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知二位来此何意？”

胡宗南说：“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面。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敌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沉思良久，又看了看高语罕，才慢慢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但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度过。本人孤陋寡闻，恕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

当时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最关注的还是陈独秀的政治见解，而非他的疾病和贫穷。1942年5月8日，即陈独秀死前19天，《解放日报》发表李清心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理论》。胡适见到何之瑜整理的《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后，异常兴奋。他于1949年4月14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的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序，认为这“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书名改为《陈独

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托派人物王凡西则认为：“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他在《最后论文与书信》中所表示，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不少同志，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并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变影响之下，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是非非，需要许多文字才能加以评说。但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最先举起到晚年也坚持不渝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三面旗帜，我们还应继续高举；还有学者认为最后见解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这个思想纠正了传统理论中过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忽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对于完善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颇多借鉴处。

中国共产党曾打算把陈独秀养起来，并委托朱蕴山去看望他，劝他去延安。陈独秀说：“党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陈独秀入川后，除文中提到的外，尚有他的老友和崇敬他的章士钊、柏文蔚、许德珩、台静农等多人去看望过他。邓仲纯则是他的义务保健医和通信员。

不是尾声

1992年5月，笔者有幸来到陈独秀的出生地——安徽省安庆市，参加第二届陈独秀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陈独秀长孙女陈祯祥，《陈独秀传》（上）作者任建树，我们三人去了独秀山，回来时拜祭了陈独秀墓。第二天，友人送我一篇文章《无碑的墓地》，此文曾获安徽省大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作者是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81届学生阎新建。文中最后写道：“呜呼！善良又好心的人们，西子湖畔重修了岳王墓，舞台上摇摆着包黑子，庙里的菩萨也重塑了金身，唯独亲手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帷幕的陈独秀，连一块石碑都无法存留。……但是我觉得，有念叨‘忠臣清官’的功夫，何如更多地宣传‘民主与科学’；有重塑泥佛木偶的钱财，不如给陈独秀立上一碑，写下他的功过是非，使人们得以了解历史。”

现在，陈独秀墓已经重新修建，只是没有封顶，大概是表示尚未盖棺论定之意罢。

（责任编辑：刘家驹）

「毛泽东热」中的文坛造假风

☆徐焰

自 80 年代末以来,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滋长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的怀念之情,出版界也兴起了“毛泽东热”。有关毛泽东生平活动的各种题材的作品不断问世,其中有些生动地宣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作风,再现了领袖的风采神韵,深受读者欢迎。然而在近年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如同产品成为名牌即有假冒,借“领袖热”谋利并不惜造假的现象也在文坛出现。有的人凭想象编造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活动和言论,并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专门杜撰“决策内幕”和生活“揭秘”。这类历史膺品,再经某些小报和“剪刀作者”、“复印机作者”以讹传讹,更是谬种广布。对此等造假和传讹之风,一些历史当事者和家属及社会上有识者,皆愤慨不已。为端正出版界风气,制止歪曲领袖现象的行为,亦应针对这类不正之风开展“打假”。

对领袖个人生活情节任意的杜撰

过去长时间里广大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知之较少,“领袖热”兴起时人们的注目点首先对准此类问题。近年来,描写毛泽东个人生活的不少作品反映了过

去人所鲜知的真情,如毛泽东爱吃红烧肉等趣闻一时脍炙人口。与此同时,对毛泽东婚姻生活的误传、编造和曲解却也随之而发。

1984 年贺子珍去世后不久,就出现了一篇自称是“根据贺子珍生前口述”及其亲属和江西省委方志纯等领导人“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写成的”《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这篇纪实题材的作品描写了毛泽东的家庭生活,并以大量笔墨记述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相见的情景。其中有彭德怀与毛泽东“争吵”被贺子珍在门外听到的场面,有毛泽东与贺子珍重逢的长篇对话,还有所谓毛泽东陪贺子珍在“明月”下观景并吟诗,以及所谓因康生告密江青赶到庐山来“大骂”,贺子珍被迫提前下山等。

应该承认作者的文才,文中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言谈及表情写得绘声绘色、细致入微。此文一出,不少刊物小报将其作为信史转载,至今还有人在所编的书中收录此段描写。然而当时笔者即感到文中所写与史实不符,1985 年夏天为此专门访问过到京开会的方志纯。方志纯作为 1959 年陪贺子珍上庐山见毛泽东的当事者,说明此文严重虚假。毛泽东事先问过方志纯有关贺子珍的情况后,决定由方安排这次

会见。除方志纯、朱旦华夫妇和杨尚奎、水静夫妇以及个别卫士外，并无他人知情。会见只有一个多小时，贺子珍心情悲伤，根本没有什么赏月吟诗的雅兴。至于彭德怀在场、康生发现后告密、江青上山大闹等情节，都系凭想象编造。对此，1992年水静在《家庭》杂志发表了题为《我陪贺子珍上庐山见毛泽东》的回忆录，也澄清了这一事实。

在此书中，对毛泽东与贺子珍关系的其它一些描写及毛泽东家庭其他成员的介绍，也有许多违反事实之处。如描写1949年10月1日贺子珍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顿时发病，“全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她却在这一刻倒下过了……”，事实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未讲此话，只是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过：“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页）。近年来一些书籍、文章及电视台的介绍，也在此犯了史实错误。至于贺子珍听到广播中毛泽东的声音发病，是1954年的事。

近年来描写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作品也有不少，其中亦有许多不实。例如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后的所谓“约法三章”，粉碎“四人帮”后即有一些传闻；前一时期台湾刊物登载所谓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时缴获的“王若飞日记”（只是公布其内容而非“原件”手迹），里面记录了这样的“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对于这个“约法三章”，不仅国内一些小报登载，《毛泽东之谜》等书还不加说明地将

其作为信史叙述。笔者根据对当事人的采访及考证，证明这个所谓“王若飞日记”内容全不可信。1938年末毛泽东与江青结合虽然确在党内一些领导中引起反对意见，然而这确实是党中央认可的“结婚”。此后江青的名份已是毛泽东的夫人，决不是所谓“负责照料”“生活起居”。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根据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观念和党内干部婚姻问题上已形成的准则，也不可能允许这种不伦不类、封建家庭通房丫头式的“不能以夫人自居”的“照料生活”者与领导者公开同居。

近年孙晓、陈志斌写的所谓战史文学“三级跳”之一《东方的落日》，也以相当多的篇幅编造所谓毛泽东与江青的生活细节，其中还包括许多私房话，如让江青抱怨自己多年“连个名分都没有”，又如何受丈夫安慰。书中还称：“江青对叶剑英的印象一直不错”，中央开会讨论毛泽东与江青“热恋”问题时，“叶剑英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确实需要有人照顾，江青应该留下。”别的且不论，从史实看此说即纯系谣言。熟悉抗战史的同志都知道，毛泽东与江青结合时叶剑英根本不在延安，而是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也根本未参加过这种会。

更有甚者，某些作者还以自己的封建观念来编造毛泽东的言行。如《中国妇女》杂志上一篇文章描写毛泽东收养侄儿毛远新时，竟编造毛泽东的话称：“这是毛家的一条根，我得留下。”毛远新的生母朱旦华已经对此公开辟谣。还有的作品描写毛岸英时，也把毛泽东描写得类似封建家长对嫡长子寄予厚望，也是极为荒谬的。

由于历史的进步，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生活状况已经可以公开报道。不过，即使是描写普遍公民的生活，随意编造或传播谣言诽谤他人，都是法制国家所不能允许的。对于那种凭自己想象随意编造领袖或名

人的生活细节以哗众取宠和谋利的行为,当然必须严禁,某些情况下还应追究责任。

凭想象编造领袖活动之谬

近年来一些书籍和文章描写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政治军事活动时,也出现大量凭想象编造以至谬误层出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对这些问题无知,却又偏要成书。这种胡编乱造不仅是创作上不负责任,还容易出现政治性错误。

毛泽东的军事决策过程,近年来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黑雪——出兵朝鲜纪实”、《喜马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和《冰点下的对峙——1962—1969年中苏边界之战实录》等书即就此大作文章。其实,《黑雪》的大量描写只是小说式的虚构。至于后两本所谓“实录”,其对中印边界反击战和中苏边界冲突中决策过程的描写不仅是凭空编造,作者还将自己因缺乏地理、历史和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所造成的大量谬误加在其编造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话中,以致书中所谓领导人的言谈中违反历史常识的谬误百出。在涉及严肃的外交、民族和领土问题上如此胡乱编造,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严格讲来对领袖人物的形象也是一种亵渎。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及中苏关系的问题,近年来也成为描写毛泽东的作品中的一个热点,在这方面由于讹传也造成了假史料传播。赫鲁晓夫回忆录(包括《最后的遗言》)里面确实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知的历史情况,但是这一回忆是作者七十几岁时只凭自己的记忆口述整理而成的。由于他的偏见和记忆错误,回忆录中一些内容并不合乎历史。如书中赫鲁晓夫称毛泽东在1949年不肯解放上海,曾“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还解释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这些与解放战争的历史显然不符。有的

作品不加考证地将这段回忆当信史引用,这种传谣在社会影响上同样也起了造假的作用。

近几年的作品中不仅对毛泽东的描写有许多失实之处,对周恩来等人的描写也同様。例如有一则关于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如何反应的消息,在国内一些书刊、小报甚至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都作为信史引用。其中说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雅尔”发言要各国代表起来哀悼,并问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只有一位夫人”等。熟悉现代国际知识的人,一看便知其假。因为在周恩来去世时联合国的秘书长根本不是德奎利雅尔,而是瓦尔德海姆。至于世界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终身只有一位夫人者,也为数众多。西方国家竞选时,在生活上丑闻者、曾经离过婚者往往很难当选。尽管引用这一内容的主观愿望是称颂周恩来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其效果也会使假历史传播。

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可是近年来一些大写历史题材的作者既未认真研究过历史,又不下功夫去调查研究,只是靠蜻蜓点水式的采访或干脆闭门虚构猎奇,以吸引读者。这里充分暴露了作者的无知、懒惰和写作中的庸俗化倾向。前几年出版的林彪所写的《林彪传》,作者连林彪在井冈山的红四军任职这一党史基本知识都不清楚,将林彪写成鄂豫皖即大别山的红四军成员,而这厚达两大部的《林彪传》却以庸俗编造吸引买者,书中甚至出现了大段林彪与叶群的“床上戏”描写。如此之行,令人浩叹!当今仍沿用过去枯燥说教式的写法固不可取,作者确应该注意大众的喜好,但是也不应迎合或助长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为对历史、对出版事业负责,对那些没有调查研究、靠胡编滥造惑众的作品,应坚决批驳,决不能听之任之。

“剪刀作者”和“复印机作者”的推波助澜

一些编造领袖人物活动的造假之作泛滥，近年来社会上兴起的一批“剪刀作者”、“复印机作者”所“编”之书刊，亦起了推波助澜、促其传播的作用。

前些年文坛论及收入时有人称：“写书不如编书，编书不如出书”。“毛泽东热”之后，编领袖人物的书也成风潮。不能否认一些编者在资料整理上的努力和作用，可是相当大一批编者却是以出书谋利为目的，只是将他人已出版的作品现成取来，自己如幼儿搭积木一般进行组合，加一题目即可成书。如今书摊上观之，所编有关毛泽东的书有相当大一部分属抄来抄去，内容雷同。这不仅是信息浪费，许多还系剽窃他人著作的违法行为，因为不少“编”者卖书获利后，非但不向其所收录内容的原作者付酬，甚至不告之。

过去均言文坛抄袭可恶，毕竟还是费力“抄”了一遍。如今技术手段进步，许多编者剽窃他人之作，已不费笔力，用剪刀、复印机即可。一些编者之名纯属子虚，出版单位之称亦冒用他名或纯粹“莫须有”。此类编者和出版者，又专门喜好猎奇式地编造领袖人物活动之作。一些小报、杂志的编辑也贤愚不辨、真假难分，登载一些貌似情节生动、实则虚假充斥的所谓“历史揭秘”。

例如题为“纪实”的《黑雪》中描写毛泽东、周恩来在出兵前的决策，特别是斯大林、周恩来“莫斯科会谈”一章，本系小说虚构，历史上也无此莫斯科会谈。一些小报、杂志却将其当成信史转载，山东大学出版的《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一书，还将其引为史实根据，如此以讹传讹，竟以假当真了！

在所谓战史系列“三级跳”中的《喜马拉雅山的雪》中，还有大篇对“毛泽东主持”决定对印反击的“西山军事会议”的描写。其内

容纯属杜撰，所编出的大段国家领导人讲话更把中印边界的历史、现状和军事形势讲错。一些小报和非法印刷品对此却大感兴趣，转载或翻印这一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会议“内幕”。正所谓“铜钟弃毁，瓦釜雷鸣”，如同生产、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冲击优质产品一样，文坛上造假之作盛行，也使许多人认假历史为真。

今年春天，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些代表严厉谴责了文坛乱写、乱出有关领袖人物作品的歪风，随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以前也查禁过有严重错误的作品，如《雪白血红》、《喜马拉雅山的雪》等书。不过因法纪在某些时候执行不严，图书市场秩序未完善，加之前一段文化领域正常的批评开展不力，非法出版、造假等歪风仍未能很好遏制。有的以“纪实”、“实录”之名造假者面对有实据之批评，还以理亏气壮的态度反诬别人不通文学。其实，查文学辞典，对纪实、实录的注明均为对真实情况的记述，不能允许虚构，而此类作品之封页简介又均有“史料翔实”等自诩。在兜售作品时自吹如何真实，遇到别人据实批评又以自编的“文学理论”声称可以虚构，岂非逻辑不通、自相矛盾？联想在拜金主义影响下，一些造伪劣产品的厂商大作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一旦被戳穿即蛮不讲理地强辩，这等行径也就不足为奇。不过观此歪风，也可使人看到文坛上的一些作派同样到了可悲可叹的程度！

在公开出版的作品中描写毛泽东的活动，是一项严肃的事情。坚决剔除描写和宣传毛泽东中的一切不实，是真实地再现毛泽东形象的需要，也是人民的要求和忠于历史的正直作者的责任。打击假丑恶，才能扶持真善美，在文化领域也开展“打假”，才能保证创作和出版的健康风气，为广大读者提供真正优质的精神产品。

蓝盔部队



未曾披露的 新闻

☆黄创新 马晓春

万里晴空，湛蓝如洗。

联合国派出的银白色大型机徐徐降落。飞机刚刚停稳，头戴蓝色贝雷帽的官兵们精神抖擞地走下飞机。

是时，1993年9月12日下午3时50分。北京首都机场。

嘹亮的国歌和军歌响起。早已等候在机场的战友、亲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与归国官兵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外交部、民政部、解放军三总部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亲临机场迎接载誉归来的官兵。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景代表祖国和人民检阅了这支部队，称赞他们为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为祖国和人民军队赢得了荣誉。

1993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军委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官兵代表，勉励他们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来自最高层的决策

时光回溯到1991年10月23日，中国、美国、苏联、法国、越南、柬埔寨、日本等19个国家的代表聚会巴黎，共同签署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和平协定，简称巴黎协定。并决定分为三个阶段实施：柬冲突四方立即全面停火，成立由柬四方领导组成，以西哈努克为主席的全国最高委员会；开放四派控制地区，1992年9月底前四方各裁军70%；重建国家权力机构，于1993年5月举行全国大选。

为了保证此决定顺利实施，联合国又通过745号决议，决定向柬派驻“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英文称简“UNTAC”（安太克）。

巴黎协定签署的当天下午，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国幽雅的休息厅里，西哈努克亲王向中国代表、外交部长钱其琛表达了希望中国派军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愿望。迎着亲王和蔼信任和目光，钱外长回答：“中国一直主张柬埔寨早日实现民族和解，我们一定认真考虑亲王的意见”。

1992年2月中旬，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通过外交途径，请求中国派出军事观察员和至少300人的工兵分队，参加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维持和平行动。

对柬埔寨的独立与和平，中国政府一贯十分重

视和关心。当年朗诺集团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苏联推出国门的时候，中国人民伸出热情的双手，拥抱和接待了这位几乎是无家可归的亲王。从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便十分关注柬埔寨的和平事业，特别是越南派兵侵略柬埔寨之后，中国更是义无反顾地支持柬埔寨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如今，柬埔寨有了和平的契机，当需要各方面支持的时候，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顾。这是因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放弃维持和平的机会。

为此，中国政府在接到西哈努克亲王和加利秘书长的请求之后，经江泽民、李鹏批准，决定派出47名军事观察员和由400人组成的军事工程大队前往柬埔寨参加维持和平行动。

成建制派出部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对中国来说，始终是个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一双巨手推开国门使开放的中国面向世界的时候，中国政府才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和平行动。1988年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特设委员会成员国。之后几年，中国虽然向科伊边境和大马士革等地派遣过军事观察员，但均是分散行动。而这一次，中国将要成建制地派出一个野战工兵营！这非同一般的决心和气度，标志着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和军队终于走上了国际大舞台。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又叫“蓝色贝雷帽部队”、“蓝色和平使者”。1948年6月建立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迄今，联合国至少25次组建维和部队，并派向有关冲突地区。参加维和的总兵力超过50万，分别来自100多个国家。阵亡者约900人。由于这个部队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和平解决冲突等有关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88年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派遣，由联合国秘书长或成员国申请，征得冲突双方同意后，召开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至少有9票赞成，而且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投反对票，方能派遣。维和部队不装备重武器，最多只装备到机枪。每年用于维和经费达27亿美元，小规模行动，由联合国日常开支中支付，大规模的行动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发达国家“摊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命令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的日期是：1992年3月11日。

根据联合国的要求，部队到柬60天内的生活保障自行解决。柬埔寨多年战争造成物资供应困难，道

路破坏严重,各种疾病流行,所以部队所需物品只能立足于携带,而且一次带足,因为中国国内无法实施及时有效的保障。为此,他们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筹措了17类,550多个品种,价值300多万元的物资。而对这些物资的检验、包装比购买这些东西更需要时间和精力,所有这些,他们都已完成得相当出色。

1992年4月初,在意大利制作的蓝色贝雷帽、蓝色围巾、蓝色臂章被空运到部队驻地。这是维持和平部队必须佩戴的统一标志。按联合国规定:蓝盔部队官兵着本国军服,佩戴本国军衔;左臂佩戴代表中国的红色五星臂章,右臂佩戴有地球麦穗标志的意为联合国的圆形臂章。所有车辆一律喷刷成白色,并喷有醒目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英文缩写“UN”标志,赴柬官兵配备的微型冲锋枪和手枪,只有出于自卫,才能被批准使用。

1992年4月1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蓝盔部队——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400名官兵开赴柬埔寨。

修桥铺路

在所有赴柬部队中,中国部队是第三个到位的。

中国军事工程大队组成50人的精干分队,首先突击抢修4号公路上的6座桥梁。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座桥,全长27米,桥面早已腐朽,一侧无立柱,另一侧的立柱距桥至少有5厘米以上的间隙,车辆上桥以后,桥面下坠,并左右摇摆。在现场,大家献计献策,最后确定把修桥重点放在提高桥的整体结构上,在桥下重新支了8根立柱,并用螺杆和木材将它们连成一体,然后用混凝土浇筑桥垫,使桥的承载能力提高了一倍多。

如同首批工程兵大队长李金勇第一次接受任务一样,当马继东带领又一支部队来到柬埔寨后,受领的仍然是几乎相同的任务——修桥铺路。所不同的是后者的任务更困难更艰巨。

上丁机场是金边通往柬埔寨东北数省的门户,同时还是保障联柬人员输送、物资供应的重要枢纽。不幸的是连年战争使这个机场的停机坪和跑道遭到严重破坏。联柬机构对修复上丁机场十分重视,强调必须在大选前完成。有关部门已动员了一批民工和组织部队工作了三个月,但只完成了工程总量的

36.8%。随着柬埔寨大选临近和桑德森催命似的紧逼,工兵处长贝德利已是茶饭不香、焦急万分。他深知中国工兵所担负的任务已十分繁重,不好意思再开口,只是婉转地在大队长马继东面前长吁短叹。聪明的中国人当然听得出这弦外之音。马继东派人经过仔细勘察、反复论证,主动提出承担该项工程,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完成任务。

4月10日,由35人组成的施工分队被空运到上丁。由于机械设备无法空运,施工分队不得不依靠租用当地陈旧的机械,在无遮无掩的烈日下施工。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转。不多不少,恰好一个月时,贝德利接到中国工程兵完成任务的报告。贝德利兴奋之至,将自己一顶心爱的礼帽亲手送给了负责施工的中国军官袁春国,以表达他给予中国工兵的最高礼遇。施工人员全部撤回驻地后,这位上校处长还用他自己的工资买来10箱啤酒为大家接风洗尘。

妓女·毒蛇·地雷

对一个在山坳里长大的王爱华来说,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出国。事实上,他已经开着他的“UN”车在柬埔寨奔驰几个月了。由于部队驻地没有水源,中国工兵大队的饮用水要从10多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用车拉。王爱华开车技术娴熟,人又勤劳,所以领导便把这份差事交给了他。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迷彩作训服,脚踏马靴,开着这台白色的“UN”车,王爱华感到神圣、自豪。

灿烂的阳光透过椰子树,洒在他的身上,他更觉得惬意。他悠然地吸着烟感受着这种异国风情的秀美。他在这里等着水车自动上水。不知不觉中,一位俏丽的小姐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女人先是朝他微笑,接着便打起了手势。王爱华看她用中指勾着食指,起初并没有反应过来她这是什么意思。女人看他无动于衷,便凑上前来,一只手拉住小王的手,另一只手却伸向他的腰间……小王这才明白她是什么人——妓女。这女人遭到小王断然拒绝后,怏怏而去。

中国工程兵大队部分官兵北上到斯昆施工,当地妓女闻风先至,在营区对面搭起小楼,挂起红布门帘准备做生意,谁知半月后还无人光顾,只好悻悻而去。

或许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或许是生活所迫,妓女在金边已形成“市场”,无论是白天夜晚,无论街

头巷尾，涂脂抹粉的妓女随处可见，其“主动”、“大胆”、“便宜”，可谓“世界第一”。黄昏过后的一个夜晚，我们也来到“红灯区”实地察看。刚从小汽车里出来，便有一群妓女蜂涌而至，搭话的、打手势的、动手动脚的、传递飞吻的，千姿百态。但目的只有一个：请跟我来，留下美元。

我们从这条 300 余米的巷子走过，至少发现有 200 多妓女在几十家门口招揽“业务”。谈不上“生意兴隆”，但也未必门庭冷落，其中确有“安太克”人员。难怪明石康曾严肃地告诫“安太克”人要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弘扬本民族最优秀的部分。据报道，每到晚上，法国营地周围妓院的 30 多名妓女都要出来拉客，许多士兵晚上出去执行任务时被妓女纠缠一时脱不开身，有的甚至被一群妓女生拉硬撕进了妓院。相反，中国蓝盔部队纪律严明，举止端庄，无一人去逛妓院，明石康多次在讲话中称之为“安太克”树立了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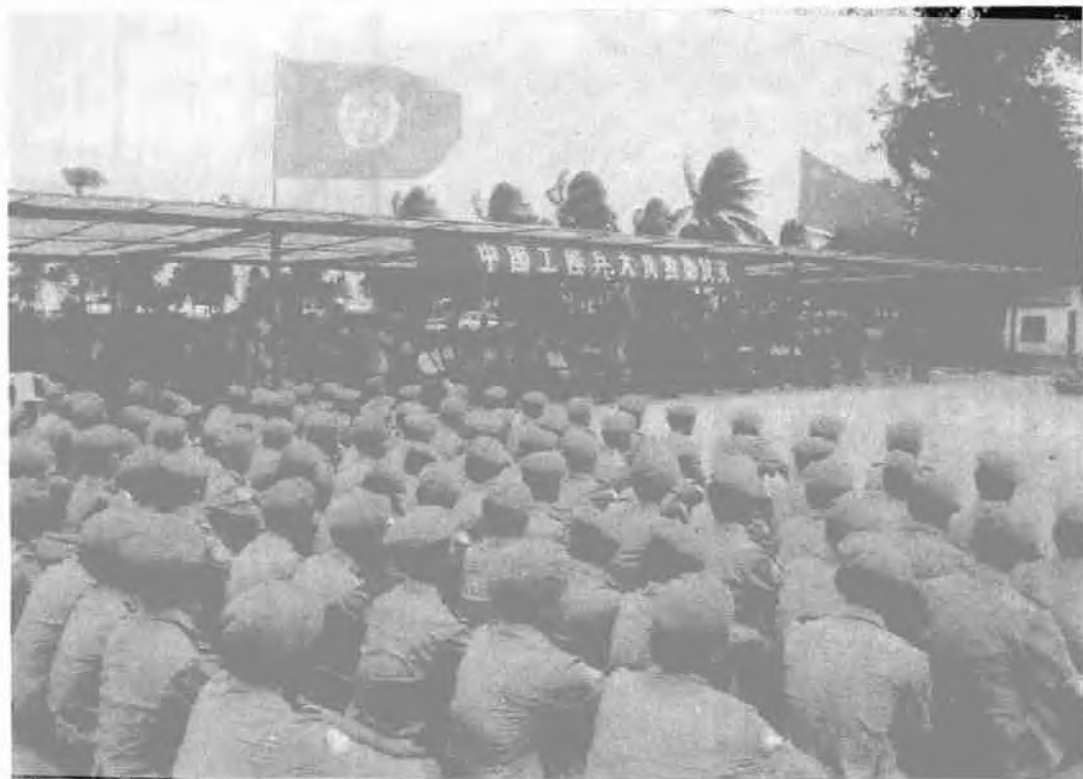
在联柬机构的记录中，仅 1993 年 1~6 月，就有 2756 名联合国人员在柬染上了性病。

妓女并不可怕，只是让人厌恶，但在这里的各种毒蛇却叫人发怵。时常出没的毒蛇，几乎旁若无人，屋里屋外，床上床下，甚至抽屉都成了它们栖身的地

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给人带来伤害。正因为如此，每遇毒蛇，大家都一起围攻，直至消灭。一次，一条绿色的毒蛇窜进了工兵大队“首脑”屋时。从大队长的床下钻过，又爬进了副大队长的床下……最高长官受到“袭击”。官兵们闻讯操起家伙赶来“增援”，直至把它消灭在走廊里。在波成柬机场施工时，推土机手可能无意之中“侵犯”它们的领地，5 条蛇出来“示威”，其中一条足有碗口粗、几米长，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战士们或许觉得不可“强攻”，便开着推土机与其“战斗”把毒蛇碾得粉身碎骨才罢休。许多人对我们讲到，他们在柬埔寨见到的蛇，比他们几十年见到的蛇多得多。他们风趣地说，“回到北京，再也不用到动物园看蛇展了。”

在柬埔寨能够与蛇相比的，无论是数量还是厉害程度恐怕只有地雷了。

一次，大队长李金勇到野外勘察一座待修的桥梁，他刚刚走下桥时，桥面一位 50 多岁的老头儿朝他一边一声呼喊，一边用手比划着。李金勇很快明白了老人的意思：桥下有地雷。工兵出身的李金勇感激地朝老人笑笑，并示意：我清楚哩。在柬埔寨他不止一次宣布这样一条纪律：无论停车休息还是大小便，双脚不能越过马路！为了引起下属的足够重视，他公



布了“安太克”统计的数字：柬埔寨国土埋有近千万颗地雷，平均每个柬埔寨人不少于2颗。

尽管柬埔寨埋有这么多地雷，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也确实有人因此而丧生，但中国蓝盔部队却无一伤亡。尽管他们象看到毒蛇一样不止一次地发现地雷，但对于行伍出身的工兵来就，对付这玩意儿要比对待毒蛇轻松得多。他们在柬埔寨消灭的毒蛇恐怕不少于100条。关于他们排了多少颗地雷，这暂时还属“军事秘密”，因为他们在柬埔寨不担负排雷的任务。

血洒吴哥大地

中国工程兵抱着善良的目的，为柬埔寨的和平而来。

西哈努克亲王在一次于皇宫门前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对自己的人民和官员说：“中国工兵是帮助我们搞建设的，他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大家要象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对待他们。”

然而，对中国工兵陈知国、余仕利来说，牺牲来得太突然。

1993年5月21日22时40分，中国斯昆营地哨兵突然发现一团火球从营区南面飞来，直接命中八班居住的高脚木屋。惊醒了的士兵迅速撤入防御工事。但是，余仕利却被炮弹片击中胸部，当场牺牲。八班副班长陈知国身上中了30多块弹片，右胸穿透，大腿被炸烂见骨，抢救一小时后终告不治。另有8名战士受伤……

中国工兵自筑的防御工事，在联柬部队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住房下面是地道，而且每间房子都有开口与地道相通。要是有什么情况，全部人员能在一分种内撤入地下工事。事实上，对中国工兵炮击并非仅

此一次。5月4日晚，驻磅同的中国营地遭受了100余名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猛烈袭击，由于首发未命中，中国工兵得以迅速撤入坑道和工事，并凭借轻武器的密集火力打退了对方的多次进攻，无人伤亡。由此可见，这次偷袭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炮击行动。

“5·21”事件当晚，联柬总部派直升飞机将重伤员送往金边德国野战医院救护。22日又将陈知国、余仕利的遗体空运到德国野战医院冷藏。

22日中午2时，联柬部队新闻发言人法尔特向世界发布了炮击中国斯昆营地的新闻。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中国斯昆营地遭炮击，两名战士牺牲的消息，但未报告牺牲者的姓名。

中国工兵在柬埔寨牺牲和负伤，举世震惊。5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烈谴责中国驻柬工兵营地遭袭击并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暴行。当天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炮击中国驻柬工兵营地事件，并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声明警告说：“安理会将对不遵守义务的任何一方“采取进一步措施”。会议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代表加拉汗和安理会其他14个成员国大使，请中国驻柬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大使向中国政府和受害人的家属表示慰问。

西哈努克亲王5月22日从北京飞往金边，一下飞机，他便写信给中国驻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代表傅学章，指出炮击者犯下的可耻罪行，对中国政府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25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将军也给两位烈士的家属写信，向他们表示慰问。

26日，陈知国、余仕利两烈士追悼会在柬埔寨波成束机场隆重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特别代表明石康致悼词。

29日，陈知国、余仕利的遗体经泰国运回北京。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徐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公元1771年年初，一支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队伍，在茫茫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上艰难地行进。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每天都有一批人倒下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生者默默地安置好死去的同伴和亲人，依然坚定而执着地走上了东去的道路。那么，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

乾隆年间的一次万里长征

吴杰

一个古老的民族

这支队伍是由土尔扈特蒙古人组成的。此时此刻，他们正盼望着回到已经阔别了一个多世纪的祖国的怀抱。

蒙古族曾经有过一段十分辉煌的历史。这个在唐代被称作“蒙兀室韦”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北方的草原地区，过着游牧生活。13世纪初开始崛起，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蒙古铁骑驰骋纵横，所向披靡，在对周边地区进行的军事征战中连连获胜，势力大增，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虽然不是一个稳固的政治军事联合体，不久就分裂为几个独立的汗国，但在沟通中西交流方面却起到过

积极的作用。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1279年又灭南宋，统一中国，使蒙古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存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1376年，朱元璋派兵北战，他们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连战连胜，第二年就攻陷元大都。元顺帝率领后妃、太子和一些王公大臣仓惶逃跑，从此以后，蒙古族就陷入了长期的纷争动荡之中。

作为一个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蒙古族是由一些部落组成的。明清之际，我国的蒙古族主要分为三部，就是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他们活动在东自大兴安岭，西到巴尔喀什湖，南起长城，北至贝加尔湖的广袤范围之中。漠西蒙古在清代称作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艰难东行的土尔扈特就是

厄鲁特蒙古中的一部。

历经沧桑

漂落异域

厄鲁特蒙古由四个部族组成,就是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这四个部族分属于不同的蒙古贵族世系,主要生活在我国的西北部地区。土尔扈特部是元朝大臣翁军的后裔。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拥有足够的良好牧地,使牲畜能够不断地繁衍增长,就是他们基本的生活目标。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相对稳定的环境和风调雨顺的气候,使厄鲁特蒙古的畜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不断好转,而牧地却显得不够了。各部之间为了扩大自己的区域,占据更多的牧地而不断发生冲突,寻找新的牧地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当时的厄鲁特四部中,准噶尔部的势力最为强大,他们仗恃武力,肆意横行,不时侵入其它部落的游牧区域。土尔扈特为了维持本身的利益,一直与准噶尔部进行抗争,但终因实力不济,结果总是吃亏受损。与此同时,杜尔伯特也在与土尔扈特争夺牧地和牲畜,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最后彻底断绝交往。孤立无援,处处受欺的土尔扈特蒙古人,面对部族生存的危机,不得不另谋生路,重新开拓一片能够摆脱纷争、保证生活的天地。

从新疆塔城西北的雅尔地区往西,经过哈萨克草原,跨过乌拉尔河,就到了伏尔加河的下游地。这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水草丰美,很适合游牧民族的生活。而人烟却十分稀少,俄国的统治势力尚未有效地伸入到这里,这茫茫草原似乎有一种安谧宁静的情调,成了牧民生息活动的理想场所。16世纪末叶,厄鲁特蒙古中的一些牧民已经开始零星迁移到这里,他们不断带回消息,使很多人知道了在遥远的西边还有一方乐土。屡受欺辱的土尔扈特人,当他们既有的生存环境受到挑战时,理想中的乐园的轮廓,就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成为可以追求的实际目标。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议和细致周密的安排,1628年,土尔扈特的首领和鄂尔勒克最后决定率部西迁。他们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迁徙方式,边放牧,边迁移,缓慢地向西前进,最后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才陆续地抵达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从此以后,土尔扈特蒙古就在这里居住活动、生息繁衍,成为一个独立的游牧部落。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土尔扈特蒙古向往并且迁来的地方,并不是想象中的世外桃源。他们面临着新的威胁:北方的沙皇俄国这时已开始奉行向外扩张的强权政策,一直想把辽阔肥沃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土尔扈特蒙古迁来以后,俄国政府几次派出使者游说,要求他们加入俄国国籍,接受沙皇的统治。和鄂尔勒克并不希望成为俄国的属民,他在礼节上做得很周到,友好接待来使,派出代表回访,反复表示要与俄国和睦相处。但对俄国政府的要求则一再婉言拒绝。由于土尔扈特拥有上万的骑兵,俄国政府虽然恼火,但也不敢轻易言战。为逼迫土尔扈特人就范,他们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广大牧民的畜牧产品无处可销,必须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得到,生活越来越艰难。双方积怨加重,矛盾加深,逐渐发展成为军事上的冲突。1644年,土尔扈特与俄国在阿斯特拉罕城发生大规模战斗,土尔扈特伤亡惨重,他们的领袖和鄂尔勒克也在战斗中牺牲。

这时候的沙皇俄国,与周边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克里木汗国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很想利用土尔扈特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扩张服务。他们软硬兼施,一方面利用刚刚取得的军事胜利,威逼土尔扈特服从俄国统治,与俄军一起攻击克里木汗国;同时又允诺如果接受条件,就将扩大土尔扈特的游牧范围。继任的书库尔岱青采取了与乃父和鄂尔勒克不同的对俄政策,他表面上接受俄国的要求,服从沙皇的命令,还派兵远征克里木汗国,而实际上却利用机会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建立独立的土尔扈特汗国,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书库尔岱青确定的对俄政策,为以后的继承者所奉行。

与强国的妥协,固然能够求得一时的稳定,但是居人篱下的日子总是不好过的。侵略成性的沙俄帝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向邻国发动进攻,而在多次大规模的征战中,强悍勇猛的土尔扈特军队往往要被征参战。连年不息的战争不仅大大加重了牧民的军役负担,而且使很多的生命在熊熊硝烟之中化作冤魂,特别是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并不信任,处心积虑地限制他们发展,还让土尔扈特首领向俄国宣誓效忠,并把自己的亲人送去作为人质。俄国政府还蓄意在土尔扈特内部制造矛盾,扶植亲

俄势力,甚至挑动其它国家的力量来对他们加以牵制和约束。1644年以后的数十年光景,土尔扈特人就是在这种委曲求全的境地苦苦地挣扎过来的。

1724年,俄国政府利用土尔扈特汗国首领阿玉奇去世,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王位而发生冲突的机会,肆意插手汗国事务,夺取了对土尔扈特汗王的委任权。1762年,俄国政府再度乘汗国王位更替之机,在认可溥巴锡为土尔扈特首领的同时,改组了汗国的政权组织,把原先由汗王选人、受汗王控制的管理机构(称扎尔固),改为要经过俄国政府的批准才能行使权力,并为扎尔固制定了多数决定的原则,就连汗王也不能随意取消或更改他们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在汗王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权力中心,从而可以削弱汗王的权力,达到他们加强对汗国实行控制的目的。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继之而来所要遭受的必然是加倍的欺辱和蹂躏。随着沙皇俄国的不断扩张,土尔扈特人被越来越多地征召参战,而且在战场上常常被用来开路断后,所以死伤极多,有时在一场战争结束后,“归来者十之一二”,处境极惨。为了摆脱俄国的奴役和欺压,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汗国统治集团不能不进行思考,何去何从?他们必须选择新的生活道路。

心系中华

在历史碑林中所镌刻着的“中国”两字,并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体现着一个文明古国的丰富经历和深刻内涵。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对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土尔扈特蒙古漂落异域之后,不仅与留在故土的蒙古族兄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中央王朝也有交通往来。尤其是在不断受到强邻的侵扰欺辱的时候,他们更加怀念自己的家园,更加思念自己的祖国。

从土尔扈特的游牧区域到中国的中原地区,路途遥远而艰难,一般都是经过哈萨克草原,穿过准噶尔地区,抵达嘉峪关之后再转程前往,往返一次往往要一年、二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但是漫漫道路并不能隔断土尔扈特蒙古与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他们在漂泊异域的一个多世纪里,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始终没有中断,清朝政权建立后,他们经常派遣使者进贡,同时也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回赠物品。即使在传

统通道一度被准噶尔部的分裂势力阻断的时候,土尔扈特依然派遣使团,不远万里,取道北路,经西伯利亚,到张家口,再抵北京。

清政府也向身居异域的土尔扈特蒙古表示了热情的关怀,先后三次派团访问土尔扈特。

第一次组建的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率领,共32人,主要成员有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郎图理琛等。图理琛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异域录》的书,记述了使团的经历和自己的见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很大,以致于后人就把这个使团叫作“图理琛使团”了。图理琛使团于1712年6月23日离京北上,8月下旬进入俄国境内。俄方担心清朝使团的到来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就设障阻挠他们东行。由于中俄两国当时都在努力修好,俄方又提不出不让使团过境的理由,所以在拖延了几个月后,还是放行了。1713年2月10日,使团重新起程,经过一年多的跋涉,终于在1714年7月抵达土尔扈特汗王阿玉奇的驻地。真是他乡遇故知,情急逢亲人,看到远道而来的祖国代表,处境艰难的土尔扈特人无不兴奋欢腾。他们以隆重的礼仪来迎接使团,阿玉奇更是连日设宴款待,倾诉客居异域的困苦和思念故土的愁肠,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使团则向土尔扈特蒙古表示慰问,他们把康熙皇帝的敕书和赏物交给阿玉奇,转达了康熙对他们的亲切问候。7月25日,图理琛使团带着土尔扈特蒙古的真情和期望踏上了归程,翌年4月30日回到了北京。

清政府的第二个使团是雍正年间派出的。雍正为了遏制在西北边疆不断滋事的准噶尔部的力量,利用俄国新皇登基的机会,派去了两个使团。其中一个专程去莫斯科祝贺的,即托时使团;另一个是满泰使团,计划先随托时使团前往莫斯科,办完贺典后再转赴土尔扈特居住之地。该团以副都统满泰为首,共33人。他们在1731年1月觐见了俄国女皇后就离开了莫斯科,一路顺利,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就到了土尔扈特汗王的驻地。土尔扈特蒙古从满泰使团的来访中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央政府对自己的重视和关心,这种感情上的依恋和理念上的信赖,对他们日后回归祖国的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年,雍正皇帝又派出了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使团,由于俄国政府得知了清政府想要遏制准噶尔势力的目的,他们不愿看到能够被自己利用的力量为清政府所降服,影响沙俄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因

而竭力阻挠,不让使团过境。这个使团在抵达边境城市恰克图后,几经交涉而不得结果,最后只好返回京师。

密谋回国

规模庞大、路途遥远的部落迁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土尔扈特蒙古虽曾几度计划回归祖国,但总因困难太大,一直未能付诸实施。随着俄国政府控制的加强和生存环境发生的变化,土尔扈特人回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起来。

1761年,19岁的渥巴锡登上汗位。俄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于第二年改变了汗国管理机构扎尔固的组织形式,削弱汗王权力,把整个汗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俄国政府还对土尔扈特的宗教信仰横加干涉,竭力让他们改奉东正教。同样严重的是,这时候土尔扈特人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俄国政府有计划地往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大量移民,以前人烟稀少的茫茫草原,此时已经不能任凭驰骋了。土尔扈特蒙古以往的牧区,不断受到俄国移民的侵削,双方为了争夺牧地经常发生摩擦。汗国首领多次向俄国政府进行抗争,申诉移民的增长对土尔扈特畜牧业造成的严重影响,抗议一些俄国属民肆意抢劫牧民牲畜的强盗行径,但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如同泥牛入海,没有音讯。移民依然增加,环境继续恶化,土尔扈特人又一次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不久,俄国政府又要求渥巴锡交出自己的一个儿子以及其它三百名贵族的子弟作为人质,这一把火终于点燃了土尔扈特人长期积存在胸中的愤怒和怨恨。一个宏大的返回祖国的计划开始酝酿起来,渥巴锡和汗国其他领导在确定了回国的目标之后,就投入了几乎是全部的力量积极进行准备。他们一方面给属下分析土尔扈特面临的处境,说明留居的艰难和回迁的好处,以统一大家的认识,保证行动的一致。另一方面着手储备粮食、物品和牲畜,以供起义使用。为了麻痹俄国政府,渥巴锡作出了一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姿态,并且亲自率领精兵强将参加了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努力取得他们的信任。

1770年秋天,在一个卫兵严密把守的蒙古包里,正举行着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土尔扈特蒙古的6名最高首领。他们经过反复的磋商以至争论,最后确定了返回祖国的具体计划,行动时间定在1771年年初。在随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每

个人都有一种紧张得揪心的感觉,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失败等于灭亡。当时的土尔扈特蒙古受着俄国政府的严密监视,要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把涉及10余万人的迁移计划付诸实施,确实十分困难。特别是军队的集结,最容易引起俄国政府的怀疑猜测。渥巴锡反守为攻,主动向俄国负责管理土尔扈特事务的官员提出报告,声称为了防止哈萨克人的侵扰,需要把军队集合起来。俄国官员虽然不太相信,还专门派人前去阻止,但却压根没有想到渥巴锡竟敢无视强大的俄国力量而率部东迁,更难以想像东迁的准备工作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快要做完了。

土尔扈特蒙古以出色的智慧和超人的勇气,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完成了起义的准备。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临了。

万里东行路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开汗国大会,面对饱经忧患、忍辱负重的父老兄弟,渥巴锡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用大家所知晓、所经历的事实为证据,历数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欺凌和压迫,每到伤心之处,泪水禁不住地流满面颊。最后,渥巴锡庄严宣布起义计划,号召所有土尔扈特成员团结一致,生死与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人们被渥巴锡充满感情的演讲所感动,又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而悲痛,整个会场沸腾了起来,哭声、喊声响成一片,沉静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5日清晨,几支土尔扈特军队向俄国驻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正式爆发。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的渥巴锡,此时此刻反倒显得比较平静了。他默默地注视着自己住过的房屋,毅然举起了火把。在渥巴锡的带领下,土尔扈特人烧毁了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这个悲壮的举动,显示了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坚强决心。随着升腾的浓烟,这支近17万人的队伍,终于踏上了充满荆棘、障碍危险的东归之路。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俄军的驻防力量比较薄弱,而且事先未得风声,没有任何准备,根本无法抵抗骁勇善战的土尔扈特军队。庞大的东归队伍,沿着军队打通的道路全力突进,速度很快,等到消息传到俄国首都,女皇叶卡德琳娜愤怒下令要坚决把这支队伍拦截回来的时候,土尔扈特军民已经突破了俄军的防线,并于1月下旬进入了白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

时值隆冬严寒,气候十分恶劣。饲料严重缺乏,大批牲畜饿倒,使得队伍举步维艰,难以前进。指挥者前思后想,决定在此暂作休整,等到春暖时节再继续东进。严冬难熬,长夜摧人,多少个早晨,当人们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身边的同伴或亲人依然在沉睡,那冰凉而僵直的躯体,表明他们永远也起不来了。生者等着、盼着,一天天,一夜夜,他们在等待春天的来临,盼望气候早日转暖。就这样苦苦熬到4月份,队伍才重新上路。

俄国政府为了阻止土尔扈特蒙古东行,先后派出几支队伍追击堵截。由于路远道险,好不容易追来的那些人马在强悍的土尔扈特军队之前显得势单力薄,构不成多大的威胁。真正给这支回国的队伍带来麻烦的,是当地的哈萨克人。渥巴锡在作起义准备的时候,曾经抢掠过在雅依克河流域游牧的哈萨克人的牲畜物品,当土尔扈特人经过哈萨克草原时,居住在这里的哈萨克人既为一报前仇,又受俄国政府的挑唆,不断对他们进行拦截进攻,时而大军围堵,时而小股袭击,土尔扈特蒙古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渥巴锡率部一路苦战,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了哈萨克人的阻击纠缠。7月初,前锋部队终于在察林河畔与清朝军队会合。为了回到祖国的怀抱,土尔扈特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不说将近万里的艰难跋涉和难以计数的物品损失,仅人员就少了近一半,出发时的17万人,此时只剩下不到10万人了。可以告慰在天之灵的是,他们的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

回归祖国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的归来十分重视。4月间,乾隆皇帝获悉大批土尔扈特人正在归来的消息后,立刻谕令地方要很好接待,妥善安排。土尔扈特领导集团中一个重要成员舍楞曾经参与了准噶尔部的叛乱活动,并诱杀一名清军副都统以后出逃,乾隆决定对他也予以宽赦,不究既往。秉承乾隆旨意,土尔扈特蒙古刚刚抵达边境,戍边的清军官兵就去迎接,参赞大臣舒赫德在伊犁会见了渥巴锡、舍楞等首领,并向牧民发放了大量赈济物品。8月5日,舒赫德亲自陪同渥巴锡一行起程前往承德觐见乾隆。

路上,他们受到各地官员的热情接待,还两次收到乾隆专门派人送来的赏物。

10月中,渥巴锡等人抵达木兰围场,正在这里围猎的乾隆皇帝马上召见,详细询问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国经历和安置要求,然后又带他们来到避暑山庄,参加普陀宗乘庙的落成典礼。此时的乾隆皇帝,心里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土尔扈特蒙古不辞艰辛,万里东归,充分显示了中央王朝威及遐迩的强大力量和众望所归的崇高地位。他在慷慨地向土尔扈特首领赐物赏宝、分封爵位之后,似乎仍觉得犹未尽,又在普陀宗乘庙立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巨碑,碑文均由乾隆亲撰,扼要地记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在乾隆重看来,无疑这是具有永久的纪念意义的。

不过,17世纪以来在西北边疆持续不断的准噶尔部的叛乱分裂活动,也在乾隆的心上蒙上一层阴影,他担心集体而归的土尔扈特蒙古以后势力过大,难以控制,以致影响边关安定。因此,他在对土尔扈特进行安抚优待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乾隆重让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主要首领分居别处,又给他们各授重职,使之各为一支,互相牵制。这样,原先土尔扈特统一的力量就被化解为分散的势力,便于清朝政府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控制。

土尔扈特蒙古的东去和清朝政府的安置,使俄国政府十分气恼,他们一厢情愿地把土尔扈特人视为自己的属民,要求清政府将其全部归还俄国。他们以武力相威胁,声称如果不交回土尔扈特蒙古,两国间就会出现麻烦,甚至发生战争。不过,这时候的清王朝正处在繁荣强大的鼎盛时期,朝廷上下对沙皇俄国并不畏惧。理藩院接到俄国政府的来文后,秉承乾隆之意,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声明,无论开战还是和好,悉凭俄方选择,表示了一种不惧武力的强硬态度。俄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从此,土尔扈特人民又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居住下来,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建设祖国的边疆贡献着力量。土尔扈特蒙古冲破重重困难,万里回归祖国的壮举,也作为我国民族团结的典范事例而被载入史册。

祭炎帝陵 扬民族魂

——记株洲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

●鲁淳



从株洲乘汽车东南行,约5小时,入酃县境,只见峰峦叠翠,郁郁葱葱。过县城折向西南10余公里,“神州第一陵”的巨幅牌匾矗立路边。迎面是陈云题写的“炎黄子孙不忘始祖”金光闪闪的八个大字。一进陵区,人们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左边满山是整齐的果园,右边蜿蜒的洙水清澈见底。倚山傍水,绿荫深处,一处古朴典雅的殿宇,便是炎帝陵墓的所在。

海内外炎黄子孙谒陵祭祖的,近年来与日俱增。黄帝陵位于

陕西省黄陵县,许多人早已熟知。炎帝陵则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比较陌生。宋·罗泌《路史》记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学者研究认为,今株洲地区古属长沙,酃县在南宋以前属茶陵县。这一带山峦起伏,盛产茶树。所谓茶乡之尾,正是今湖南省株洲市所辖酃县塘田乡鹿原陂。

1993年仲秋时节,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株洲宾馆举行。市委副书记程兴汉致开幕词说,弘扬炎黄文化,促进改革开放,是这

次会议的主题。他强调指出,40多年的辉煌成就使株洲感到自豪,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更值得株洲骄傲。专程由北京赶来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讲话,着重论述了炎帝文化的时代意义。他说,神农氏兴“耒耜之利”,“教民播种五谷”,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遍尝百草,始有医药”,突出表现了身体力行的

实践精神;炎帝终因误食断肠草中毒而亡,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集中反映;倡导“日中为市”,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精神的生动体现。他指出,弘扬炎帝和黄帝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来自北京、河南、河北、陕西、湖北、湖南以及台湾的教授、专家、学者约50人,在会上宣读论文,进行探讨。(下接10页)

电视剧《唐明皇》锦袍绣衣的人群中，几次出现过一个布衣道士。他曾先后辅佐玄宗、肃宗、代宗三位皇帝，是一位三进三出宫廷的治国奇才。他的传奇经历发人深思。

功成身退的 乱世谋臣 李泌

☆胡戟

盛世末日

天宝末年，安禄山在范阳造反，灾难降临在大唐臣民身上，长达八年的战乱和伴之而来的饥荒中，生灵涂炭，国家的编户，竟从 890 万锐减为 290 万。大唐盛世，跌入末日灾害之中。

一代忠臣，张巡、许远、颜真卿、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民众奋起抗击叛军，有的以身殉国。此间又

一名“山人”李泌，也想出山力挽狂澜，他以其奇谋秘计和时隐时现飘忽一生的行踪，早已传为历史佳话。

天子宾友

马嵬坡事变后一月，太子李亨擅自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正浪迹于嵩山、颍水间的李泌，不

顾穿越叛军占区的危险，奉召兼程奔赴灵武，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正愁身边缺少谋臣的新皇帝，见到这位东宫旧人，欣喜万分，经常在寝宫卧室里同他彻夜长谈。李泌自称“山人”，不肯接受“右相”官职，但是中枢事务，无论四方文状，还是将相任免，皇帝都找他商量，“待以宾友”，一时“权逾宰相”。

李泌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灵武朝廷要抗击和平定叛军，要和成都的“南朝”协调关系，要取得老皇帝的承认，要预防李唐宗室内部皇族子弟间再起内斗，要抑制挟宠窃权的张良娣势力膨胀，要约束宦官、将、相之间的内耗，还有粮秣、财政、民生种种棘手问题。在肃宗称帝后八九天便赶来的李泌，除了皇帝给的一点信任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元帅长史

当务之急是打仗。抵抗叛军，事关生死存亡，也是李亨不跟父皇入蜀，到灵武另建朝廷的口实，肃宗不能丢掉这面旗号。可是仅仅靠从马嵬分兵带过去的一二千人马，要和已占领两京的至少十五万叛军对抗，又谈何容易。幸而郭子仪、李光弼很快就从河北前线撤下5万兵来勤王，“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肃宗给郭、李二人都加封了宰相官衔，以充犒赏。

元帅谁来当？起先肃宗提出用建宁王李倓，他是自己第三子，英勇果断，有才略。自马嵬北上以来，李倓组织骁勇，侍卫于李亨鞍前马后，不怕势孤力单，途中每逢盗寇，便奋力血战，保护李亨安全。父亲吃不上饭时，他又悲泣难过。表现得忠勇孝顺，很得军心。

李泌认为不能用李倓为元帅：“建宁王诚然有元帅才，但广平王是长兄，如果建宁王立下大功，能让广平王学吴太伯，为让兄弟继位而自我流放吗？肃宗说：广平王是宗子，第一继承人，还在乎不当元帅吗？李泌解释：广平王还没有正位东宫，现今国事艰难，人心寄予元帅，一旦建宁王成就了大功，陛下虽不想立他为嗣君，跟他一同建功的人们肯罢休吗？唐太宗和太上皇不都是因为有定天下之功而承继大统的先例吗？”

李泌的话一言千钧，点出同胞手足喋血宫廷的往事，提醒要预防再次发生玄武门事变式的兄弟相

残悲剧。肃宗马上接受李泌此议，任用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

用兵是军国大事，帅印可以让皇子挂，处理军务还得老成的行家。皇帝先要李泌换下山野平民穿的白衣，改服紫袍，那服色是三品以上高官专享的，借口是李泌陪他视察军队时，军士指点着窃窃私语：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是山人。为杜绝军士的闲话，才要他改穿官服。皇帝声明，这并不是强要李泌在这危难之秋屈就为官。李泌不得已，勉强接受。

李泌换上紫袍后去谢恩，唐肃宗见他上了圈套，又笑着说：既然穿了官服，怎么可以没有官职呢！边说边从怀里掏出早已写下的敕书，宣布任命李泌为元帅长史（一说司马），前面还冠上一个专为李泌创设的官衔“侍谋军国”，李泌坚决推辞。肃宗说：朕不敢命你为相，请你就此职是为救国难。一时贼平，任行高志，去留一切听尊便。难得皇帝这样诚恳待人，李泌只好临危受命了。

到任以后，李泌不能不想到，以自己一介书生山人的根底去面对不乏骄兵悍将的西北镇军，能服众吗？如何取得指挥军队的权威呢？当年刘邦曾用设拜将台的办法，成功地树立了韩信的指挥权威。现在灵武，既无设台的财力，也无建造的时间，李泌别出心裁，要在酒场上演武，借酒文化造势。

李泌和皇帝商量好，为郭子仪、李光弼二将首次参见新任元帅，特作这样的安排：李泌摆酒，在家约见郭李二人，席间，让广平王赶到李府，二将必然要起身拜谒元帅，李泌示意听他酒令官的，不必拘礼拜迎。广平王毫不在意，进屋后随便坐下，参加饮酒谈笑打令，元帅、长史一起对二位将军好言慰安。酒席撤后，李泌才提醒二将军作正式拜谒。这样令郭李二人亲眼目睹，元帅以天子元子之尊都要俯从李泌的酒令，体会皇帝正宠任元帅长史。将来在军中必能令行禁止，一旦谁触犯军律，死生都在李泌手中。由此对李泌肃然起敬。全军上下听说后，也无不对之心生敬畏。

当时兵权，远征军由郭子仪、李光弼统领，分赴河东北作战，作为指挥中枢的元帅府，置于宫禁之中，除了负责保卫天子，还要处理全国军务。四方奏报都先经由李泌，紧急事就近呈送皇帝定夺。宫廷门禁锁钥，也由李泌和广平王掌握。

李泌也曾直接参加军事行动。至德元载（756年）十月，宰相房琯被叛军火攻大败，死伤四万余。

李泌亲自带兵赶去，将房琯和数千残军营救回来。至德二年（757年）九月，15万唐军与回纥联军收复长安一役，李泌也和元帅一起随军行动并亲临指挥。

平乱方略

至德二载二月，李泌重提北伐大计，建议派遣安西和西域来援的部队，自塞北南取范阳。肃宗认为这样迂回数千里，调兵北伐，绕弯子太大了。李泌解释，以现有兵力，直取两京是可能攻克的，但溃退的叛军必然会重整旗鼓而来，再困官军，不是久安之策。特别指出：调来的西北守边和各族的军队，不能久留，强攻两京即使取胜，天热了就要撤走，而败退的叛军余众，回到老巢休兵秣马，一定伺机重来，这样打下去，战争就没有尽头了。李泌强调，应该先捣毁其巢穴，使贼无所归，才能一劳永逸。但是肃宗只想早些收复京城，取得巩固自己皇位的资本。当年用了不正当手段抢班夺权，成为自己一块心病。所以李泌的长期计划，他总是听不进去。

当官军按肃宗的既定方针向前平推，刚刚攻下长安，李泌乘被紧急召见之机，陛辞皇帝，坚决告退。不等肃宗春风得意回到长安，他便先行一步，踏上往北岳衡山的路，归隐而去。那断然的告辞成为与肃宗皇帝的永别，显明是此时郁结心中的失望的无声发作。

迎归上皇

召见李泌的那次谈话，是至德二载九月在凤翔（在今陕西）进行的。当月收复京地的捷报刚刚送到凤翔，肃宗便调骏马飞驰长安，把随军行动的李泌召去。二人一见面，肃宗就告诉他，已经往蜀中呈送奏表，请上皇东归，还表示了自己将交还皇权，退回东宫，再为臣子。显然，马嵬事变以来，杀了父皇宠妃，又夺了他皇位，事情做绝了，道义上很难交代，成为肃宗一大心理负担。想借收复京城迎回上皇之机，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所以迫不及待地送出奏表。找李泌来，就是要磋商这件大事如何往下进行。

李泌听了忙问：送奏表的中使还能不能追回来？得知已经走远了，李泌叹道：上皇是不会回来了。原因自然是杀杨贵妃和擅自称帝两件事结下很

深的怨恨。可现在儿子把父亲丢掉的京城收复回来了，有再造社稷的大功，一功遮百丑，下台的明皇帝再糊涂也该知道自己已没有资格再存复位的奢想了。肃宗的表奏还提出皇位的问题，他哪里敢要，哪能回来呢。

肃宗一筹莫展，问有何办法补救。李泌说自己可以重新起草一贺表，以群臣名义，承担马嵬请留、灵武劝进的责任，解释一切都是为了平乱安邦。现在大功告成，皇帝朝夕思念上皇，请速回京，以就孝养。这样只说尽忠尽孝，不提皇位的事，才能请回上皇。

事情完全像李泌料定的那样。上皇收到第一个表奏，终日彷徨，茶饭不思，为避皇位之争，决定不回来，只下一道诰书，回话说：分剑南一个道给我，自为奉养，不再回京了。肃宗看到以后，忧惧不安，手足无措。幸好没过几天，送第二道贺表的中使回来，说上皇看了大喜，摆宴奏乐，定下了起驾回京的吉日。肃宗如释重负，这才放下心来，自己进京，准备迎接上皇东归。

十二月，上皇回到阔别一年半的长安。肃宗备法驾，亲往咸阳迎接。相见时，肃宗脱去黄袍，改服紫袍，趋拜舞蹈，呜咽不止，还捧足牵马，十足地扮作孝子，表演一番。上皇见状，也洒了几滴泪，要来黄龙袍，亲自为肃宗穿。肃宗伏地顿首，叩头回辞。上皇很明事理地把他要的话递过去：“天数、人皆归于汝”，皇帝位子只能属于儿子，已是无可争议的事。还表示，自己只要能安度余生，就是你尽孝了。他很满意儿子给他的礼遇，说什么：“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在一片山呼万岁声中，肃宗安心地又穿上天子黄袍。父子间马嵬事变以来的龃龉，至此在表面上戏剧性地收了场。肃宗皇位的合法性，终于得到公开的承认。李唐皇室南北两个朝廷并立，内部隐伏了一年多的有关皇权归属的一场大危机，顺利平复了。其间，李泌办的贺表起了关键作用，为此，肃宗曾感激地对李泌说：“皆卿力也！”

五不可留

在凤翔，等李泌处理完贺表的事情，肃宗高兴地去他那里一起饮酒，同榻而寝。不想这时李泌却提出隐退赋闲的请求，使肃宗感到十分意外，便回

他：朕与先生多年共忧患，眼看要天下太平，可以同享安乐，为何马上要离去呢？李泌说：我有五不可留，请陛下放我走，“免臣于死”。肃宗更奇怪了，这话是怎么说的？李泌的解释是：“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

肃宗若有所悟，推说：先睡吧，过几天再议。李泌不同意：陛下今天睡在我床上，都说不成，更何况以后上朝当殿去议呢！陛下不让我走，“是杀臣也”。肃宗生气了，说：想不到你这样怀疑我，把我看作什么人了？李泌说：要杀我的不是陛下，是“五不可”。陛下一向如此厚待我，我有话还不敢都讲，将来天下安定，用不着我时，就更难讲了。

肃宗想了半天，问：是因为我没有采纳你北伐范阳之谋略吗？李泌有意回避这话题，直截了当地说：不敢讲的，是建宁王的事。前面提过，建宁王李倓从马嵬到灵武，血战侍卫，表现得有勇有谋，李泌也很看重他，虽然明白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宜让建宁王担任，但北伐范阳之役，却是保举他带兵的。李倓对这两件事一再表示很理解，很感激，私下还对李泌说过，知道张良娣与李辅国相勾结，也要害李泌，自己愿为先生除害。李泌劝阻，可李倓不听，屡次到父皇那里告御状，揭发张、李的罪恶。不想被张、李反咬一口，诬告李倓恨不得为元帅而谋害广平王，肃宗竟听信谗言，赐李倓死。对忠孝两全“有艰难定策之功”的儿子说杀就杀，李泌不能不寒心。他在与肃宗同榻而寝时的交谈中，两次说及“免臣于死”、“是杀臣也”，重复提到死和杀的问题，确是现实的危险而非杞人之忧，因为麻烦正来自心狠手毒的张良娣和李辅国，皇帝一时的恩信，并不可恃。

制抑良娣

说到张良娣，她是肃宗为太子时娶的侧室，因为韦妃被废，吴妃（代宗生母）早薨，才有轮到她出头的机会。此女子“辩惠丰硕，巧中上旨”是个嘴巴乖巧善于奉迎的胖美人。当夫君志忑不安苦守东宫等待皇位时，她还安分。在仓皇奔赴灵武途中，道路多虞，每夜入寝，她睡在外面，称：有盗寇入室，“妾以身当之”，掩护太子于后面脱身。到灵武，她临盆三日便挣扎起身为将士缝战袍，肃宗心疼地劝阻，

她深明大义地说：现在不是妾身自养之时，要尽力替夫君分忧。危难中有不俗的表现。可她出自皇亲国戚世家，决非柔弱善类，稍一得志，便学武则天天的样子，弄权干政。

她勾结的宦官头目李辅国，飞龙小儿出身，本是个在禁苑马厩中供事的阉奴，因为粗通书计，早年被派到东宫做事，成为太子李亨的心腹。马嵬事变中参预陈立礼的策划，又与建宁王一起挽住太子马缰导演遮道请留，拥戴李亨经往灵武自立，从此飞黄腾达，拥兵专权，与张良娣为表里，左右了皇帝。他俩把耳边风枕头风一刮，轻易就除掉了建宁王。而后的目标是李泌和广平王李俶——等待王位的太子。

李倓谋于李泌，要设计除去良娣和辅国，明确表示对李泌处境十分担心。李泌对这些事非常谨慎，怕李倓也遭建宁之祸，竭力劝阻了李倓，嘱他恪守孝道，委曲顺从良娣，可以免祸。他判断，良娣虽生有二子，但长子李昭早薨，幼子李侗还小，无法取代李倓的家嗣地位，李倓只要不激化与她的矛盾，尚可相安一时。自己的安危，他请李倓放心，因为早与皇帝有约，“候平京师，则去还山，庶免於患。”国难当头，李泌无论如何要避免再生内乱。

为宫中不再生事，还得抑制张良娣挟宠窃权，李泌也做了不少努力。当肃宗提出使良娣正位中宫时，他曾加以劝阻，不让皇帝立皇后，这话是很难讲的，可他说：陛下在灵武践大位，是俯就群臣心愿，为便光复成功。立皇后这是家事，应请示上皇之命，不过是早早晚晚的事，不要着急办。硬是给搁置起来，让张氏尴尬地继续使用太子侧室的名号良娣，留在远离正宫皇后的位置上。

又有一天，成都送来上皇赐给张良娣的七宝鞍，珠光宝气，装饰得十分豪华。李泌见了说：现今四海分崩，不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合适乘用此鞍。应将珠玉拆下来，交付库吏，将来分赏给作战有功的将士。良娣听了又气又急，新怨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人还在后面阁中，就忍不住大声叫喊起来：“乡里之旧，何至於是！”张良娣母亲是新丰人（在今临潼），李泌家居京兆（今西安市），所以喊他乡党。肃宗还算明白，喝住良娣说：先生这是为社稷考虑。当时就命按李泌所说办，将鞍上装饰用的珠玉拆下，准备赏军用。建宁王见此状在廊下禁不住抽泣起来，肃宗感到奇怪，问是怎么啦。李倓说：我一直担心祸乱难平，如今陛下从谏如流，相信不用多久，就能看到

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所以高兴得流泪哭了。良娣越听越气，因此结怨于李泌、李倓。史家认为，这是良娣陷害李倓和李泌不自安的起因。

保全储君

李泌在请求归山的那次夜谈中，曾批评皇帝错杀了建宁，他提出的证据，最有说服力的是当初阻拦用建宁王为元帅而改用广平王一事，事后建宁不仅不记恨李泌，反而称赞他的远虑，和李泌更加亲善。李泌说：“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肃宗终于明白那是一桩冤案，后悔得落了泪，承认先生所言在理，但是“既往不咎”，自己不愿再提这件错杀爱子的伤心事了。

李泌重提旧事，不是追究既往，是想要皇帝慎对将来。事实证明，李泌保全储君是成功的，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死后，李俶继位为唐代宗。虽然当时有一段小插曲：肃宗病危时，已经翻脸决裂的张皇后、李辅国之间闹起火并，太子李俶利用矛盾，命李辅国、程元振率禁军逮捕张皇后，肃宗一咽气就将他处决。李俶登基当年，又指使人暗杀飞扬跋扈的“尚父”李辅国，尽除这两个冤家对头，出了憋在心中多年的恶气。此事的意义当然不在报个人的宿怨，而在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渡过了这唐前后期转折的瓶颈期。

赏功以爵

政局的稳定，还有赖于安抚好功臣。光复大业垂成之时，肃宗皇帝已经为如何封赏功臣伤脑筋了。他问李泌：现在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等收复两京平定四海以后，再没有官位可以为赏了，这怎么办？唐朝政治自天宝以后已经腐败到用宰相官衔为封赏，滥赐给边镇节帅了。

李泌十分精辟地分析了以官赏功的弊害，提出解决办法。说：“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太宗曾想恢复古制，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等

怕失权，以不愿远离京城久违天子为借口，表示反对，以致只得用给官做的办法奖赏功臣。这“以官赏功”有两大害处：“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没本事的把政事搞得一塌糊涂，大权在握的又难管得住。这些做了大官的功臣，实在都是不为子孙的长远考虑，只顾自己弄权为所欲为。

且不说复古封国行爵赏还行不行得通，李泌分析的“以官赏功”的坏处，一针见血指出了封建政治的积弊。除非“官以任能”，否则要想解决官场的腐败、内耗和动乱，无异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可惜肃宗也只是说好而未能实行。

归隐衡山

说到自己，李泌称：我受赏的要求与众不同，“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要。”他是练气功辟谷这一门的，传称他早年就读易修炼，人称“神仙”，居然连饭都不吃，又不娶亲，没有家室之累，孑然一身，与世无争。他倒也不是毫无所求，他最得意的是以往肃宗在宴请臣下时，总给这位不吃饭的先生蒸两只梨，因为是御手亲自调制，最是荣耀，反倒让别人羡慕不已。此刻，李泌只要求皇帝：“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话说得十分幽默潇洒，肃宗听了大笑不止。

李泌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

官军收复西京长安以后，他在凤翔辞肃宗，不等皇帝凯旋回京，他就兀自归山去了。皇帝留他不住，做个人情，下一道敕文给地方守令，让在山里建一所住处，给李泌供三品料。

李泌是丢下大功垂成坐享荣耀的机会走的，这一走，有失也有得。所得者，是从齷齪的政治旋涡中脱身，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在山林中隐居，大自然会安抚他那颗失落的心。千百年来，中国士人都信奉这一格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这后半句未必合他本愿，他也只能这样聊以自慰了。（责任编辑 黎勃）



新凤霞简况

新凤霞,1928的12月23日生。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理事。曾先后在评剧《刘巧儿》、《祥林嫂》、《杨三姐告状》、《花为媒》等剧中扮演主角。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饮誉国内外。

“文革”中,惨遭迫害,因而致残。但她顽强不屈,在离开舞台后,学习写作,先后出版了《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等17部著作。

神功 505 真神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是中国的两句古老俗话。谁都保不定难免会得点小毛病,家里备点药是很有必要的。我因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迫害,留下了终生残疾。也得到了广大观众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所以经常有人给我送治疗偏方、治疗器,以及介绍各种药品,甚至有的医生还亲自登门给我治疗,送来温暖,使我感激万分。

1993年10月的一天,有人约我去港澳中心参加敬老保健药品专家讨论会,我在这个会上得到了很多自我保健知识。有人介绍了日本的什么磁疗床垫,据说疗效很好,但价值高达几万元,实在使人望之却步。

长期以来,我有严重的胃

病,还吐血,严重时还住院治疗,再有,我的肩周常疼痛难耐,有人介绍我使用505神功袋,这种东西价钱不贵,一般人都花得起,我使用了一段时期,还真灵,灵得神奇,从此,我连住院也没有治好的胃病也不再疼痛了,平时感到十分舒服了,肩膀也不痛了,眼酸也消失了,505真是价廉物美,名不虚传。此外505神功袋还没有副作用,对任何人可以适用,既可治疗,又可以保健。我同很多人谈起来,都说505不错,确实神!

所以《炎黄春秋》杂志搞这个活动,我很支持,我说:“你们做好事,我一定写文章,以表示我的支持”

“名人与505征文”

中华大学大专函授招生简章

中华大学经湖北省教育委员会鄂高教〔83〕054号文批准成立,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管理严格,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并推荐安排一批待业学员去深圳市、珠海市、中山市等地工作。

学校开办的各专业分别由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主考,学制两年。各科课程及格者,经专业主考大学盖校章,由湖北省高教委(盖钢印)颁发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

一、招生对象: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工人、农民、指战员及城乡待业青年,均可免试参加学习(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残疾青年免收学费)。

二、报名办法:邮汇报名费10元到我校,即寄登记表、简章、学习安排和入学通知书。集体报名,由单位直接来人或来函联系。汇款时,请写清地址、邮编,在汇款单“附言”上写出学习专业。

三、入学手续:填写表格(写上身份证编号);交脱帽一寸、二寸黑白照片各两张;我都经审定即办理注册手续;学员交纳学费后,即寄发校徽、学生证和学习材料。

四、本学校开办专业、学习课程及收费标准:(每门课程学杂费50元,报考费12元)

五、教学方式:以函授为主进行教学,给学员辅导学习,解答疑难。考试前给学员寄发复习资料,帮助学员取得好成绩。考试不及格者,可免费进行补考,没有条件来我校参加考试的学员,可开卷通讯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我校专业结业证(盖钢印),证明进修学历水平。

六、考试办法:每学期进行一次考试(考场设在我校内),学员接通知后可凭我校学生证买半价优惠来回火车票。

七、毕业待遇: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享受全日制高等院校大专毕业生的同等待遇。毕业时,由省高教委调发考籍档案给在职学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备案。对待业学员采取自主选择业和学校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按照国务院88年3月颁布的(高等教育考试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接受单位录用或聘用。

八、报名时间:本期报名截至94年4月31日,逾期报名者转入下期学习。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马沧湖路2号中华大学函授部
邮编:430050 电话:027-443765

专 业	课 程	主考院校
法 律	哲学 大学语文 经济法 民法学 民事诉讼法	武汉大学
会 计	哲学 大学语文 经济统计学 会计学原理 企业会计	中南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	哲学 大学语文 企业管理学 技术经济学 经济管理学	中南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哲学 大学语文 组织行为学 行政法学 行政管理学	武汉大学
秘 书	哲学 逻辑学 行政文书学 行政秘书学 行政管理学	湖北大学
中 文	哲学 逻辑学 文学概论 写作 外国文学	湖北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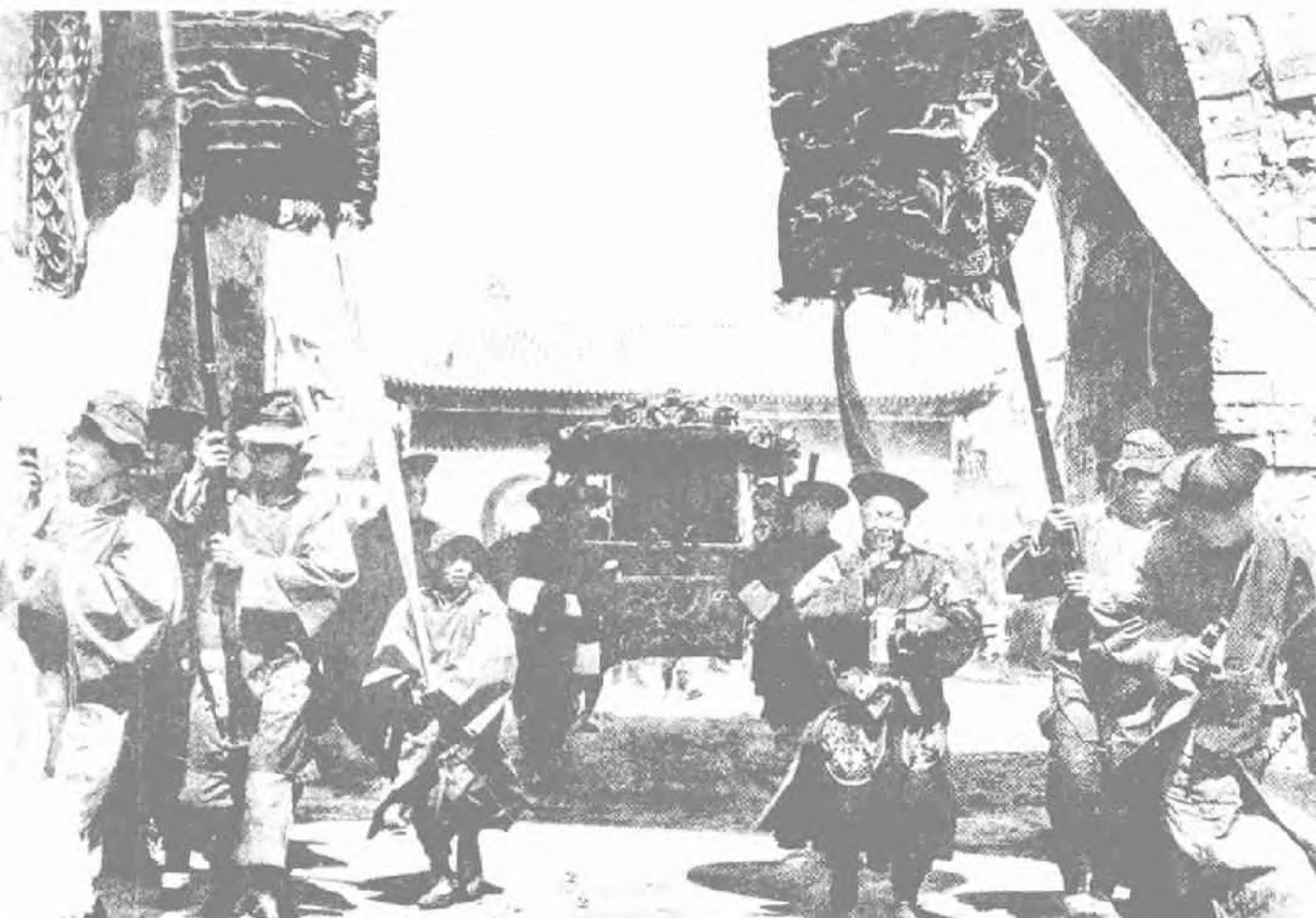


天桥市场是永久性露天市场，位于前门大街西边，离天坛不远。此处可买到各种家用旧货。

专供儿童们的流动点心货摊。只要他们需要，沿街叫卖的小贩都能满足小顾客的需要。



婚礼行列。通常到新娘家迎亲，老式婚礼必有吹鼓手演奏，令人愉快喜悦。办喜事、丧事费用昂贵，为敬重其家人，人们尽力去筹办这种仪式。



中国当代史研究丛书
第11卷
2011年10月出版

炎黄春秋



向最高决策层上书

“毛泽东热”中的文坛造假风

陈独秀晚年生涯

蓝盔部队未曾披露的新闻

功成身退的乱世谋臣李泌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2>